

## 前 言

彭德怀元帅是中国和世界著名的军事家，他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一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指挥过上百次重大战役、战斗，从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军的将领到朝鲜战场上的美军统帅，无不成为他的手下败将，在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壮丽的篇章。他在作战指导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驾驭战争的艺术及其所阐述理论原则，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国和世界的“兵法”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

彭德怀军旅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烈火硝烟、跃马挥刀的战场上度过的，他的军事思想和战争指导艺术有着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只有首先对他叱咤风云的战争经历有基本的了解，才有可能领悟其兵法的真谛。本书第一章对彭德怀的军事实践从总体上进行了概要论述，着重记述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紧要关头主动请缨当大任、临危受命挽狂澜的无与伦比的胆识和谋略，从整体上反映彭德怀兵法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所发挥的巨大威力。

游击战是弱小军队对付强敌、生长自身力量的基本作战形式，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彭德怀作为人民军队创建者之一，平江起义后即领导红五军开展独立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总司令领导和指挥了世界战争史上最为宏大、最为

壮观的敌后游击战争，是我军游击战一系列作战原则、战略战术的开创者之一。本书第二章探讨了彭德怀的游击战思想，阐述了他对游击战的基本指导原则、游击战的主要作战方式、游击战的力量组织形式、游击战的战略基地、游击战向运动战、阵地战转变的条件以及在正规战中的配合作用等方面的深刻见解和理论贡献。

运动战是我军在革命战争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主要作战形式，彭德怀既有指导带游击战性质的运动战的丰富经验，又有在大步进退中打大歼灭战的辉煌战绩，还有在特殊敌情、地形条件下（朝鲜战场）运动中歼敌的独特经历，对不同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指导问题有着许多精辟的理论阐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动战思想。本书第三章从兵力机动与运动战战机的创造与把握，在战略上处于劣势情况下于运动中获得战役上优势的要诀，迂回、包围、穿插、分割在不同敌情地形条件下的运用法则，运动战中速战速决、务求全歼作战原则的实现途径等方面对彭德怀的运动战思想进行了探讨。

由于我军技术装备与敌人相比一直处劣势，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一般都避免与敌人在固定阵地上的对垒。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优势装备的美军进行了一场当时世界上现代化水平很高的阵地战。他在阵地战的作战指导上同样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性，形成了一整套现代条件下阵地攻防的理论原则。本书第四章分别对彭德怀的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理论及作战原则进行了探析。

“致人而不至于人”，是一切兵法谋略的精要所在。“顺施诱惑而纵其错”则是彭德怀让敌人听指挥的“秘诀”。本书第五章主要探讨彭德怀调动敌人就我之范的艺

术，通过对若干典型战例的分析，阐述了其示弱纵骄、佯北引追、蘑菇战术、扰敌待机，“顺详敌意、将计就计，有意暴露、诱“鱼”上钩，攻其必救、张机设阱等“致人”手段的要领所在。

兵家权谋中，战略谋划居于最高层次。只有精于战略谋划的将领，才能担当起驾驭战争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重任。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历程中，彭德怀始终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但一直是前敌指挥的主帅之一，而且也是我军最高统帅部的决策者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过中革军委副主席，长征后期担任过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陕甘支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军委参谋长；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长期肩负着战略指导的重任，在各个历史时期我军战略方针、原则、计划的制定和贯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第六章阐述了彭德怀关于深察敌我利害、着眼全民战争力的发挥、在积极防御和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现势、把握战略布势的关节点、时变法移等战略谋划的基本思路 and 着眼点。

战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中最为强烈的活力对抗，其胜负是构成战争力量的各种要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兵法”这一驾驭战争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说即是准确把握各种战争力量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辩证关系的学问。彭德怀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军事领域中，对武装活力对抗中的辩证关系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理论阐发。本书第七章对其军事哲学思想这一兵法的灵魂进行了探讨。

“以治为胜”是中国古代兵法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彭德怀将这一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人民军队的建设之中，积累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了极其丰富而有特色的治军经验，无论在治军实践上，还是在治军理论上，均有重大建树，提出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治军方针原则和理论。本书第八章从治心、治训、治纪、治将、爱兵、爱民六个方面阐述了彭德怀的治军大略。

彭德怀兵法内容宏丰，本书所论述的内容，只是作者在研究中所认识到的东西。由于水平所限，很可能是挂一漏万，不足乃至错误之处欢迎军事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第一章 敢当大任挽狂澜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

在彭德怀的军旅生涯中,毛泽东曾两次以此诗赞誉他。1935年10月,彭德怀指挥红军,于吴起镇击退尾追进剿的马鸿宾、白凤翔两支劲敌,从而结束了长征路上敌人的追剿,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划上圆满的句号。毛泽东欣然命笔挥就了这首赞誉彭德怀的诗。1947年,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攻陕北,彭德怀主动请缨指挥陕甘宁部队,以2万之众迎战10倍于己之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即从根本上扭转了陕北战局,当彭德怀赢得沙家店全歼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这扭转战局的关键一仗时,毛泽东又以此诗赠彭德怀。在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中,获得毛泽东如此之高赞誉者是绝无仅有的。这首为今人广为传诵的诗,是对彭德怀无畏的战斗精神、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屡挽危局的赫赫战功的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 一、闹棠·除霸·起义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潭县西南乌石峰下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6至8岁在其姨父肖云樵家念过两年私塾，8岁时迫于生计而辍学。还是童年的彭得华即靠砍柴换米分挑起养家的担子。15岁前先后当过富农家的放牛娃、煤窑里的车水工。在苦难中挣扎的彭得华，痛恨人世的不平，从小即开始了“穷苦人的活路在哪里”的思考。这时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两点：

一是太平军的故事。彭得华的伯祖父曾参加过太平军。经常给少年彭得华讲太平军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啦，平田土啦，我便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sup>①</sup>。

再就是乌石峰的传说。在高耸入云的乌石峰顶上有座祠堂，祠中有一尊威风凛凛的武将塑像，相传他是元末义军陈友良的参政易华。陈友良兵败后，易华带领一支人马来到乌石峰凭险据守，打富济贫，后被官军杀害。当地民众为纪念他在此建祠立像。彭得华深深地被易华的传说所感染，立志要像易华那样，为穷苦人摆脱苦难献身。

因此，打富济贫，替穷人找活路，成为彭得华革命人生的最初追求。而将这种追求付诸行动的第一次尝试便是“闹柴”。

1913年，湘潭地区发生大旱，粮田颗粒无收，树皮、草根、观音土都成了充饥之物。地主、富商乘机囤粮居奇，广大饥民走投无路，纷纷起来“闹柴”（强迫富户平价卖粮给饥民），彭得华成了闹柴饥民中最年轻、最勇敢的一员。一日乌石寨的饥民到李家瓦屋“陈满钻子”家索粮，但任凭饥民们如何请求，家有数年陈谷的“陈满钻子”却一口咬定无粮可柴。彭得华挺身而出，爬上陈家仓房屋顶，将瓦推下，露出米仓。并鼓

<sup>①</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动说,他不柴,我们就自己拿。众人蜂拥而上,将三间屋瓦扒下过半。陈家无可奈何,只好按饥民们的要求开仓放粮。这次“闹柴”使彭得华第一次感受到了穷人反抗斗争的力量,同时造成了彭得华走出鸟石狭小天地的机缘。彭得华在“闹柴”中的鼓动作用,引起了富户们的仇恨,他们告到县府,县团防局以“聚众闹柴,扰乱乡曲”的罪名拿办彭得华。为躲避官府的缉拿,年仅15岁的彭得华,带着铲除人间不平的渴求,离开鸟石,开始了他漫长的为天下穷人找活路的征程。

彭得华离开鸟石后,到洞庭湖南滨的西林围当了修堤工。由于他多次参加停工、罢工以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于1916年春节前,被当局认定为“不安定分子”而遭驱逐。时值湘军在长沙招兵,刚毅、倔犟的彭得华走投无路,愤而投军。1916年3月中旬,在湘军第二师六团当了一名二等兵。由于在作战中机智勇敢,到1920年,先后升为一等兵、副班长、班长、排长。从军后的彭得华,并没有改变为穷人找活路的人生目标,这期间共交结了20多个志趣相投的青年士兵朋友,并在1920年夏,与李灿、张荣生、席洪全等7人秘密组织了“救贫会”,其宗旨是:灭财主,平均地权;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发展实业,救济穷民;实行士兵自治,反对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他们的第一次救贫活动是处死地主恶霸区盛钦。

1921年夏,彭得华升任代理连长,带一加强排驻扎在华容县滋口镇。每到一地彭得华都要到民众中去了解民情,一个叫姜子清的农民向彭得华哭诉了他多年淤积起的湖田被区盛钦霸占的遭遇。区盛钦是该镇税务局兼堤工局局长,乃当地一霸。他仗着其兄是赵恒惕省署的高级参议,横行一方,不仅巧立名目增加税收,而且霸占穷人良田房产、苇地湖面。彭得华决心为民除害。他召集救贫会进行商议,派出王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绍南等三名救贫会员黑夜摸到区盛钦家将其杀死。并贴出匿名布告,宣布区盛钦的罪状,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三个月之后,彭得华秘密处死区盛钦的事被人告发,派人将彭得华拘捕,幸在解往长沙的途中得以逃脱。

1922年夏,湖南创设陆军讲武堂。六团团团长袁植想到少年英武、胸有大志并在战场上两次救过自己性命的彭得华。要他改名应考,以便重返六团。经黄公略等救贫会友相邀,8月,彭得华改名彭德怀,与黄公略、张荣生一起考入讲武堂,编在第一教授班。讲武堂教授的课程有四大教程(战术、地形、筑城、兵器)、四小教程(操典、野外条令、射击教范、内务条令)、军制学、马术、山炮战术等。这使得已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彭德怀又有了相当的军事理论素养。

1923年8月,彭德怀从讲武堂毕业,回到六团一营一连任连长。1926年7月,湘军第二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原三旅六团改编为第一团。彭德怀升任一团一营营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进攻武昌时,一团奉命配合北伐军先遣队叶挺独立团行动,团长因惧战而告假,一团由彭德怀指挥,显示出了超群的指挥才能。1927年6月,一师被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10月,彭德怀任独立五师一团团长。

北伐期间,彭德怀结识了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在段德昌的引导和帮助下,彭德怀开始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自己,阅读了《新青年》、《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大量进步书刊。这对于苦苦求索中的彭德怀来说,如同茫茫黑夜中见到了曙光。多少年来,他向往太平军,想做易参政,立志打富济贫,富国强兵,但他的理想被严酷的社会现实撞击得粉碎。现在他才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才能使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得到解放。于



是 时任营长的彭德怀在本营组织士兵会 ,宣传革命思想 ,开始了改造旧军队的历程。

1927 年 ,蒋介石背叛革命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行了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 ,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中国共产党决定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等武装起义。就在这考验革命者的紧要关头 ,中共湖南省委于 1928 年 2 月批准了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从此 ,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入党后他就开始考虑率部起义 ,但党组织指示其进一步在五师全师范围扩大革命力量 ,等待时机 ,争取全师起义。

彭德怀为培养革命骨干 ,任团长后就打算办一个学兵连。独五师师长周磐为培植和扩大自己的势力 ,也想办一所随营学校。彭德怀认为可利用支持周办随营学校的机会 ,在学员中秘密发展吸收士兵会员 ,以此准备起义。因此积极支持周的主张 ,并建议周自任校长 ,推荐共产党员黄公略担任副校长 ,贺国中、黄纯一分别担任教育长和大队长 ,使随营学校实际上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中。

1928 年 6 月 ,何健命独立五师开赴平江接防 ,以加强对平江农民运动的镇压。平江地处湘东北 ,东接江西修水 ,北与湖北通城毗连 ,当湘鄂赣三省要冲 ,为兵家瞩目之地。1928 年春 ,平江农民在中共平江县委的领导下 ,先后爆发了三次围攻平江城的“扑城”运动 ,3 月发动的第二次“扑城”运动 ,参加的群众达 10 万余人 ,在反动派血腥镇压下而告失败。整个平江地区成了屠杀革命者的刑场 ,同时蓄积着新的革命风暴。彭德怀义愤填膺 ,一方面采取各种办法制止反动派的屠杀 ,一方面利用敌人的暴行唤起士兵对革命群众的同情和对反动派的仇恨。

7 月 18 日 ,彭德怀得知党的南华安特委组织遭破坏 ,周

磐认出特委人员所持的通行证是黄公略亲笔签发的。并在电报局截得周磐令江副师长立即逮捕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三人的电报。情况紧迫,彭德怀决心立即举行起义。此时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从长沙来平江视察工作,彭德怀即与他取得联系。当日晚,彭德怀召开一团党员紧急会议,讨论决定22日举行起义,以闹饷为发动士兵的手段。由彭德怀负责起义的部署指挥,滕代远负责政治工作。

7月22日上午,一团在平江城东门外天岳书院操场举行起义誓师大会,彭德怀宣布起义的目的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土豪劣绅,解除反动武装;建立工农政权,成立工农红军。彭德怀号召全体士兵勇敢地投身革命,得到了士兵们的热烈响应。下午1时起义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平江县城,仅用1个多小时就解除了全城2000余名反动军、警、民团的武装,活捉了县长和清乡督察员等反动分子,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群众。23日,独立五师随营学校在贺国中、黄纯一的领导下到达平江参加起义。此时任独立五师三团三营营长的黄公略于22日在平江嘉义镇举行起义,并于23日到平江城汇合。起义后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和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推选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

湖南反动当局闻讯后惊恐万分,急派重兵进攻平江。经激战,红五军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终因众寡悬殊于7月30日撤出平江城。

平江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的极端艰难的时候举行的,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对工农红军的发展和壮大,对整个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 二、纵横驰骋湘鄂赣闽

彭德怀率红五军退出平江城后,向东乡龙门转移。为在政治上建设五军,彭德怀决定部队在龙门进行整训。首先建立了五军政治部,由党代表滕代远兼任主任;然后从军到连建立了党代表和各级党组织,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健全了士兵委员会,实行新型的民主制度。9月,湘鄂赣三省敌人联合向红五军发动“会剿”,彭德怀利用“打圈子”战术,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10月下旬,在渣津歼灭敌人一个整营,粉碎了敌人的“会剿”。10月底,五军军委和湘鄂赣边五县(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县委在铜鼓幽居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湘鄂边特委和根据地,将五军和地方游击队合编组建为三个纵队和一个直属特务大队,黄公略率二纵队留平浏地区坚持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率主力去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会师。朱德、毛泽东获知彭德怀部队南进,派何长工、毕占云率200余名士兵下山接应五军。12月11日,两军在宁冈新城召开了会师大会。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使蒋介石大为不安,急调湘赣两省6个旅共3万人,分五路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会剿”。1929年1月上旬,红四军前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向敌人后方赣南进军以解井冈山之围和解决红四军的给养问题;由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

彭德怀受领任务后,连夜召开红五军军委会议传达联席会议决定。对此军委委员大感意外。认为红五军上井冈山主要是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和学习红四军的建军、建政、建党经验,现在的目的已经达到,应该回湘鄂赣边苏区,不然在那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里坚持斗争的二纵队也会遇到很大困难。在此严重的时刻，彭德怀从革命大局出发，力排众议，在滕代远的支持下，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勇敢地挑起了保卫井冈山的重任。不久，20倍于我之敌围攻井冈山，红五军浴血奋战数昼夜，黄洋界和八面山哨口失守后被迫向赣南方向突围。在敌人重兵追堵下边战边走，最艰险时只剩下283人枪。但彭德怀仍以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指挥艺术率领部队与敌周旋，接连取得了袭雩都、攻远安、夺瑞金的胜利，使部队获得了扩充和发展。4月1日，在瑞金与红四军再次会师。

会师后，红五军根据红四军前委的决定，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二上井冈山，恢复湘鄂赣苏区根据地，边区形势好转，红五军也得到了发展。1929年8月，彭德怀率部重返湘鄂赣边，与黄公略率领的第二纵队汇合。这时全军已发展到3000多人，恢复了红五军番号。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春，红五军发展到六七千人，成为红军中一支强大的力量。6月，红五军奉命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五军、第八军和第十军。此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已占统治地位，命红三军团进攻武汉。彭德怀认为，敌我力量悬殊，进攻武汉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决定先扫清鄂南，略取岳阳。遂指挥红三军团连续攻打鄂城、嘉鱼、通山、通城，并乘胜南下攻占了岳阳、平江。国民党军阀湖南省主席何键慌忙调3个旅进攻平江。彭德怀面对强敌，抓住其分兵的弱点，在瓮江、金井连破敌军，乘胜追击，强渡捞刀河，攻下梨市。并于7月20日一举占领长沙城，缴获枪支4000多支，扩大红军7000多人，筹款数十万元，从狱中救出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是红军时期攻占的惟一的一座省城，成为我军初创史上的一次著名战例。

1930年8月,红三军团与朱德、毛泽东的红一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3月,彭德怀协助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四次“围剿”。第一次反“围剿”,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方针,当敌军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进入红军待机地域小布附近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从右翼断敌退路,配合一军团取得大捷,俘敌9000多人,活捉张辉瓒。红军乘势挥戈东进,三军团于东韶追歼敌五十师大半,缴获甚多。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彭德怀指挥三军团在一军团的密切配合下,首战东固、二战中村、再战建宁,三战三捷。第三次反“围剿”,彭德怀指挥三军团与一军团并肩作战,先在兴国东部莲塘全歼上官云相七十三师,继在永丰县南消灭郝梦麟部两个团,接着,彭德怀指挥三个师在兴国西高兴圩截击敌人。敌人以两个团的兵力占领方石岭有利地形,用强大的火力把我突击队压在山腰,滕代远负伤。彭德怀挥刀跃马,冲锋在前,士气大振,一举突破敌阵地。彭德怀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在方石岭全歼韩德勤五十二师并九师的炮兵团。第四次反“围剿”,彭德怀指挥三军团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围攻丰南城,在援敌进至黄陂登仙桥附近时,三军团突然发起攻击,激战两天,全歼敌五十二师,活捉师长李明,歼敌五十九师大部,活捉师长陈时骥。其后,又在草台岗战役中与红一军团和二十一军、独立师密切配合,歼敌十一师大部、九师一部,击毙十一师师长。

这时,中央推行“左”倾军事路线的领导者撤销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实行了“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军事指导,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离作战。1933年7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组建东方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滕代远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任政委(杨尚昆继任),率军入闽,先后攻占泉上、朋口,使宁化、清流、归化等苏区联成一片。继而又攻占连城。8月中旬,东方军又挺进闽中,攻占洋口、峡阳,围南平、顺昌。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敌人攻占黎川,彭德怀奉命率东方军回师江西。在黎川洵口,全歼敌六师之十八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中央实行了一条“左”倾军事路线,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的错误战略战术,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这期间,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彭德怀积极建议中央联合、支持十九路军,乘蒋介石将围攻红军的部队调往福建之机,红军主力向闽浙赣边区进军,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南京、上海、杭州。可这一正确的意见未被接受,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机。使蒋介石解决福建事变之后,得以集中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以11个师沿10华里的正面向苏区北部重镇广昌推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急调一、三军团九个师的兵力防守广昌,与敌“决战”,李德亲自赴广昌督战。彭德怀认为,红军无重武器,广昌无法坚守,再三向中央建议主动放弃广昌,避免与强敌决战。然而李德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结果激战一天红军受到很大损失,被迫撤出广昌。

广昌战役后,彭德怀与李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说:“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团村战斗,若一、三军团不分离作战,集中力量,就能消灭敌军3个师15个团,而你们却坚持分兵,打成了消耗战。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那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快八年多了,

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造根据地之不易,现在却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不心痛’”<sup>①</sup>。翻译伍修权把彭德怀的话刚翻完,李德暴跳如雷。连声大吼:“封建!封建!你是因为被撤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刚直不阿的彭德怀怒斥李德“无耻”。李德常自居于中央之上发号施令,无人敢顶撞。彭德怀已往最坏处作了打算,他回去以后将铺盖一卷,准备被撤职、关押、杀头,为了革命事业,他什么也不怕。李德也许慑于彭德怀在红军中的威望,也许因为还得靠彭德怀打仗,没有处分彭德怀,只是给他加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红军撤出广昌后,敌人分六路向根据地推进,彭德怀指挥三军团在高虎垌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但中央根据地的军事失败已无法挽回。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 三、“惟我彭大将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共8万余人,从福建长汀、江西瑞金向雩都集结,尔后突围。蒋介石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西进的方向进行阻截。10月17日,彭德怀指挥三军团乘大雾越过雩都河,22日,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11月6日,从左边突破湘军何键在汝城至思村之间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11月10日,彭德怀指挥三军团攻占宜章城,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当日,中央军委发电嘉奖彭德怀同志和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两封锁线时的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sup>①</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蒋介石为阻止红军西渡湘江,又急调了几十个师在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当时,在敌人密集布阵的阻截下,红军掩护着庞大的中央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前进,彭德怀认为这种走法后果不堪设想。他建议中央:三军团向长沙、益阳挺进,吸引敌主力,迫使敌人改变部署;中央率一、五、八、九军团进占叙铺,创建根据地;甩掉笨重的辎重,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在运动中调动、歼灭敌人,变被动为主动。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却一意孤行,命令红军全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11月29日,三军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首先渡江,抢占渡河口界首。敌以五个师向渡口猛攻,彭德怀赴江边亲自指挥这场关系重大、异常严酷的战斗,血战三昼夜,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的任务。红三军团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整个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到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多人,所带辎重亦损失殆尽。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彭德怀率三军团为左翼,1935年1月,以一个师协同一军团二师及干部团攻占遵义城。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彭德怀出席了遵义会议,在会上发言批判了王明路线和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拥护和支持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后,彭德怀奉命指挥三军团任前卫,向同梓、遵义挺进。2月25日,中央决定将一、三军团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攻打向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的天险娄山关,彭德怀亲临火线,以两个团正面进攻,另两个团从侧后迂回突击,攻占了娄山关,乘胜挥师直逼遵义。27日晚再克遵义。在遵义城北与敌援军吴奇伟部激战,在一军团的增援下,将吴部大部歼灭。是役全歼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遵义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的最大一次胜仗。

遵义战役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第二、第三次渡赤水,在几十万敌军中穿插。彭德怀率三军团逼进贵阳掩护主力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彭德怀以十二团、十三团佯攻贵阳,苦战两昼夜。使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穿插过湘黔公路南下,跨过北盘江、直趋金沙江南岸。5月初,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北上,将敌人远远甩在江南,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彭德怀出席会议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红军北进的方针。8月底,红军到达巴西地区,在张国焘阴谋要挟中央南下之际,彭德怀派十一团秘密保卫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为解决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机,9月12日,中央在川甘边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将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陕甘支队经过回民地区,连续突破敌人西(安)兰(州)大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十五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此时一路尾随红军之敌马鸿宾、马鸿逵部和东北军的骑兵部队又来进犯,彭德怀指挥红军奋起迎战,10月21日,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将马鸿宾的三十五骑兵团打了个措手不及,纷纷落马溃逃。接着,又把东北军白凤翔部骑兵先头团打垮和击溃敌人三个团。红军经过此次战斗,结束了敌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人的追剿。就在这时,毛泽东写下了“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诗句,以赞扬彭德怀披坚执锐,敢当大任挽危局的英勇气概。

1935年11月初,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指挥作战。同时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蒋介石乘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命东北军约10个师的兵力进行围攻。彭德怀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全歼敌一〇九师并一〇六师的一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举行东征,将红军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2月20日,先锋队强渡黄河,挺进山西。30日,在兑九峪歼阎锡山两个团。其后一军团南下围攻同蒲铁路线上的霍县、赵城,十五军团北上逼太原。蒋介石急从洛阳、徐州等地调重兵入晋,派陈诚协助阎军作战,封锁黄河,截断红军退路。为避免不必要的决战,以利团结抗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命抗日先锋队回师西渡,撤回陕北。此次东征历时75天,扩大红军8000人,筹款30万元,在山西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发动群众,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运动。

为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的新的“进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命令,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陇东进发,以巩固抗日后方,争取接受国际援助和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经过5个多月的战斗,于10月8日在会宁东南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22日,在会宁东北与二方面军会合,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了胜

利会师。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惊恐不安,急调几十个师的兵力围攻红军。11月中旬,胡宗南第一军占领了同心城。11月19日至21日,彭德怀在山城堡预设战场亲自指挥红军向敌军发起攻击,全歼敌人一个旅两个团。迫使胡军向西撤退。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军退守潼关、天水。历时半年的西征胜利结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彭德怀任红军前线总指挥,率红军主力驻陕西渭北三原、耀县地区,为抗日民族战争进行准备。

### 四、“与华北共存亡”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于1937年8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仍沿称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三个师共4.2万人。开赴抗日前线,加入第二战区序列。

红军出师伊始,彭德怀就提出了红军出师要打胜仗,振扬声威,打击恐日病。9月5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应阎锡山之邀,前往阎的第二战区前线司令部共商御敌之策。彭德怀具体提出了以友军坚持平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五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一二〇师则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机侧击进攻雁门关之敌。阎锡山表示同意。9月19日,一一五师抵平型关之大营镇集结待命。23日,朱德、彭德怀命一一五师选择有利地形,进入伏击状态,相机出击。25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外向正在开进的日军坂垣师团一辎重部队发起突然袭击,歼灭日军1000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创抗战以来首次大捷，军民振奋。

日军在平型关受阻，改由雁门关突破长城。为配合友军忻口会战，朱、彭指挥八路军在敌后方广泛出击。10月18日，一二〇师于雁门关歼敌一个辎重大队，毁敌汽车230多辆。19日，一二九师陈锡联部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在八路军英勇作战的支持下，忻口友军奋勇抗击日军28天。

敌忻口久攻不下，采用大迂回战术，集中平汉线兵力强攻娘子关，沿正太路西进，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各军争路西退南逃，山西局势大乱。华北抗战前途如何，为全国军民所关注。11月5日，彭德怀在晋东向记者发表谈话宣告：“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密切合作，与侵略者周旋。”“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这一宣告，成了八路军八年抗战的宣言。

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进入敌后管涔山、五台山、恒山及太行山区，并挺进冀南、冀东、平西。在平汉、正太、同蒲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基层抗日政权，收拾崩溃的社会局面。经过短短的两个多月，八路军在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抗日战场。

1938年3月，日军攻陷临汾、风陵渡，国民党在山西的30万军队大部分退至汾河以西、黄河以南。朱、彭指挥二战区之东路军（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一二九师、山西新军决死队以及山西友军的十个师）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建立抗日支点。为鼓励和帮助友军坚持山西，朱德、彭德怀在沁县以南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详细阐述了敌后抗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及

军队政治工作、民众工作、敌军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等，使与会友军将领对我党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建军思想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4月，日军以3万余兵力，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朱、彭以八路军一部和友军阻击分进之敌，而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一部，于武乡、榆次间待机歼敌。4月16日，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在武乡县长乐村歼敌2000余人。其他各路敌军纷纷退出，我军乘胜追击，收复晋东南18县，为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八路军总部即驻于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依托，指挥华北敌后抗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反九路围攻胜利后，针对日军主力集中于正面战场进行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情况，彭德怀协助朱德一方面部署各部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交通战，对敌华北各主要交通线进行破袭，牵制日军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正面战场的作战。同时，以极大的精力创建抗日根据地。至10月，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我在华北敌后的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三大根据地基本形成。一一五师主力又赴山东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对国民党军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把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从华中战场抽回5个师团“扫荡”华北。从此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另一个广阔战场。八路军经常抗击着2/5以上的侵华日军。

随着八路军队伍的不断扩大，新成份增多，部队素质亟待提高，部队的武器弹药等军需供给也日趋困难。1938年2月，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了对八路军进行轮训整军，在太行山建立军事工业，在根据地设立银行和加强干部培养的四项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1939年，八路军完成了60个团的第一期整军。在朱、彭的亲自筹划下，于黎城县黄崖洞和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辽县梁沟建立了敌后第一批兵工厂，在冀南开设根据地银行发行本位币；八路军举办了多种训练班，抗大从延安迁到了前方；为抗日决死队派去高级干部讲授游击战战术，提高其作战水平。这些深谋远虑的建树，对坚持敌后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八路军在敌后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和攻击。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他们不断在河北、山西制造磨擦。1939年12月，阎锡山乘彭德怀在宜川与其谈判之际，发动了山西事变。调动大军进攻抗日决死队、牺盟会，袭击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中央军朱怀冰等部则进攻我太行区。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原则，朱、彭指挥八路军打出了“第二枪”，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稳定了太行区及冀南的形势。1940年5月，朱德奉中央指示回延安，此后彭德怀全权担负起指挥八路军作战和领导敌后根据地建设的重任。

日军自回师华北以后，大修铁路据点，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封锁、切割和蚕食抗日根据地，形势极为险峻。打破“囚笼”政策是八路军面临的最为紧迫的战斗任务。彭德怀分析认为，敌之新的伎俩尽管使我敌后抗战的环境更加险恶，但敌人也暴露出无法克服的弱点：“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sup>①</sup>经过两个多月的侦察和酝酿，彭德怀决心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在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的缜密筹划下一个重大的战役行动方案形成，并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贺龙等八路军各部主要领导人的一致赞同。7

<sup>①</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月22日,彭德怀签发了朱、彭、左给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关(向应)并报中央军委关于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8月8日,发布了作战行动命令,区分各部队的任务。命令聂集团以10个团的兵力破袭平定东至石家庄段正太路线,刘邓集团主力8个团和决死队两个团破袭平定榆次段正太线,贺、关集团以4—6个团破袭同蒲线北段。同时要求三个集团均以部分兵力对北宁、津蒲、德石、沧石、白晋铁路及各主要公路进行宽正面的破袭,相应克复若干据点。规定8月20日统一行动。

8月20日晚8时整,在华北广大战场上,八路军和决死队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利用青纱帐掩护,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一夜间,正太路上敌人控制的车站、桥梁、水塔、据点大部被炸毁,枕木被焚烧,铁轨被搬走。各部频频向八路军总部报捷。由于各集团参战极为踊跃,其兵力大大超过预期的20多个团。到22日,投入兵力达105个团,故定名为“百团大战”。

整个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正太铁路为重点,进行交通总破袭战。敌连结平汉、同蒲路的交通动脉和重要煤矿井陘矿受到严重破坏,北宁、同蒲、沧石、德石等路亦被截断,公路路基路面被挖得千疮百孔。日军联络中断,到处被动挨打,陷入一片惊恐之中。第二阶段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共拔除了1000余个据点,一二九师攻克了榆社、辽县两城。第三阶段,反击敌人的报复扫荡。至12月5日,整个战役基本结束。此期间,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伪军4.4万余人,攻克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和隧道260多处,缴获各种火炮53门,各种枪支5800多支(挺),以及大量的军事物资。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百团大战给予高度的评价。9月10日,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时局趋势的指示》中指出:在抗战阵营中出现对日妥协危险倾向的情况下,“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深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无穷的希望”。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应仿效百团战役的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9月20日,延安各界举行万人大会,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和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毛泽东和朱德代表中央出席了大会。大会发出了致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慰问电。

百团大战发动之时,正是国民党军在宜昌新败之后,并正值日军170架飞机轰炸陪都重庆。重庆被一片悲观失败情绪笼罩着。八路军在前线胜利出击的消息,使气氛为之一变。各报竞相登载消息评论,慰问信电纷飞华北八路军总部。蒋介石亦不得不发电朱德、彭德怀,对八路军的英勇作战表示嘉勉。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向日寇发动的最大的一次主动出击,是华北敌后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它体现了彭德怀独特的军事胆略、指挥艺术和作战风格。其运筹之巧妙、发动之隐蔽、指挥之有效,都在抗战史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而富有特色的一页。

百团大战后,日军增兵华北,将过去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升格为“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在其占领区厉行清乡,配合保甲连坐;在敌我争夺区并村编乡,大搞自首,实现伪化,对根据地加强扫荡、封锁、蚕食。敌人所到之处,一律实行“三光”,许多村庄变成了废墟。国民党乘八路军根据地之危,于1940年11月停发了八路军薪饷和武器弹药的供应。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最艰难、最严酷的时期。



这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奉命调回延安为党的“七大”做准备，此后，彭德怀实际全面担当起华北敌后党政军民抗战的领导重任。1941年11月彭德怀在中央北方局会议上，提出了粉碎敌人“治安强化”政策的一整套新的对策和方案，强调大力开展敌占区、接敌区群众工作与瓦解敌伪分子、伪组织工作。这一对策在实践中发展“敌进我进”的方针。使敌人重新构筑起来的“囚笼”——数万里的封锁沟、纵横交错的交通线、碉堡群再次被我砸碎。

1942年5月，日军以2万余兵力“扫荡”太行，奔袭合围八路军指挥机关。八路军总部转移至辽南艾铺被敌机发现。5月24日，彭德怀、左权决定分路突围，彭德怀率总部战斗人员从敌人火力封锁网中突击而出，左权在突围中英勇牺牲。中央考虑总部的安全，致电彭德怀，建议总部移驻晋西北。彭德怀复电中央，认为太行区为华北重心，晋南、豫北等新区尚须就近指导，总部移驻晋西北政治上将有影响。他建议将大批干部送回延安，自己则仍率总部坚持在太行指挥华北敌后抗战，直到1943年9月应中共中央之召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此后，彭德怀在延安杨家岭协助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继续指导华北敌后战场斗争。1945年4月，彭德怀参加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七大”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彭德怀兼任军委总参谋长。

## 五、建功西北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边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边积极准备发动内战。1946年6月，悍然撕毁了停战协

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遭到严重打击后,改为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陕北战场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敌人在西北共有34个旅约23万余人,在陕甘宁边区南线是全副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集团,西北线是马家骑兵。而整个陕甘宁的部队不过2万余人,武器装备多是步枪、手榴弹和少量机枪,平均每枝枪只有一二十发子弹。中央在全面分析敌我形势后,确定了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劳十分缺粮的境地,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中央首脑机关不离开陕北,钳制胡宗南集团的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于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上的作战。力量如此悬殊,要实现中央的作战意图,拖住打败胡宗南,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进而解放大西北,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是可想而知的。这需要一位有崇高威望和卓越军事才能的统帅来指挥这场事关中央安危和解放战争全局的较量。当时陕甘宁晋绥联军司令贺龙忙于主持晋绥根据地的整党、土改、整军等工作,无法脱身。谁来当此重任?正在党中央、毛泽东为此思虑之时,身为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请缨。他对毛泽东说:“在贺龙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sup>①</sup>毛泽东赞叹说:“很好!你这是临危请命,为党分忧。可谓肝胆照日月,忠心垂千古啊!”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随即组建了西北野战兵团(7月31日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下辖一纵、二纵、教导旅和新四旅。

<sup>①</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页。

3月18日夜,当敌人进至延安南三十里铺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才离开延安。送走中央和军委机关之后,彭德怀继续在延安指挥各部队的撤离行动,直到19日晨才最后撤离。20日中午,彭德怀率指挥机关抵青化砭西北梁村,在这里召开了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别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工作人员共56人。从此,彭德怀率领着精干、高效的指挥机关,在广阔的西北战场与敌人斗智斗勇,指挥不到3万的英勇气弟兵,与敌20多万大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胡军占领延安后非常骄狂,以为我军不堪一击,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彭德怀抓住敌人这一心理,命令一纵独立一旅以1个营的兵力,在敌进占延安后,在延安西北节节抵抗,诱使敌军向安塞方向追击。同时,部署6个旅,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约70里的青化砭附近地区待机歼敌。胡宗南果然中计,以5个旅向安塞方向追击,而以1个旅向青化砭方向担任侧翼掩护。23日晨,彭德怀亲自到青化砭一带察看地形,部署我主力沿咸榆公路两侧布成一个口袋阵。在我埋伏的两天之后,敌人果然自投罗网。我军仅用两个多小时,全歼敌三十一旅直属队与所属九十二团2900多人,活捉旅长李纪云,首战告捷,军心大振。

接着,彭德怀以小部兵力为胡宗南10万大军当导游,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之间跋涉转游,将敌人拖得人疲马乏时,在羊马河再歼敌之一三五旅4700多人,生擒旅长麦宗禹。

胡宗南找不到我军主力而自己却连遭歼灭性打击,极为急躁,欲与我之主力决战的心情更加迫切。彭德怀再使诱兵之计,从各旅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部队装成西野主力,摆出欲东渡黄河的架势,将敌主力由南向北引向绥德地区。

乘敌后方空虚之机,隐蔽在瓦窑堡西北山沟的西野主力直取敌人的后方补给基地蟠龙镇,激战三日,全歼守敌一六七旅,活捉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该旅旅长李昆岗。缴获了堆积如山的面粉、军服、武器弹药、药品等军用物资。此役使敌人10万多人供给告急,极大地动摇了其军心,同时解决了我军极端困难下的物资补给。

撤离延安一个半月,西野三战三捷,稳定了西北战局。在撤离延安之初,边区的群众中存在着恐慌情绪,部队中也有人信心不足。随着西野在彭德怀指挥下连奏凯歌,民心士气大振,而曾不可一世的敌人则垂头丧气,叫苦不迭。

随后,彭德怀指挥西野出击陇东,横扫三边,北攻榆林,在沙家店地区消灭了敌西北战场上的三大主力之一的三十六师,完全扭转了陕北战局,敌人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的重点进攻彻底失败。10月上中旬,彭德怀发起和指挥了延(延长、延川)清(涧)战役,歼敌8000余人,活捉整编六十六师师长廖昂和二十四旅旅长张新等。10月1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情况和作战经验的通报,号召各战区学习研究西北战场的经验。1947年11月下旬至1948年2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和前委的领导下,利用冬季战斗间隙,在清涧、绥德、米脂、靖边等地区进行冬季整训。整训从土改教育入手,发动广大士兵开展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运动,在此基础上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战斗意志和战术技术水平。毛泽东对西北野战军的整训经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在全军加以推广,对于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新式整军,西北野战军的士气异常旺盛。自1948年初转入战略反攻。首先发起了宜川、瓦子街战役,共歼敌1

个整编军军部、2个师师部、5个旅计2.8万余人,取得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接着,西北野战军乘胜直逼关中,进军敌人后方西府,攻克宝鸡迫使延安守敌南逃,于1949年4月22日收复延安。此后,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长驱万里,横扫残敌,夺取西安,攻克兰州,挺进西宁,占领银川,和平解放新疆。全部解放了西北5省。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整个西北战场全歼蒋军1个长官公署、3个兵团部、4个保安司令部、2个警备总司令部、1个补给司令部、25个军部、61个整师、85个整团、43个整营,总计51.3万多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 六、受命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操纵联合国,组成以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的“联合国军”支援南朝鲜作战。6月27日,美海军第七舰队侵入我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南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10月1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在我国友好邻邦处境十分危急、我国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际,中共中央于10月4日派飞机召彭德怀进京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在多数同志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打这一仗的情况下,彭德怀却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的意见,并慨然接受了挂帅出征的重任。在《彭德怀传》中对当时的情景作了如下的记述:

下午4时,专机飞抵北京西郊机场……,车到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解释说,会议在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彭

德怀随周恩来进入颐年堂会议厅。毛泽东首先发言：“你来得正好，美军已开始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正在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请你准备谈谈你的看法。”彭德怀坐定，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他来京前，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来京时还不知道会议内容），这时只好侧身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支援朝鲜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理由主要是：国内战争创伤亟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战士有和平厌战思想等等。基于上述情况，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毛泽东在会议最后讲了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国家处于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因下午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未来得及发言，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毛泽东说：“老彭，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朝鲜的决策。”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朝鲜谁挂帅合适？”彭德怀说：“中央不是决定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驻东北的十三兵团大都是林彪指挥的原四野部队，因此毛泽东原拟派林彪率军入朝，但林彪不赞成出兵，称病推辞——作者注）以后，说：“我们的意

见这担子还得由你来挑,你思想上没有这个准备吧?”彭德怀沉默片刻,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讲:“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数路向‘三八线’以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彭德怀在下午的发言中讲了自己的观点:出兵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日,彭德怀即赴沈阳,进行出师的各项准备工作。10月19日,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在此前一日,彭德怀已率几名随员,冒着敌机的轰炸驱车两昼夜,辗转数百里,于20日在平安北道北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会见了金日成,商讨了志愿军的作战方案和中朝两军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

入朝前中央军委原确定志愿军先在平壤以北占领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待稳定战局后再相机歼敌。但志愿军入朝时,美军已攻占了我预定防御地区,24日,其先头部队已侵抵距鸭绿江35里处,根据情况的变化,彭德怀当机立断,令志愿军的2个师阻击东线之敌,而以另外5个军及1个师集中于西线,以军师为单位对冒进之敌进行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经过12个昼夜的战斗,到11月5日,共歼敌1.5万人,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骄横的麦克阿瑟不知道遇到了比自己高明的对手,低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量,凭借着强大的空军和坦克、大炮的优势,于11月6日,集中兵力向我志愿军阵地反扑。彭德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怀利用敌人恃强轻敌的情绪,命令志愿军主力后撤30公里,以小部队边打边退,诱敌深入。11月24日,敌军发动了所谓“圣诞节总攻势”。麦克阿瑟飞临战场上空“对联合国军”部队广播讲话,“要在两星期内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在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其东、西两路先后进入了彭德怀的预定战场。彭德怀指挥各部以突然而勇猛的动作奋起反击,断敌退路,将敌军几个师压在价川、德川以南,三所里、龙源里以北的狭小地域内,进行分割围歼,打得敌军尸横遍野,狼狽逃窜,志愿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北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共歼敌3.6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两次战役后,志愿军部队已相当疲劳,供应困难。彭德怀原来考虑部队在三八线以北转入防御,进行修整,补充兵员和给养,来年春季再进行新的战役。但毛泽东主席认为,我军如果打到三八线即停止进攻,将给政治上带来不利。要求志愿军尽快发动新的攻势,突破三八线。彭德怀从军事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命令部队放弃冬季休整计划,克服一切困难做好新的战斗准备。于1950年12月31日发起了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联合作战,共9个军30万余人,组成3个突击集团,一举突破了敌坚固设防的“三八线”阵地,1951年1月2日,敌全线向汉江以南撤退,我军乘胜追击,于1月4日解放了南朝鲜首府汉城。7日,我军部队已前进到“三七线”一带。这时彭德怀鉴于部队前进了80至110公里,但并未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共歼敌1.9万余人),从敌人虽有坚固防线但并未固守,由日本和美国国内调新生兵力约4个师,还由欧洲抽老兵补充部队集结在洛东江的预备防线等迹象看出敌是有计划南撤。识破了“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



归路”的企图。<sup>①</sup>因此,他果断命令部队停止追击,结束第三次战役。休整部队,严阵以待,做好粉碎敌人反扑的准备。

历史已证明彭德怀这一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时却不为一些人所理解,苏联驻朝鲜大使佐拉耶夫就指责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他向斯大林报告,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为此彭德怀给毛泽东发电,阐明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决策,并将彭德怀的意见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给苏驻朝大使回电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他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今后一切要听彭的指挥。

敌诱我军南进不成,即改变作战方案,于1月25日集中全部兵力,在大量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以步兵、坦克组成多路纵队,对我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1月27日志愿军被迫停止休整,立即投入防御作战即第四次战役。彭德怀依据敌我双方的情况,确定采取“西顶东放”作战方针。即在西线汉江两岸顶住敌人,东线有计划地将敌人放进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毛泽东在接到彭德怀作战方案电报后当即复电说:“部署甚好,预祝胜利。”按照既定的作战方针,志愿军西线部队坚守主要阵地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在东线,以中朝共7个军于2月5日开始对横城地区之敌实施反突击作战,至13日取得横城反击战歼敌1.2万余人的胜利。但是,这次战役是在我军减员较大,粮弹极端缺乏,战士衣服单薄,天寒地冻,构筑工事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战士赤脚作战。而第二番轮换部队还远在鸭绿江边。彭德怀对当前的严重局势和中朝军队的处境焦虑不安,而在此时有的同志仍主张继

<sup>①</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

续向南进攻以期速胜。他深感战场上的许多情况用电报说不清楚,经请示于2月21日从朝鲜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前线作战的情况特别是朝鲜战争不能速胜而应确立持久作战方针的理由,这一方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3月初彭德怀返回前线指挥作战。整个第四次战役,中朝军队经过85天的顽强奋战,歼敌7.8万余人。一败再败的麦克阿瑟恼羞成怒,公然宣布要把侵略战争扩大到我国沿海和内陆基地。可就在此时,他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撤了职。这个二战中战功赫赫的美国名将,在彭德怀手下成了一名败将。1951年4月下旬,彭德怀又组织指挥志愿军进行了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多人。

“联合国军”在前后五次战役的较量中均遭失败,认识到再越过三八线是不可能的。不得不于7月10日开始谈判停战问题。此后,志愿军坚持持久作战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转入阵地防御作战,以“零敲牛皮糖”的战术来消耗和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配合谈判斗争,先后取得了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和战术性反击俘毙伤敌17.7万人的胜利,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斗争的胜利,1952年秋全线性战术反击歼敌16.9万人的胜利,1953年夏反击战役歼敌12.3万余人的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同意接受和平条件。1953年7月27日,双方代表在板门店对停战协议进行了会签。28日,金日成、彭德怀、美军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克拉克承认:“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1953年7月31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在平壤隆重举行授勋典礼,将朝鲜最高荣誉——“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以表彰他率领和指挥中国人民志

愿军为协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8月10日,彭德怀乘火车回到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数千人在北京车站举行了“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胜利归国”的盛大欢迎仪式。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

彭德怀自1950年7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和以美国为首、以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战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彭德怀以他远大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同志愿军其他领导人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这场使全世界为之叹服的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歼敌100余万人(其中美军39.7万余人),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三八线”,并将战线一直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而彻底粉碎了美国侵略者妄图占领全朝鲜并进一步扩张的战略计划,有效地保卫了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安全保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中国军队为祖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彭德怀不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不愧为百万志愿军英雄战士的英明统帅。

### 七、开拓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之路

1952年春,彭德怀因病回北京就医后,中共中央决定他留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29日,彭德怀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月,中央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恢复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彭德怀任军委委员。在毛泽东主持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上,确定以后在一般情况下,军委会议由彭德怀主持。从此他又肩负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他是一位杰出的统帅,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建设上又是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彭德怀回国后,即着手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朝鲜停战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增加了有利条件。然而新的矛盾摆在彭德怀面前。一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的强大国防”,“我们不但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秀的现代化的军队”的军队建设目标,军队各系统各军兵种要求实现现代化的愿望都非常强烈;另一方面,中央做出压缩行政开支,要求当年全国压缩支出12.3万亿(旧币,相当于现币12.3亿,以下类推),其中要求军费减少3万亿元,使包括军费在内行政开支不超过总支出的30%的决定,以便有更多的经费用于经济建设。也就是说,既要压缩军费,又要实现军队的现代化,两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为了从这一矛盾中找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1953年8月21日至9月4日,彭德怀连续三次召开扩大的军委例会就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彭德怀在同大家讨论的过程中,着重阐述了几个观点,以统一大家的认识。

其一,我军现在所处的国内环境,既不是相当稳定的和平环境,也不是战争即将爆发的临战状态,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去安排军事工作。

其二,常备军建设,只是国防力量的一部分。必须从全面加强国防力量的角度去看问题,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必须

有利于国防工业的加强,有利于国家动员潜力的积蓄。

其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国防力量的物质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交通、通讯等设施,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防和现代化的军队。

据此,彭德怀提出军队精简整编的原则:国家武装力量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为在裁减人员的同时能保持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应多减机关,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兵种;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增建学校。并具体提出了步兵减少几十万,空军、防空军、装甲兵、炮兵、工程兵等不增不减,在原有基础上提高,海军可略有增加。随后,彭德怀于9月8日向毛泽东写出书面报告,提出了军队精简整编及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和军事训练等问题的意见,拟于11月下旬举行有各大单位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解决上述问题。彭德怀这一报告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四年来军事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军事工作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对军事建设的许多基本问题统一了认识:确定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军事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明确规定了军队的员额,把各特种兵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减少进口装备,挤出钱来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现代化军队应走的正确道路;确定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而训练干部又是这一中心工作的中心。这次会议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在我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时期,会议起到了明确方向、统一思想、整齐步伐的作用,成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开端。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高干会议之后,彭德怀把军事制度的改革提到了重要日程。全国政权的建立、相对和平环境,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形成的许多军事制度已不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与新的时代和环境相适应的军事制度,是新时期军队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彭德怀的主持下,经过科学论证,精心准备,人民解放军先后实行四大新的制度。

一是建立实行薪金制。战争年代我军一直实行供给制,军队干部只有少量的生活津贴,没有可用于维持家庭其他成员生活的费用,这在当时未夺得全国政权的环境下是可行的。全国政权的建立,地方政府薪金制的实行,军队仍维持供给制已对军队建设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彭德怀力主将军队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他在1953年9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里说:“不实行薪金制,则广大的下层干部生活已难以维持,亦难以巩固在军队工作的同志的意志。”并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薪金标准的原则:各级之间不要相差太多,要照顾到国家的财政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1955年1月薪金制度实行以后,他还一直注意各方面的反映,对原定的标准进行两次调整,使之更加合理。

二是推行义务兵役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已规定“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实行义务兵役制”。彭德怀到军委工作后即加快了其准备工作。1952年10月在军委人民武装部成立了兵役法研究室,11月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兵役法研究委员会,12月12日由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指示,开展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宣传教育。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确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度,1955年7月二次会议通过了兵役法,开始正式实行义务兵役制。

三是实行军衔制。1953年9月18日,彭德怀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 and 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行使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工作的上进心。”他在评衔工作中指出,评定军衔涉及到对每一个军人资历、贡献、级别、待遇的认定,授予一个军官什么军衔,不仅关系到个人荣誉,也关系到全军各部分的团结,高级干部影响尤大,因而需要特别慎重。为此彭德怀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元帅和大将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由政治局审议确定,彭德怀只参加讨论发表个人意见。而1000多名将军特别是其中几十名上将的授衔名单,则需由彭德怀主持拟定,上报中央政治局。从1955年春天开始,他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几个方案,分别与各方面反复商榷,衡量比较,进行调整。对少数有特殊情况的将领,彭德怀还直接和本人谈话,听取意见,提出组织上的考虑,使其心情舒畅。1955年9月彭德怀被授予元帅军衔。

四是建立勋章和奖章制度。1953年9月8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里提出了在军队中实行勋章奖章制度的建议:“颁发勋章、奖章条例,以代替过去不很完善的立功条例。”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和奖章的条例》、关于规定勋章和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以及《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和奖章的决议》。

上述四项重大制度的建立,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向高级阶段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对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在抓军制建设的同时,彭德怀集中主要精力抓了军队的教育训练。他在全军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军事训练是“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强调指出:“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在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过去我们的技术和装备比较简单,现在已逐渐在改变,过去我们主要是在战场上练兵,现在则主要靠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因此,如果我们今后不注意加强部队正规军事训练,就不可能使部队的战斗准备打好基础。”同时特别强调必须突出干部训练这个重点,指出干部训练是中心工作的中心。并认为现代化军队的干部训练必须坚持院校培养和在职训练并举的方针。一方面他用很大的精力指导军队院校的创办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在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全军已形成了初、中、高级院校相互衔接,指挥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合理布局的比较完整的院校体系。到1959年,全军各类院校共129所。另一方面,通过短期集训和组织军事演习的办法进行干部的在职训练。使整个部队特别是干部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军事训练最好的时期之一,这已成为公论。

为了加强新中国国防,彭德怀从1952年冬开始,每年抽出三个月时间到全国各地主要是边海防进行实地考察。到1955年底为止,他将北自鸭绿江,南到海南岛天涯海角的1万多公里的海岸全部勘察了一遍。对沿海的地形做到了心中有数,为讨论确定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准备了第一手材料。与此同时,他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军队为什么未能登陆英伦三岛,为什么在进攻苏联初期能够长驱直入,而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又为什么坚不可摧成为战略反攻的重要支撑点等有关经验教训和朝鲜战争的经验,作为他考虑战略方针的借鉴。



1956年3月,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战略方针问题。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保卫祖国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并详尽地阐释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这就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并根据战略设想提出了我军应主要采取的作战形式。在战争初期,我军既不单是运动战,也不单是阵地战,而应当阵地战结合运动战,也就是以阵地战的防御和运动战进攻相结合。<sup>①</sup>从这个战略方针出发,彭德怀还对军队建设和国防设施、战争动员准备工作、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规划。彭德怀这个报告,不仅系统地阐释了毛泽东和军委的战略指导思想,也包含着他自己丰富的军事经验。在会上经过讨论,上报中共中央,并得到批准下发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当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比例失调”、“浮夸风”等问题及其思想根源,向毛泽东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相继被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此后,以“反党集团”、“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了长时期的审查。文化大革命中,在林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37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彪、四人帮的迫害下 ,于 1974 年 11 月 29 日含冤逝世。

1978 年 12 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 ,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树的伟大功绩。12 月 24 日 ,党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在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说 :彭德怀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 ,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 ,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彭德怀是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 ,国内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 第二章 “盘旋式游击”

### ——战争海洋中弱小者的游泳术

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赢挠盛，断四经。

——《握奇经·八阵总述》

毛泽东曾形象地把战略战术比作战争海洋中的游泳术。在自然的海洋里，只有采用自己最擅长的游泳姿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胜似闲庭信步”，同样，在战争的海洋中，要不被火海铁流所吞没而到达胜利的彼岸，就必须选择最适合自身优势发挥的作战形式和战略战术。彭德怀认为，盘旋式游击，正是弱军在战争海洋中求得生存发展的“游泳术”。

在我军初创时期，彭德怀就指出，盘旋式游击，是红军惟一良好的战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进一步强调：“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惟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的重要部分”<sup>①</sup>。即使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彭德怀仍然认为“游击战是当前我军作战不可少的部分”<sup>②</sup>。只有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配合，游击战和阵地战的配合，不断以游击战袭扰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4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

敌人、分散敌人、消耗敌人，才能帮助正规战造成有利条件，最后战胜敌人。

游击战争之所以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决定的。对此，彭德怀在许多论著中作过深入的分析。主要观点是：

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力量必须有一个长时期的积蓄和锻炼过程，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式也必然经过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在革命力量还不足以与敌人进行正规战争较量时，游击战争必然成为我军作战的主体形式。其二，中国革命战争是最广泛和最彻底的人民战争，这一性质要求战争形式必须与之相适应。而“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sup>①</sup>；其三，中国幅员辽阔，而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敌人对各地区的控制是“不平衡的，不统一的。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间，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发展游击战”<sup>②</sup>；其四，“中国道途交通不便，尤其是西南各省多山，我们的部队轻便，行动敏捷，敌则反之”。<sup>③</sup>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游击战争最辉煌的成就，创立了一整套人民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彭德怀游击战思想，其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4 页

② 《西行漫记》，战士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47 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 页。

## 一、“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

在军事对抗中,应以何种作战形式及战略战术迎击对手,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和战场的实际情况。彭德怀在分析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发生的基础和根源时指出,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这就决定红军只能采取避实就虚、避大击小,逐步消耗敌人和壮大自己的作战指导原则。1929年彭德怀在总结平江起义后一年多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红军游击战应“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sup>①</sup>。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彭德怀正是运用这种避实就虚专击小敌的手段与强敌作战,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如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敌后游击战中尽管一次作战歼敌在千人以上的屈指可数。但通过近10万次(99847次)的大小作战,歼灭日伪军达110多万人(其中日军40多万人、伪军70多万)。

### (一)只打弱小之敌,力避与敌主力作战

彭德怀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敌人打大仗的力量。因此,不同敌主力交战,专打小敌是游击战争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将对红军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作了详尽的阐述,提出了“红军力量所系的十条作战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在作战的指导思想上,不打没有优势的仗。游击战的特点是进攻,而进攻目标的确定却必须建立在打得赢的基础之上。彭德怀提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则不同敌人交战”。“在同敌军正常交战时,游击队的人数必须超过敌人”。“游击队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平江起义后,面对十倍于己之敌对红五军的“会剿”,彭德怀即确定了一次作战“消灭白军一个营为目的,尽量避开打硬仗”<sup>①</sup>的作战方针,正是用这一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三省的“会剿”。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比一次更凶恶疯狂的围攻和“扫荡”,且不断变换战术。敌人从“长驱直入、多路围攻”到“四面包围、分进合击”;从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到集中重兵、铁壁全围,但均告失败。这是因为,无论敌人怎样变换招法,朱德、彭德怀始终坚持力避硬战,只打弱敌的原则。在敌人采取多路进攻时,我只以部分兵力(一路)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牵制敌人,主力跳出敌包围圈,选择有利机动的地区隐蔽待机,当出现有利战机时,集中主要兵力歼灭敌之一路。日军在有了几次挨打的教训之后,为不给我军歼其一路的机会,变过去围攻时的长驱直入到逐步推进,大力修道路,设据点,企图以这些新的点线来分割我根据地,尔后再分区“清剿”,各个击破,以实现面的占领。敌人在兵力的部署和使用上,采取先集中后分散,即“扫荡”开始时,首先集中主力四面包围,分进合击,并建立新的点线,尔后高度分散部署兵力,依托点线进行所谓的“神速机敏的讨伐”。对此,彭德怀指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广泛分散的游击战,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集中对敌之分散。即在敌开始“扫荡”之后,避其锐势,我主力分散转移,到各路“扫荡”之敌侧后,打击敌人,切断敌后方补给线,以主力一部与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于内线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当敌分兵转入建立新点线,采取高度分散部署时,或敌在我根据

<sup>①</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地内难以立足实行撤退时,我则集中兵力,逐一摧毁敌之据点或在敌撤退中选择好打之敌予以歼灭性打击。执行这一作战指导原则的结果,不但敌人围攻、“扫荡”被我粉碎,敌人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消耗,而且使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力量不断增强,到1939年,八路军开辟的华北敌后根据地已成为抗击在华日军2/5以上兵力的广阔战场。

#### (二)坚持流动作战,力避攻坚与“恃险死守”

避免打阵地战,是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游击战是分散流动的作战形式。流动性和无固定作战方向和作战战线,是游击战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弱小军队之所以不会被强敌消灭的护身法。彭德怀认为坚持这一作战指导原则,就是要避免打势均力敌的消耗战,尤须力避对敌坚固防御阵地的攻坚战和为防守某一地区的“恃险死守”。

彭德怀所阐述的上述思想,是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下弱军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可是对当时的许多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是认识不清楚的,他们总是超出自己的实际能力去企求不可能的胜利,结果往往损失惨重。土地革命时期的进攻安福之役,就是一惨痛的教训。

1929年7月初,彭德怀出席了中共湘赣边特委、永新县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特委书记邓乾元和与会多数同志主张夺取安福城,只有彭德怀清醒地认识到刚整编不久的红五军还不具备这个实力。他分析敌情指出,安福虽然不大,但城墙高,又很坚固,不易攻克。我一旦攻城,敌必定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而我力量较敌薄弱,无力打援,可能陷入被动。彭德怀后来在回忆这场争论时说:“争论的结果,他们是全体,我是完全孤立的一个人,就采取少数服从多

数,决定了一次非常错误的行动,几乎全军覆灭。”<sup>①</sup>实战的结果不出彭德怀所料,红军向福安城进攻,在离城30里的红福桥和敌军刚一接触,敌军便撤回城内,红军追至城下,发现有重兵坚守。为避免损失,彭德怀决定原路撤回。在返回途中遭敌三面援军的伏击,经过拼死血战才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是役红五军伤亡300余人,纵队长贺国中、参谋长刘之志英勇牺牲,纵队长李灿和9名大队长负伤,给红五军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因为没有遵循力避硬战的原则而酿成失败,也正因为彭德怀在作战过程中仍坚持了力避硬战的思想,没有强行攻城,果断撤出战斗,才避免了全军覆灭。

因此彭德怀特别强调:“在实际战斗中,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像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1930年5月,彭德怀准备以袭击方式攻取新阳。但当他率领红五军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在拂晓前进至新阳城外时,发现敌人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城门上悬挂着一幅“迎击彭德怀”的大标语。当时五纵纵队长李灿看到敌人这样猖狂,坚决要求率领纵队攻城。彭德怀权衡利弊后说:“看来敌人有了准备,硬攻要吃亏”。于是决定只以部分兵力佯攻新阳,以引敌郭汝栋部来援,而将主力迅速撤离至援敌必经之地炭山湾设伏,第二天拂晓,当援敌两个团进入红五军的伏击圈时,彭德怀一声令下,红五军以突然猛烈的动作向敌人发起攻击,将其大部歼之。如果当时不顾敌情的变化,集中主力强攻新阳,不但新阳难以攻克,而且在敌援兵赶到之后,就要陷入敌前后夹击的险境中。

彭德怀还认为,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死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



守一城一地“御敌于国门之外”也是必定要失败的。他指出,即使是井冈山这样地势险要、工事坚固、群众基础很好的地区,恃险据守都是要失败的。“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敌人军事势力与我们武装力量,众寡悬殊。就敌人进攻井冈山而言,敌人作战时可以换班,消耗子弹有接济,伤亡官兵有补充,有西医诊治,而我们往往都成反比例,很难持久抵御,以致保守归于失败”<sup>①</sup>。后来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游击部队的“极大有利条件就是优势运动能力,在运用这种能力方面如有错误就意味着灭亡”<sup>②</sup>。彭德怀这些深刻的见解,是他在极其严酷的游击战争环境中,从成功与失利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结论。其中影响最深的是突围井冈山。

在1929年初的井冈山守卫战中,彭德怀率红五军的800余名战士,以轻武器和每人10多发子弹,抗击20倍于己的敌人,守卫在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砂冲阵地上,与来犯之敌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黄洋界、八面山相继失守,情况万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考虑到,如果继续坚守硬拼,不仅不能阻止敌人前进,而且会全军覆灭。他与滕代远当机立断,决定收拢队伍突围。彭德怀率原红五军大部及伤病勤杂人员七八百人从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荆竹山突下井冈山后,经过1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才摆脱敌人的追堵。可以说,如果不是彭德怀果断作出放弃据险死守硬拼而突围的正确决策,就不可能有后来红五军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红三军团。这说明,只有打破恃险死守,才能保存弱小游击部队的有生力量,而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不但失去的根据地可以恢复,而且可以开辟发展新的根据地。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② 《西行漫记》,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250页。

### (三)“强敌跟追,与敌盘旋打圈子”

在游击战中,由于我之力量弱小,强敌跟追是难以避免的。彭德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可作盘旋式的打圈子。如到万分险恶敌人追击不已时,须准备向导多人,分置前卫后卫,利用秘密式的夜间行营,稍至数十里远的地方或至普遍有组织的区域作短期间的休息,并将消息封锁,勿使泄漏,使敌军失去目标,遗忘去向”<sup>①</sup>。

新成立的红五军撤出平江后,向湘鄂赣三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东北部转移。9月中旬到达修水以南的铜鼓地区。这时三省的敌人联合行动,“会剿”红五军。湖南何键部陈光中旅进到平江东北之龙门土龙铺、大口段一线,湖北鄂军戴垣进至咸宁、崇阳、通城地区,江西的鲁涤平也从江西派出朱培德主力五个团进至武宁、铜鼓、万载南北两线。敌人气焰嚣张,步步向修水推进。敌人总兵力约3万人,而红五军不足3000人。面对异常险恶形势,彭德怀采取“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仗。经常跳在敌军侧后方,使敌摸不着头脑,弄得敌人疲惫不堪”<sup>②</sup>。他率红五军避开敌人正面主力,向万载大桥转移。湖南张辉瓒的三个团突然向大桥我军袭击,敌我众寡悬殊,彭德怀指挥部队向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四县边界山区转移,湘赣两省敌军尾追过来,彭德怀便利用罗霄山脉北段的良好地形,从土龙山向北沿着幕阜山直插东北的九宫山,又巧妙地西进鄂南。当敌人疲惫地追到鄂南时,彭德怀早已率领红五军向通城、通山前进了。不等敌追到通山,彭德怀出敌意料杀了个回马枪,从敌侧翼折回,向九宫山和修水、武宁间南进。当接近修水渣津时,侦察得知江西省府的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一个宪兵大队和“靖卫团”驻在渣津。彭德怀考虑我突然来到,敌人毫无察觉和准备,而我军兵力又超过敌人数倍,可乘其不备,出其不意,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人。遂命令部队发起突然攻击,守敌猝不及防,全部被歼,无一漏网。红五军攻占渣津,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装备了自己,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士气,增强了粉碎敌人三省“会剿”的信心。敌人得知渣津失守,气急败坏地向渣津扑来。而彭德怀早已率部撤出,转向罗霄山脉北段以东的大山区修、铜、万边界去了。敌人扑空后仍不甘心,又跟追过来。他们被彭德怀牵着鼻子在崇山峻岭、密林峡谷中艰难跋涉。不但无法找到红五军主力决战,还时常被袭扰,天天都有伤亡减员,弄得疲惫不堪,垂头丧气。敌人被拖到10月中旬,精疲力竭,再也无力和红军周旋。这时彭德怀又率红五军从东北转到西南铜鼓幽居,休息了5天。三省敌人士气低落,不愿再翻山越岭跟着红军打“推磨”战,只得带着满腹无奈打道回府。经过45天的艰苦奋战,红五军终于粉碎了三省敌人的“会剿”,开创了湘鄂赣边界根据地。

## 二、“以袭击为主要作战手段”

由于进行游击战争的军队在军事力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一切双方有准备的正面交锋都不可能是敌人的对手,这也正是敌人所希望的和游击战争领导者应当努力避免的。彭德怀认为,革命游击战争有自己的拿手战法,这就是袭击。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指出,游击战争的“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sup>①</sup>。在抗日战争中,他又多

<sup>①</sup> 《西行漫记》,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249页。

次强调，“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奇袭、伏击、夜袭胜过正规对战”<sup>①</sup>，要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这就是说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袭击。如1938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所进行重要战役战斗39次，其中整个作战属于袭击性质的32次（包括袭击、伏击和破击），此外在反击日军对晋西北的首次围攻、反击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作战等大的作战过程中，亦包含着袭击的作战手段。依据作战对象、目的和方式的不同，一般可分为袭击、伏击、破击和袭扰等主要战法。

#### （一）袭击战

袭击战，是以歼灭和部分歼灭敌人之目的，乘敌不备，对驻止之敌出其不意的攻击。它是游击战的主要战法之一。袭击的主要特点是：敌静我动，以动制静、速战速决，以奇制胜。

彭德怀打过许多漂亮的袭击战。1929年初的奔袭雩都城就是袭击战中最早的成功战例。1929年1月下旬彭德怀率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后，敌人以几个旅的兵力尾追堵击，经过一个来月的艰苦奋战，红五军到达兴国时，仅剩下283人枪。这时又遭到赣军刘士毅旅的攻击。彭德怀从侦察得知，敌人来了五个营，其老巢雩都城内只有刘旅的一个营驻守。于是决定奔袭雩都城，他率部乘夜绕过敌人的主力，18小时走了140里，夜半到达雩都城外，架梯带头爬上城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并攻入敌营房，敌人毫无准备，束手被擒。红五军以283人枪俘敌六七百人，活捉了县长，筹措了军款。这次成功的袭击对于恢复红五军的元气，增强官兵的革命信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中，袭击战更是成为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对日作战的主要战法之一。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之交通线据点、后方兵站、机场等。仅在1937年10月,八路军发动的较为大的袭击战就有4次,即10月4日的平鲁袭击战斗、10月8日至13日的宁武袭击战斗、10月18日阳曲袭击战斗、10月19日的阳明堡夜袭战。其中最著名的阳明堡夜袭战,一举炸毁敌人作战飞机24架,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对日军的又一次重大打击。这次作战是在彭德怀的指示和部署下进行的。

10月8日,彭德怀陪同周恩来赴忻口,与卫立煌商谈忻口布防及八路军的配合问题。卫立煌心情焦虑地谈到,每日清晨即有日军飞机来我方阵地侦察,继而以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对阵地威胁极大,每天的损失几乎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这一情况引起彭德怀的严重关注。翌日拂晓,彭德怀即到总部院内仔细谛听在重峦叠嶂中隐隐回响的飞机声。原来大家以为飞机是从北平飞来,彭德怀根据飞机的航速、航向和到达忻口的时间判断,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临时机场,即下令侦察。12日朱德、彭德怀电告蒋介石、阎锡山等:“代县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机运输粮弹中。”同时,彭德怀命令刚刚开入晋北的一二九师之六七九团(团长陈锡联)进入代县,实地侦察。侦察发现,敌在代县西南滹沱河北岸阳明堡建有前线机场,对忻口友军阵地进行轰炸的飞机即是从这里起降的。此情况报告八路军总部后,彭德怀命令,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击毁敌机场。经进一步周密侦察,查明敌机场有飞机24架,驻有警卫和地勤人员200余人,机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和简单的防御工事。据此,第六七九团首长决心夜袭阳明堡机场。其部署是,以三营袭击机场,以一营钳制和阻击崞县的日军,以二营(欠七连)为预备队,并以八连破坏黄董堡的桥梁,保障三营后侧安全。团迫

击炮连位于滹沱河南岸,准备支援三营战斗。10月19日夜,各分队分别向预定地区开进,三营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偷渡滹沱河之后,以一个步兵连警戒阳明堡方向可能来援之敌,以两个步兵连和机枪连组成突击队,以一个连为营预备队。突击队避开敌警卫分队驻守的机场北端,从机场东西两侧秘密进入机场,当接近距敌机约30米处,敌哨兵发觉,我先敌展开,先敌开火,以迅猛的动作,将敌警卫分队压缩于掩蔽部内,并打退其连续反扑;一部迅速扑向敌机群,先以猛烈的火力突击,尔后将集束手榴弹塞进机舱,一架架敌机爆炸起火,敌警卫分队疯狂反扑,我突击分队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经1小时激战,击毁敌机24架,歼敌100余人。六七九团完成任务后,顺利撤出战斗。这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大捷后又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忻口上空一度见不到日机的踪影,消息传到友军营连,官兵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彭德怀在论述袭击战的战术时指出:正确地选择袭击目标和时机,是袭击成功的前提。袭击目标主要是驻止的敌人,应根据战斗目的和掌握的情况权衡利害作出选择,其基本原则是:目标既是敌之要害又是其兵力薄弱或疏于防范之处,同时不利于敌之增援而便于我之隐蔽接敌和迅速撤离。袭击的时机,视敌人的活动规律和我之运动接敌和与撤离战场的时间而定,通常应选择在夜间、拂晓或黄昏。在气象不良的条件下,如浓云密雾等利于我运动而敌孤立无援时,也可在昼间进行。

袭击成功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秘密隐蔽接敌,是袭击行动的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彭德怀指出,袭击战“在未与敌接触时,必须秘密隐蔽,使敌不发觉”,<sup>①</sup>通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常应根据敌情、地形、任务和战斗编组,选择数条极其隐蔽的小路或越野路线,尽量取捷径。有时为了避开敌人的警戒或为了迷惑敌人则应绕道接近目标。在条件可能时,伪装成敌军或其他不使敌人识破的人员也是隐蔽接敌手段之一。

袭击的实施必须是突然而迅猛的。要乘敌无备,以突然的动作,猛击敌人要害,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彭德怀特别强调,与敌“一接触时,要突然投入战斗,白刃冲杀与敌混战,使敌人的优良兵器不能发挥作用”。如在接近敌人时被发现实施强袭时,应注意发现敌之薄弱环节趁敌未完全展开之际,以猛烈的近战火力,摧毁敌人的火力点和指挥部。我之“火力与运动密切配合,就是说,在运动时集中火力于攻击点”,力求迅速解决战斗。而当“袭击不奏效或估计无法奏效时,应当机动灵活地、适时地退出战斗。”<sup>①</sup>如袭击一开始就发觉敌人有了准备,或敌情有了较大变化一时难以得手,或敌增援兵力较大等,都应毫不犹豫地撤出战斗,以免遭受损失。袭击成功后,必须尽快撤离战场,以免遭敌援兵的围攻或火力报复。

### (二)伏击战

伏击战,是以伏击的方法袭击运动之敌的战法。即预先将部队隐蔽地埋伏在敌必经道路之侧,当敌进入伏击圈时突然发起攻击,迅速歼敌于运动之中。伏击又通常分为待伏和诱伏。待伏是已经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或获得敌准确的情报后,将部队埋伏在必经地域而加以歼灭。诱伏,是使用主力预先在选定的伏击地区埋伏,以部分兵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突然攻击歼灭之,或者以“围点打援”的办法引敌上钩。伏击的特点是敌动我静,歼敌于不意和无准备之中。彭德怀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在指挥八路军的八年敌后抗战中,用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主要手段是伏击战。据对八路军在1938年全年共进行的39次重要战役战斗分析,其中伏击战的数量达1/3(13次)之多。如一一五师主力在汾离公路的三战三捷,均是运用伏击的手段而取得的。

1938年9月上旬,日华北方面军为策应武汉作战和围攻晋察冀边区作战,以第一八〇师团沿汾离公路西犯,先后占领离石、柳林,进逼军渡、碛口,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为粉碎敌人的进攻企图,遵照朱德、彭德怀命令,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迅速沿汾离公路开进并以第六八六团于14日拂晓进至吴城镇东南的薛公岭附近设伏。此地是敌军来往必经之地,且公路弯曲,两侧高山密林,不便敌军观察,利于我军隐蔽。敌为防我袭击,曾在公路两侧筑有碉堡,用以保障交通。我第六八六团遂以主力于公路南侧设伏,一部伏于公路北侧。当日10时许,由汾阳西进之敌汽车20余辆,载步兵200余人,进入我伏击圈。我军突然开火,首先以迫击炮击毁敌之碉堡,尔后勇猛冲击,经1小时战斗即全歼该敌。缴获汽车20辆。为进一步打击西犯黄河河防之敌,17日拂晓,第一一五师又以第三四三旅补充团于吴城至离石间的油房坪附近,选择有利地形再次设伏,歼灭由汾河向离石开出的敌运输车队,歼敌100余人,击毁汽车9辆,缴获军用物资一部。敌连遭打击,特别是汾离公路补给线被切断后,被迫于19日开始由离石向东撤退。我一一五师遂命令第三四三旅以第六八六团、六八五团一部及补充团于薛公岭东南的王家池附近公路两侧,利用有利地形设伏。20日拂晓各部进入伏击地域严阵以待。9时许,敌800余人进入我伏击地域,我军突然发起攻击,经1小时激战,全歼该敌,缴获军马100余匹,各种枪支400余支。在一个星期时间内,汾离



公路三次伏击,三战三捷,歼敌 1200 余人,粉碎了敌人进攻黄河河防,威胁我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彭德怀在《进入新阶段的华北战争》一文中,对伏击战中最为重要之点作了精辟的阐述:“第一,伏击必须事先有严密而周详的计划,必须有详细的布置;其次,侦察哨关系整个伏击的成功与失败,最好由最高指挥官亲自担任;最后,在选择伏击地的时候,最好不要有房子及其他建筑物可为敌用来做支点(因为我炮兵弱,敌人倘若据房子顽抗,常不易迅速解决战斗),居民多的地方也不好,就是消息封锁得好,也容易泄露秘密。”<sup>①</sup>伏击战同袭击战一样,作战目标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所不同的是,袭击战一般是消灭驻止之敌,而伏击则是消灭运动之敌。因此伏击目标通常选择战斗力比较弱、孤军深入之敌。如敌人的侦察分队、后勤保障分队、运输车队、单独行动的其他一切有可能就我范围的部队。在地形选择上,袭击战中的目标和地形是统一的,而伏击战地形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伏击地区应有良好的地形条件,便于隐蔽足够的兵力、兵器和发扬火力,便于观察与指挥,便于突击与撤出战斗,便于建立阻援掩护阵地,能够限制敌人的行动和阻止增援之敌,群众条件好,能得到群众的援助等。

### (三)破击战

破击战,是以破坏和击毁敌人重要军事目标为主要目的的战法。广泛应用于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通信设施、飞机场、后方设施、工程设施和重要的技术兵器及其他军事设施等,以达到给敌人的行动、联络、补给造成严重困难,消耗或消灭敌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破击战已在红军游击战中占有一定位置,在抗日战争中,破击战成为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6 页。

争打击和消耗日军的重要作战形式,使得日军防不胜防,损失惨重。其中最著名的“百团大战”,即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破击战,这次战役已为世人所共知。然而许多人或许还不清楚,早在1938年春、夏,朱德、彭德怀就指挥八路军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破击战。

1938年春,日军为了打通津浦铁路,以其华北方面军和华东派遣军各一部,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企图消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主力。为钳制和打击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发动了第一次破击战。朱德、彭德怀2月4日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发展,打击与钳制敌人,破坏敌之铁路交通。5日,令一二九师派出得力支队出平汉铁路以东,破击津浦铁路沿线之敌。遵照朱、彭的命令,2月9日至16日,晋察冀军区所部在平汉线北段、正太线井陘段、同蒲线北段展开破击战,攻占定县、望都、新乐县城,袭入保定及方顺桥、清风店等车站,歼日军500余人,毁坏铁路50余公里,焚毁车站6处,一度切断了平汉北段的交通。18日至27日,一二〇师主力于同蒲铁路阳曲至忻县段发动破击战,攻占平社、田庄等车站7处,炸毁敌军运火车3列、汽车10余辆,破坏铁路桥梁8座,拆毁铁路10余公里,歼灭日军500余人,切断了同蒲线北段的交通。21日至22日,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之三四三旅等部,对正太线阳泉至忻县段进行破击,一度切断正太线的交通。第二次破击战是4月28日至5月4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对平汉路北段破坏铁路80余公里,歼敌一部,争取伪军2400余人反正。7月6日至8日,朱、彭又命令晋察冀军区和一二〇师之三五九旅对平汉、平绥、正太等铁路进行第三次破击战,破坏铁路50余公里,毁机车3台,毙伤日伪军1400余人,俘伪军130余人。这三次破击战使敌人后方交通受到严重破坏,达到了牵制敌

人、援助友军和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彭德怀指出,破击战重在破坏敌人的重要军事设施,技术性强,其组织实施有着明显不同于其他袭击行动的特点,必须特别强调周密细致的组织计划,精确计算,充分准备,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

破击目标和行动计划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周密侦察和精确计算的基础之上。侦察中不但要查明目标及其附近的敌人性质、数量配制、警戒状况及活动规律,而且要弄清每一个目标的技术状况。如彭德怀在组织指挥百团大战中,战前专门下达了关于侦察工作和破坏战术的详细指示,要求每一个目标都经过侦察,作出计划,对需要特殊技术破坏的水塔、隧道、桥梁,还要派出便衣组,配以技术人员出动,以计算药量和作业。在此基础上,破击计划方能是切实可行的。

要依据其破击的具体任务进行科学的战斗编组。在执行较大规模的破击任务时通常应编成破击作业队、掩护队和预备队,必要时还应编成破障队、运输队等。破击规模不大,使用兵力较小时,亦可只作分工而不单独编组。对特殊的技术破坏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

破击行动中各分队的密切配合是实现作战企图的关键。破击队应按规定的时间和信号,以迅速准确的动作实施破坏作业或火力突击,掩护队应以积极的动作掩护破击队的行动,迫使敌警戒部队自顾不暇,减少对其防守目标的防护。

#### (四)袭扰战

袭扰战,是以我之小分队对敌之大部队行动进行袭击骚扰,以达到牵制、疲惫、消耗敌人及破坏其作战部署之目的。袭扰战,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运动之敌还是驻止之敌,都可以袭扰。对此,彭德怀有过许多精彩的论述。1929年他在《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一文中指出:“在敌

人进剿时,可乘间窜至敌人之背后击其虚处,使敌有顾此失彼,鞭长莫及之虑。……假若敌人驻扎时,夜间宜派纯粹战斗兵一小部队去扰乱他们,使敌人多增加疲劳,揣测不定。敌军退走时,便可乘机尾追袭击之……。”<sup>①</sup>1939年,他在《进入新阶段的华北战争》一文中又写道:“在敌人驻止时,应当经常派出小部队,不论昼夜,不论风雨,在四面袭扰敌人。我们只用少数人,便使得敌人多数疲惫,这是异常值得的。当敌人退走时,我们则经常在敌人侧翼扰击,这样,使得敌人行止都不得安宁,就造成了集中主力消灭敌人的机会。”<sup>②</sup>

袭扰战不仅对我军在游击战争中造成敌军事力量不断消耗、政治心理上极度恐惧以长期坚持对敌斗争具有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我军转变为运动战或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时候,它仍可以起到重要的配合作用。如消耗、疲惫、迟滞敌人,为主力坚守防御或进攻歼灭敌人创造条件;或分散和引诱敌人,以利于我主力运动中歼灭敌人特别是实施伏击歼敌。

### 三、“绝对独立自主 操纵敌人”

彭德怀在论述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时,强调最多是必须握有作战的主动权。他曾指出,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战术,是完全以独立自主为原则的。强调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最忌被动的应战,而须绝对的独立自主,操纵敌人”<sup>③</sup>。

#### (一)扬长击短,保持主动

-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获得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一支军队的进退攻防均自己作主,不受敌人的控制与支配,就是握有主动权,被客观形势所摆布,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就失去了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而军队“陷于被动,虽握优势之兵力,卒不能克劣势之敌人。如能经常保持主动,虽劣势之兵力,亦能战胜强敌”<sup>①</sup>。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进行游击战的军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等。但彭德怀认为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问题在于能否抓住敌人的弱点而发挥自己的优势。只要能做到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即使在劣势的条件下,仍可以获得作战的主动权。

其一,要在兵力使用上扬长避短。彭德怀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问题时分析指出,敌人在军队实力与我相比虽占有很大优势,但“这种优势是有时间性与地域性的。以敌人力量衡量,不可能在全华北普遍地取得这种优势,即在平原地区,亦不能同时取得这种优势。这样,敌人虽然对我一定的地区可以进行极疯狂的扫荡,但在另一些地区,兵力又感不足,顾此失彼,予我军以可乘之机。这是敌人进行战争最苦恼的事,且是它不能克服的弱点。我应及时地掌握敌人这一弱点,相互密切配合,争取主动,有力地打击与消耗敌人”<sup>②</sup>。

1937年11月,日军以第五、第十四、第一〇九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由平绥、平汉、正太 and 同蒲路沿线,分八路围攻八路军一一五师初创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企图消灭或驱逐我军,摧毁尚不巩固的晋察冀抗日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根据地,以确保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朱德、彭德怀一方面指示晋察冀军区,以部分兵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不断袭扰、消耗、疲惫进入根据地之敌;以部分游击队深入敌占区,日夜袭击敌后方据点和交通线;主力则选择有利机动的地区待机歼敌。同时指示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以一部兵力分别对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沿线展开破袭战,调围攻晋察冀根据地之敌回援其交通线。从而使敌人不但在我根据地内处处被袭动挨打,而且后方被袭据点和交通线频频告急。2月21日,围攻晋察冀边区之敌,大部队退回铁路沿线。从而粉碎了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首次进攻,为尔后的反围攻作战提供了经验。

其二,善于抓住敌人大部队行动不便的弱点,发挥自己行动敏捷的优势,在“走”中争得主动。彭德怀认为,无固定的作战战线和战场,是游击战的根本特点之一,在游击战中要做到在出敌不意的方向、地点和集中出敌不意的兵力打击敌人,都有赖于快速而隐蔽的兵力机动。在遭强敌攻击时,要摆脱被动,同样必须依靠灵活的兵力机动。军队兵力机动能力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武器装备较先进的部队机械化程度高,虽然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但它受地形、道路和天候制约较大,其灵活性受到限制,且行动隐蔽性的难度提高。装备落后的游击部队,虽在便于机械化部队行动的道路上“跑”不过敌人,但它有着行动敏捷、聚散自如、便于隐蔽行动的优势。因此,游击战的主动权是建立在扬自己行动敏捷之长的基础之上的。就是利用这优势,去实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作战原则,在我之神出鬼没的进退、袭扰、袭击和尾追中,打乱敌人的部署,疲惫、消耗和歼灭敌人,从而获得作战的主动权。

其三,要善于抓住敌人失去民心的弱点,发挥我之人民

战争的优势,依靠人民的帮助获得主动。群众的优势是革命游击战争的根本优势,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也是争取主动的根本途径。即依靠人民群众对敌封锁消息,使敌变成瞎子、聋子,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使敌人缺粮饿饭;组织群众武装不分时间地点地袭扰敌人,使敌人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借助人民群众的掩护,灵活地转移兵力,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从而使敌人陷入被动的境地。“敌人深入一步,则被我群众武装重围一层。敌人集中,则以游击战争方式包围它,经常地袭击和扰乱它,断绝其交通运输”。“使敌人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资材上受损失,消息不灵,接济困难”,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我之逐步获得战场的主动权。<sup>①</sup>

### (二)示形欺敌,摆脱被动

战争中主动和被动是经常变化的,被迫到被动的地位是常有的,特别是游击战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全局上战略上的主动权还在敌人手中,因此在作战行动中陷入被动就更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要迅速恢复作战行动中的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这种地位,其结果只能是失败。彭德怀指出,在游击战中,由于我作战物质条件的劣势决定了争取主动主要靠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利用敌人的弱点错误,抓住有利战机,固然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最重要手段。但是在敌处主动、我处被动的情况下,消极等待敌人犯错误是不行的,只有通过我之积极行动,造成敌人的过失,才能迅速将我之被动转化为主动。示形欺敌,便是制造敌人过失的最好方法。

在已陷入被动的情况下,示形欺敌的行动将受一些限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制,不像处于主动地位那样自由。但即使这样,只要充分发挥我之主观能动性,仍可找到适合敌我作战态势和具体情况的欺敌方法。如:示形设虚,对敌大摆迷魂阵,使敌虚实难辩、迟疑不前的缓兵之计;虚而虚之,使敌疑心我有伏兵而引兵后撤的退兵之计;以少数兵力虚张声势,麻痹敌人,主力秘密脱离接触的金蝉脱壳之计;攻其必救,打乱其部署的调虎离山之计等。

1941年8月日军在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平西地区“扫荡”中,以5万之众对转移至阜平地区的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大规模合围。由于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近万人,行动不便,未能适时跳出敌人的合围圈,陷于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3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处境非常危急。彭德怀指出,在此种情况下应以积极迷惑敌人的手段将敌引开而不能强行突围。9月1日,军区首长派出侦察分队携带电台到阜平东北的台峪地区,采取声东击西、制造假象、迷惑敌人、隐蔽自己行动企图的办法,以“军区的呼号”与各方联络,造成敌人的判断错误,以利我机关转移。2日下午,敌果然集中重兵向台峪攻击,并以飞机对台峪轮番轰炸。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一部,即乘机于当晚向阜平以西隐蔽转移,进至棠家渠一带山区,同时中断与各方的无线电联络,并不准生火做饭,靠当地人民供应红薯,瓜果充饥,从而在敌人重兵包围中成功地隐蔽了五天。7日,军区领导机关安全转移至平山县的东西玉文地区继续指挥反“扫荡”作战,摆脱了被动而转为主动。

### (三)独立自主 机断专行

由于游击战争处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而分散流动作战又是其基本的作战形式,情况千变万化,我之通讯联络手段又相当落后,因此就需要游击战的各级指挥者都



必须有独立自主处置作战行动的权力和能力。彭德怀认为,游击战在全局上是要有明确作战要求和计划的,但这种计划只能是方向性和原则性的,而不可能像正规作战那样具体。上级应给下级以较大的机动,下级要富有“自动性”,自动地处置各种紧急情况,自动地打击敌人。即使当下级因机断专行去消灭敌人而吃了亏,也不要过分责备。因为在游击战的环境下,如果事事等待命令,不但会失掉许多歼灭敌人的战机,而且还可能招致不应有的惨重损失。因此他强调,游击队的领导者必须具有灵活机动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独立作战经验。一方面,要善于把握战机,不放过任何可能打击敌人的机会。战机即是有利于我作战歼敌的时机,它往往是稍纵即逝的,对赢得作战的胜利至关重要。只要出现这种战机,就要果断决策勇敢出击,切忌犹豫不决。另一方面,在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和改变自己原定或上级赋予的作战行动。当进则进,当退则退,从而避免不应有的损失。

#### 四、重在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彭德怀认为:“游击战争必须要有根据地,否则游击战无力,且难持久。”<sup>①</sup>他在分析影响革命游击战争发展的各种因素时强调,其中心一环,首在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先后发表了《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等论著,对根据地在游击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建设根据地的任务和发展巩固根据地的途径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 （一）根据地是革命游击战争的依托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sup>①</sup>。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中国革命的根据地。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初步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方向。平江起义后,彭德怀即率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边界根据地,并想“打通湘东与赣西朱毛取得联络”;“造成罗霄山脉整个的割据”。<sup>②</sup>他认为,在同拥有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手段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1930年春,他总结平江起义一年多的斗争经验更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sup>③</sup>。他率领红五军、红三军团在开辟、建设和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同轻视根据地建设的倾向作了坚决的斗争。他在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进行长征的教训时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央的领导者“不懂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不懂得武装斗争如不与根据地结合,是非常脆弱的,容易为敌人所消灭”。他还追溯到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历史上不知多少次农民暴动就失败于没有根据地;石达开在大渡河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

②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③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安顺场被消灭,只身就擒,也就是这个缘故”<sup>①</sup>。在抗日战争中,他提出要把巩固抗日根据地作为我军坚持敌后抗战、争取全国抗战局面转机的重要任务来对待,要在反围攻和反“扫荡”战斗中求得根据地的巩固。

强大的、可靠的后方战略基地,是赢得任何一次战争的必备条件,革命游击战争是在敌人的包围和“围剿”之中进行的,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战略后方。彭德怀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途径就是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首先,根据地是革命游击战争获得一切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源泉。战争是敌我整体综合实力的全面较量。革命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主,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形式同敌人开展殊死搏斗的战争。根据地正是适应这一要求,将各种对敌斗争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与敌人进行长期斗争的坚强堡垒。只有有了根据地,才能获得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支援。“只有巩固根据地,树立强固的作战后方,实行崭新的进步的做法,以保障物质的供应和兵员的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能坚持长期的持久的战争。否则,敌后抗战的坚持便无从设想”<sup>②</sup>。

其次,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是消耗敌人力量争取战略主动的中心环节。彭德怀认为,游击战的根本任务,在于消耗敌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战局的变化,改变敌我的形势。而在敌后开辟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是在战略上着眼争取主动,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达到最后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他在分析将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相持条件时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150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指出：“也只有巩固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确保敌后人力财力以及一切物质资源勿为敌人利用，打击敌人‘以战养战’计划，抑留敌人进攻和‘扫荡’敌后的大量兵力，才能使敌人无法向全国无限制的进攻，才能造成全国抗战的相持阶段的局面。”<sup>①</sup>

第三，从游击战争作战过程来看，根据地的依托作用贯穿于始终。对我军来说，战前，军队需要训练与备战，这需要有一个安定而可靠的基地；战中，需要保证为作战所必须的物资供应，以及部队迅速而秘密的转移，这要求有一个可靠而巩固的后方；战后，部队需要休整，这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一切均取决于有无根据地和根据地的大小及巩固程度。对于敌军来说，在根据地内作战，它不但得不到所需要的情报、粮食等一切作战必不可少的保障，而且它的一举一动都在根据地人民的监视之中，其战斗力大大减杀。

#### （二）根据地建设的基本任务

彭德怀在《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一文中，给革命根据地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在某些地区有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而且前面三种组织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四种组织在一定地区能够公开的合法的存在，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如政权执行自己的法令、纪律、各种制度），这样的地区，就叫做革命根据地。”<sup>②</sup>同时指出，革命根据地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于上述四种组织巩固和健全与否。此外还有一个决定革命根据地能否坚持的条件，这就是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根据地的建设包括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其基本任务就是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围绕创造上述根据地的条件而斗争。

第一,武装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首要任务。彭德怀指出:“根据地总是产生与生存于反革命的包围中的,甚至在根据地内,也还有敌人(内战时是阶级敌人,现在是民族敌人),因之,要创造根据地与保卫根据地,主要是依靠武装斗争。”<sup>①</sup>这就是说,无论是开辟还是巩固发展根据地,武装建设都是第一位的。没有革命的武装,或者有而无力,根据地建设的其他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因此,革命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必须以全副的精力去建设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同时指出,根据地的武装建设必须走正规军与群众性武装结合的道路,实行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群众武装的发展,是坚持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彭德怀认为,无前方后方之分的游击战争环境,使群众武装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只有群众武装发展起来,正规军才有所依托。群众武装不仅给予正规军许多帮助,而且有维系民心的作用。群众参加革命游击战争的积极性,是需要有武装作基础的,有了武装,胆量才会大,精神才会振奋,他们的力量才会有所表现。哪个战略区能使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结合更好,则打击敌人的成绩就最大,积蓄的力量也较多。敌人一旦深入,就会“行不安,坐不稳”,在疲惫消耗之后,就不能不退出根据地,我们的党政军民四种组织,仍能合法存在。因此他在抗日战争中,提出要“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建设数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一般应做到有全体人民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参加为标准。把游击战争开展成为普遍的群众运动,成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

主要助手”<sup>①</sup>。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华北敌后根据地的脱离生产地方武装发展到100万多人,它不仅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而且成为解放战争中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力量。

正规军的扩充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是革命根据地得到根本巩固并促使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最后战胜敌人的决定因素。彭德怀指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首先必须有优良的正规军”<sup>②</sup>。群众性武装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散和消耗敌人,大量歼灭敌人还必须依靠正规军。因此,不断壮大正规军,是根据地武装建设的重要任务。由于革命力量一开始总是处于不掌握政权的弱小的地位,既没有相应的物力财力走“招兵买马”的扩军道路,也不可能有成套的训练教育机构对军队成员进行系统的培训。要不断提高正规军的数量和质量,就必须从人民游击战争的特点出发,走由群众性武装发展到地方性武装,再发展到正规军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从奔赴华北敌后战场时的3.7万人发展到100万余人,正是正确执行了这一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结果。

其二,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内容。政权是建立根据地的基本问题,当革命武装力量已在一定的区域内取得较为稳定的控制权,如果不及时建立革命政权,就达不到建立根据地的目的。因为没有革命政权,便不能建立起革命的统治,人民便不可能被发动起来,党的政策和革命的法令就不可能在这一地区的全社会得到贯彻。也就不可能保证有计划地解决长期支持战争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动员问题。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更重要的是根据地革命政权还担负着为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积累经验、培养干部和检验政策的任务,必须从这个高度认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性。彭德怀指出,要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必须在根据地内彻底改造旧政权,建立完全新型的民主政权,建立并实行崭新的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是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这是由抗战的实践证明了的,只有实现民主,才能提高人民的抗战热情,参战热忱”。并根据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应首从下层做起,先要建立起若干的模范村区政权,然后以之来推动全县、全区整个抗日根据地,以至整个敌后方,以及全中国”<sup>①</sup>。

其三,党的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根本保证。党是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核心,根据地建设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的组织的坚强和领导的正确,是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决定因素。彭德怀指出:“要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进行各种战时的建设工作,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上足以作为领导核心的各级党的组织,是不可能的。”<sup>②</sup>

第四,以自力更生为目标的经济建设是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根据地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孤悬于敌后,根据地又建在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偏僻山区,经济不发达,再加上敌人的封锁、扫荡,造成了根据地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根据地要得以巩固,必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部队的供给和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在抗日敌后根据地建设中,彭德怀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合作事业”。他认为,要冲破敌人的封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锁；“基本的是发展我们的生产合作事业，求得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简单说来，便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开办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自己生产必需品，自己来运销。敌后方的全体军、政、民应该把此看做是巩固根据地的重要事业之一”<sup>①</sup>。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3 页。



## 第三章 大步进退求胜机

### ——在运动中歼敌的法则

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

——拿破仑

运动战,是我军在革命战争中大量歼灭敌人的主要战法。彭德怀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要大量歼灭敌人,发展和壮大自己,惟有运动战,舍此别无选择。所谓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较长的战线和较大的战区上,从事战役和战斗的速决进攻作战。其特点是战役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流动性。在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样式,利于自己在总体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谋求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在急剧变化的复杂格局中,保持主动灵活的进攻地位,掌握行动的自由权。我军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了独具人民战争特色的运动战理论。彭德怀作为这一理论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之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发了在运动中歼敌的法则。

#### 一、在高度机动中创造战机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要歼敌于运动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调动敌人、分散敌人,以造成我之各个歼灭的战机。彭德怀认为,调动敌人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善于兵力机动。机动是创造战机的有效手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之一。“应采取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战术原则，求得运动战的机会”<sup>①</sup>。克劳塞维茨曾指出：“就机动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来说，它有一种诱使敌人犯错误才产生的效果。……机动好比下棋时的头几着棋……其目的是造成取得成功的有利机会，进而得用这种机会造成对敌人的优势。”<sup>②</sup>在这里，克氏对机动的作用已有了深刻的认识，但他只是将机动作为打破战场上“均势”、“平衡”僵局的战术手段而提出来的。而彭德怀则是在更加宽广范围上认识和运用兵力机动这一战略战术原则的。特别强调在弱势情况下，“要利用自己的积极动作，改变敌人的部署，为我们造成有利的条件”<sup>③</sup>。也就是通过不同目的不同形式的兵力机动，使敌人产生错觉和不意，造成我之有利战机。

### （一）诱敌深入

所谓诱敌深入，是在强敌进攻面前，为了避免与敌人打硬碰硬的阵地战，在战略或战役上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待敌分散、疲惫和不意，诱其至预定地区加以歼击的作战方法。孙子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也。”弱军要想战胜强军，尤需懂得迂直之计，先退后进，以退为进，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将取之，先予之。它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最早是毛泽东于1930年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前夕提出来的。这一方针在其酝酿和讨论之初，就得到了彭德怀的坚定支持。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彭德怀同样主张实行诱敌深入，才保证了这一方针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的执行。

-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 ② 《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第1090页。
-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1930年10月,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大军入赣,向江西苏区扑来。毛泽东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人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持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之中。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罗坊开会讨论迎敌之策时,毛泽东阐述了这一方针,并具体提出了红军东渡赣江,向根据地内退却集结,“待其疲惫而歼之”的作战方案。但是前委委员中对此认识很不一致。特别是三军团的多数同志不同意,他们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一军团在赣江以东,红三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十分激烈。身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觉得毛泽东的主张与自己不谋而合,因此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的这一立场,对于确立“诱敌深入”战略的方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sup>①</sup>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正是由于正确执行了这一方针,才取得了一至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彭德怀在此后指导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成功地将诱敌深入的战法运用于抗日战争中的华北敌后战场、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抗美援朝战争的朝鲜战场,创造了不同条件下诱敌深入的一系列新战法,实现了歼敌于运动之中的战略或战役目的。其基本之点是:

其一,充分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疲惫与分散敌人,使我获得运动战的“天时、地利、人和”。古人将天时、地利、人

<sup>①</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和视为战争致胜的三个根本条件。彭德怀认为,诱敌深入,正是获得这三个条件特别是“地利”与“人和”的最好途径。他在分析抗日战争时八路军反“扫荡”作战的经验时指出:“敌军进入我根据地内后,找不到群众做向导,得不到情报,又陷入我‘麻雀战’四面包围袭扰中,如深入迷雾,得不到喘息机会,经过一定时间不得不撤退。”我之主力则可“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军弱小部分”。<sup>①</sup>1947年他在阐述我陕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时指出:“我采取诱敌深入,扰疲与分散敌人,利用根据地条件,寻找敌之过失,各个歼敌主力,才能收复失地,保卫边区,发展西北。只有此方针才是积极的。应动员党政军民团体积极拥护这一方针,立即进行各种战斗部署,立即动员与组织人民拿起土枪、梭镖、手榴弹、地雷杀敌和袭击敌人,封锁敌人消息,扰敌人,捉敌探与掉队落伍的。在预计敌可到之处,进行坚壁清野,埋藏粮食,增敌困难,饿敌肚皮,饱自己肚皮,这是达到战胜敌人最有效方法之一。”<sup>②</sup>正是由于实行了这一方针,才使得胡宗南的20多万大军被彭德怀2万子弟兵各个击破。

其二,着力营造敌在“明处”我在“暗处”的有利态势,抓住有利战机,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上歼击敌人。彭德怀在论述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时指出:“敌人来了,分兵把口子以拒敌,这就是被动,这是在敌后进行战争所最忌的。”<sup>③</sup>而要避免这一点,这必须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放敌前进,以次要兵力“节节抗退”,钳制、消耗、分散敌人。主力大部则避敌锐势,或集结于内线机动位置隐蔽待机,或乘敌之隙转至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6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7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外线待机。使敌人对我主力之行踪或揣测不定、或以虚为实,犹如盲人骑瞎马,找不到目标。而我则对敌之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从而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同什么对象作战的主动权完全操在我之手中。待敌人在我内线军民不断袭扰打击下,已疲惫沮丧、战斗力受到削弱时,抓住有利战机,选择敌之一路,以战役战斗的袭击战歼灭之。

其三,切实在“诱”字上作文章,牵着敌人的鼻子按我之意图去行动。彭德怀认为,诱敌深入,决不是单纯的退却,而是要以主动的动作引诱敌人步入我之圈套。如果说,战略上的诱敌深入,在敌人进攻初期我之退却主要是为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话,那么在战役、战斗上的诱敌深入,则是已经布好了口袋让敌人钻。此时,成功的关键主要在于“诱敌”的文章做得如何。如在援美援朝战争中,由于作战地域、地形的限制,不存在国内战争那种战略上诱敌深入的条件,但彭德怀利用敌人恃强轻敌的心理,在战役上成功地运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法。志愿军入朝后,彭德怀根据敌已占领我预定防御地区的实际,当机决断:“我军为避免被美帝吸引,妨碍机动和隐蔽,企图诱敌深入,各个歼灭伪军。”<sup>①</sup>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因敌收缩不便歼击,彭德怀又决定:“下一步作战,我们仍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sup>②</sup>。结果,志愿军待敌深入后,乘敌之隙从侧后进行包围迂回,取得了重大战果。

### (二)敌进我进

所谓敌进我进,即当敌向我根据地进攻,我则向敌后方进攻。彭德怀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一般都采取诱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敌深入,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即敌在外线,我在内线。“但不应为这种情势所束缚”<sup>①</sup>。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恰恰是打乱敌人的作战部署,调动敌人和分散敌人,达成被动中的主动、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歼敌于运动之中的有效方法。

察彼度己,把握敌进我进的时机。敌进我进不是盲目地强调进攻,而是在积极防御思想指导下,为夺取战争主动权而采取的一种行动样式。是否实施敌进我进,完全取决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因此战争指导者必须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对敌我态势变化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分析判断,“然后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防则防,当攻则攻,时刻掌握主动,避免被动。”<sup>②</sup>以敌进我进的方针调动和歼灭敌人一般在下列时机实施:一是当敌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我根据地时,我内线作战难以打破敌之作战企图,不能实施有效的战略退却,那么就应考虑敌进我进。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当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时,彭德怀曾积极建议中央“集中一、三、七、九四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威胁南京、上海、杭州”,以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二是在敌人兵力过大,且猬集一团,步步为营,我军不能各个击破敌人时,就应该集中主力,敌进我进,一举突破敌之包围圈,转至外线。三是当多路敌军向我军分进合击时,必须乘合击之势尚未形成之际,主力转移至外线,或以一部兵力出击外线,调动敌人,以伺机打击敌人较为薄弱的一路。彭德怀在论述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反“扫荡”的战略战术时指出:“当敌人进行围攻‘扫荡’时,我们采取内线作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战和外线作战的原则。我们虽居于内线作战地位,但不应当为这种情势所束缚。主力要适时运动到敌人侧背后方,正面则以小股节节抗退……,我们的目的是使敌人分进合击,扑一个空,在敌之运动中间选择敌之弱点,集中主力歼灭其一路或数路。”<sup>①</sup>四是当敌战略进攻开始减弱时,应选择敌人进攻正面较为薄弱的方向,果断实施外线出击,将战争引向敌占区,为我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

悉心研究敌之阵势的弱点与“要穴”,正确选择敌进我进的目标与方向。敌进我进要达到预期的战略和战役目的,最关键的是选准我之出击方向和攻击目标。只有窥破敌之阵势中的弱点与要害,以我之力量攻其防护薄弱的“要穴”,方能奏效。通常敌进情况下之我进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一是敌人力量薄弱之处。由于受到进攻地形、道路和不同部队任务区分等条件的制约,任何强大的攻势中均存在着相对薄弱的部位,如两支敌军之间的结合部等。在敌已经形成大的包围圈的情况下,采取敌进我进以跳出敌之合围,其方向必须选择在敌之战线间隙或力量薄弱之处。二是敌人的后方与侧翼。如彭德怀在解放战争中北西战场上的挺进西府战役,就是攻敌后方之敌进我进的典型战例。1948年4月,彭德怀为调退攻占我延安、洛川的敌人,寻机各个歼敌,指挥西北野战军大踏步向胡宗南的后方西府进军。彭德怀在部署这一战役时说:我们威胁胡宗南的后方,搞他的补给基地,他就顾不上延安了,可以迫使敌人不战自退,撤出延安。只要把敌人调过来,就可以在运动中找战机消灭它。4月26日,西野攻占了胡宗南的后方补给基地宝鸡市,全歼守敌一个整编师,缴获如山。延安和洛川守敌弃城南撤。被敌人占领了一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年一月零三天的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了人民手中,彭德怀以外线进攻敌后方,逼敌自撤的战略意图顺利实现。三是敌人的战略重地。战略重地是在战略全局中居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地区,在敌之进攻面前,以我之主动的外线出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是打乱敌人作战部署以瓦解其攻势乃至实现战略转折的重要手段。又如在解放战争中,在敌人的全面进攻的势头正盛时,彭德怀于1946年11月就提出了“来年初或初夏向中原出击”的问题。并协助毛泽东就进军中原这一国民党统治区之战略腹地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出了极富远见的部署。后来,正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中原,拉开了我之战略反攻的序幕,成为我之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的一着妙棋。当然敌进我进的方向远不只是这几个方面。战争指导者应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敌我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地理等方面的条件,灵活地选择出击方向,以达到粉碎敌人进攻之目的。

从具体情势出发,确定敌进我进的规模和作战样式。彭德怀认为,敌进我进的实施规模和方式,应视敌战场态势和我之作战意图而定。可以是一部牵制,主力跳出外线,进攻敌战略后方,以从根本上改变敌战略布局,如西府战役;也可主力阻击敌人,以一部跳出外线在敌占区左冲右突,以在敌人回援时配合主力内外夹击,陷敌于腹背受击的不利态势;此外敌进我进还表现为敌对我某一根据地进攻时,我相邻的其他根据地军民则对当面之敌展开进攻,以牵制敌人,策应被攻地区军民打退敌之进攻。

### (三)巧妙周旋

敌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和进攻地位时,往往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寻求与我主力决战。而我既要避免这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又必须创造各个歼敌的条件,就必须善于与敌巧妙周



旋。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指挥八路军粉碎日军的扫荡与合围,在解放战争的陕北战场上战胜10倍于己之敌的重点进攻,正是靠着与敌巧妙周旋的功力。在与敌周旋中的“巧”与“妙”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善于以小牵大。这就是以分散的小部队伪装成大部队,采用牵牛战术,拖着敌人大旅行,而主力部队则隐蔽、休整,待机破敌。彭德怀在1947年陕北三战三捷中,抓住敌人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用2个营的兵力,配备电台,装成野战兵团主力机动,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千沟万壑中辗转奔波,陷敌于极度疲惫和缺粮之中,而我主力则以逸待劳,当出现有利战机时,以突然猛烈的动作歼其一部:先是以一部兵力诱敌主力北上安塞,主力伏击歼敌第三十一旅于青化砭。继之以一部兵力吸引敌主力于西,主力伏歼敌第一三五旅于羊马河。进而又以假机动调动敌人远涉绥德,我主力乘虚攻歼敌一六七旅于蟠龙。以小牵大其精要在于:其一,正确确定机动方向和路线。它必须既是主力隐蔽待机相反的方向,又是我主力可能攻取敌敏感部位或敌预计我之机动的方向,这样敌人才可能信以为真。其二,合理确定诱敌部队的规模和编成。诱敌部队的特点是以小示大,究竟小到何种程度,应取决于以下因素:欲显示主力的大小、敌人侦察能力的强弱、隐蔽条件的好坏、部队示假手段的多少。既要尽量节省诱敌部队的兵力,又要有适当抗敌能力。其三,逼真地显示大部队行动的迹象。以小牵大能否牵得住,关键看装得像不像,大部队行动与小部队行动有许多明显不同的外部特征,如缩营地域的大范围、电台功率的大小等等,小部队把大部队的行动特征逼真地模拟出来,敌人才会深信不疑。

第二,掌握好“利害变换线”。在与敌周旋时,我诱敌部

队甚至主力被敌形成合围之势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旋的功夫在于从敌人的包围圈中安全脱出。彭德怀指出在敌多路重兵合围时,主力从敌人合围的缝隙中突围转移至外线的成功在于掌握“利害变换线”,即掌握敌人在运动中进至最有利于我突围的位置。敌人分进合击,我行动过早转移不到敌后,行动迟了,又突不出去。最好的时机是敌人准备接近其预定合围圈而尚未合拢之时。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我军常常能在敌人多路重兵“围剿”时跳出圈外,其成功的秘诀即在于此。如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当红军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后,蒋介石调整部署,命所有的兵力采取大包围的态势接近红军,企图歼灭红军主力于宁都以北地区。红军遇到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局面。红一方面军领导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在敌包围圈即将合拢之时,以罗炳辉率第十二军向东佯动,一路扬旗鸣号,引敌追堵。彭德怀则率红三军团同红一军团主力偃旗息鼓,从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部和陈诚、罗卓英部之间一个10公里间隙大山中偷越过去,进至兴国枫边地区集中隐蔽休整,待机歼敌,待敌军发现红军主力已经转移,再转向西进时,红军已休整半月,而敌人已被拖得苦不堪言,士气急剧下降,无力再战。

第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与敌周旋,是要打乱敌人的预定作战部署,使其步入我之步调。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在作战时机、作战方向、作战对象上使敌听命于我而不被动地应付于敌。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正是获得这种主动权的有效途径之一。1929年10月,彭德怀率领去井冈山的部队和坚守在湘鄂赣边的部队汇合后,敌军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共四个旅向红五军进攻,第一线三个旅齐头并进,一

路经永新、一路经莲花向红五军夹击；第二线以一个旅为策应。当时红五军只有2300余人，要对付几倍于己之敌，硬拼显然不行。彭德怀带领部队从敌军间隙中进至莲花县城东约40里的潞口沙潜伏。当晚，敌一个营进至该地宿营，红五军伏兵四起，猛烈冲杀，只用半个小时就消灭了敌人。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彭德怀继续采用避实就虚、攻其必救的战法，与敌周旋，调退进攻之敌。遂率领部队迅速北进，攻占宜春、分宜，消灭了地主武装，进逼樟树，进一步威胁南昌。进攻湘赣边之敌极度恐慌，连夜退回吉安，被迫放弃了永新、莲花两城。

## 二、“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

运动战之所以成为我军以劣胜优的基本作战样式，其根本之点在于它有利我军形成局部的优势，在每一次作战中以优胜劣。而其实现的诀窍则在于正确地选择作战对象，坚决地贯彻各个击破的作战原则，因此彭德怀特别强调“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要想一口吞”。<sup>①</sup>

### （一）拣弱的打

战争是力量的较量。战争力量的强与弱是战争胜负的基础，强胜弱败是战争的普遍规律。我军在战略上的以弱胜强，并不是对强胜弱败规律的否定，而是对它的灵活运用，即通过争取局部的优势来实现的。彭德怀指出，正因为敌人军事力量占有优势，特别是技术装备相差悬殊，“所以在战略方面，我们还是以弱抗强；然而，在战役和战术方面，我们必须求得以强攻弱，即使在战役上自己的力量小于敌人，也要求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得战术上来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sup>①</sup>。而要取得这种局部的优势,就必须贯彻先打弱敌的原则。即在多路运动之敌中,“应当先找弱一点的消灭,如此强的亦将变成弱的,倘若先攻强的,就是攻得下,损失也必大;攻不下,则弱的也变为强的,更难攻了。”这就是说,拣弱的打,容易使我军形成绝对优势,实行四面包围,速战速决,全歼敌人。先消灭了弱敌,强敌失去了羽翼,受到削弱,就会出现有利于我继续歼敌的新形势。同时有利于我军迅速转移兵力,连续歼击他部敌军。

弱军是当面敌军之间相比较而言的。彭德怀指出:“所谓弱,指的是敌人的兵力上比较弱,配备上比较弱,素质上比较弱,或者处在不利地形下的敌人。”<sup>②</sup>因此,在选择作战目标时,通常应首先选择以下目标。

第一,分散孤立之敌。一是为控制其占领区和交通线而分散守备之敌。如1930年6月,红三军团组建后,中央军委指示红三军团进攻武汉。在军团前委会上,彭德怀分析认为,武汉有敌重兵据守,且有坚固的城防工事,长江又正是涨水季节,南湖水满,沿江只有一条通向城墙的大堤。国民党钱大钧部的13个团驻守岳阳,罗森部驻守新阳。红军如进攻武汉,钱、罗两部必然尾追而来,红军前有坚城,后有重兵,侧有长江,背有南湖,前后受敌左右无路,处境十分危险。只有先打弱敌,使强敌失去羽翼,才能战而胜之。因此,决定先消灭鄂东南6县(鄂城、埔圻、咸宁、通城、通山)国民党地方武装,相机占领岳阳。红三军团即分兵向鄂城、通山攻击前进,并作出进攻武汉的假象,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先后攻占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0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通山和崇阳县城,并控制了宁县的大部地区。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急调岳阳钱大钧部的12个团星夜赶赴武汉,岳阳守敌仅剩1个旅的直属队和1个团的兵力。彭德怀认为岳阳城内兵力薄弱,防务空虚,应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攻占岳阳。7月4日,彭德怀指挥红军避实击虚,向岳阳守敌发起总攻,经过2小时激战,一举攻克岳阳城。为此后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创造了条件。可见,正是拣弱敌打这一作战原则的灵活运用,才使处于弱勢的红军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二是分路向我进攻,各路相距较远,失去协调之敌。如在抗美援朝一次战役中,针对敌人对我军入朝作战估计不足,分兵冒进的情况,彭德怀决定采取分途歼敌的作战方针。当时西线南朝鲜军第六师先头营进占楚山,第八师和第六师主力进至熙川地区,第一师主力进到云山地区,美军第二十四师、英军第二十七旅分别进至龙山洞、博川地区。先打哪一路最为有利呢?彭德怀分析认为,美第二十四师、英第十七旅和南朝鲜第一师虽然分散,但相距不远,我如打这三路中的任何一路,都有胶着的可能,于我不利。而熙川南朝鲜军孤立冒进,属于好打之敌,遂决定集中6个师首先歼灭西川南朝鲜第六师、第八师各一部。从而确保了首战告捷。二是进的脱离主力,或位置突出,不能及时得到其他部队支援之敌。如彭德怀在陕北战场上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及此后不久沙家店战役,均是这种情况。

第二 战斗力较弱之敌。如武器装备差,训练素质低,内部矛盾深,指挥官无能,非嫡系杂牌军,新组建的部队等。在朝鲜战场上,南朝鲜军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相比,无论武器装备、技战术水平,还有指挥员的素质,都相对较弱,因此彭德怀在抗美援朝的各次战役中,都将南朝鲜军作为首先攻歼的目标。第一次战役中,主要歼击对象为南朝鲜军的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两个师,第二次战役,彭德怀又将主要反击方向选在南朝鲜第二军进占的德川、宁远地区,结果一举打开了战役突破口。第三、第四和第五次战役,彭德怀亦主要以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军为目标,这样,一般都能迅速打开缺口,造成整个敌军战线的溃乱,战斗力较强的美、英军也不得不随之败退。

第三,处于不利地形条件之敌。地形的好坏,对于战斗力的发挥有很大的影响,军队战斗力虽强,处于不利地形亦将变弱,而战斗相对较弱的部队占据有利地形亦可使战斗效能倍增。因此在区分强弱时,要将地形条件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 (二)击要害处

以我之积极的作战行动创造各个击破的条件,关键在于我之作战行动能对敌人产生我所预期的影响。然而敌人是依其自身的战略利益来采取相应对策的。如我之行动不足以影响其根本利益,就很难使他们改变既定的作战部署。因此彭德怀认为,运动战中选择攻击目标时,最优先考虑的作战方向应该既是敌之薄弱环节又是敌之要害部位。这样不但能歼灭敌人,而且能更有把握调动敌人,瓦解敌之进攻阵势或防御体系。击要害处的基本作战方向是:

第一,袭其战略、战役中枢。战略、战役中枢即在战略、战役的全局中处于核心枢纽地位的地区和部位。它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争或战役的胜负。因此以我之行动攻击或威胁敌人的战略、战役中枢,如果得手,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敌人的整个作战部署、动摇其军心,给我各个歼敌创造条件。即便由于敌人加强了防范而未能获得歼敌和据地的战果,也能使敌不得不将主要精力和兵力转到对其中枢的保卫上,从而起到打乱敌人部署的作用。1948年初,陕北战场上的敌我兵力对比由一年前的10※1转变为这时的5※1,我军具备打更

大歼灭战的能力。彭德怀决定西北野战军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的战略进攻作战。并将战略进攻的第一仗选在胡宗南的战略中枢宜川。采取围城打援战术,调动敌人来援,先歼援敌,再克宜川。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胡宗南视之为关中屏障。西北野战军进攻宜川,胡宗南果然慌了神,一面令宜川张汉初部据险坚守,一面急令刘戡率四个旅的兵力由洛川、黄陵前往救援。结果援兵守敌全部被西北野战军歼灭于宜(川)瓦(子街)战役,共歼敌1个军部、2个师部、五个整旅共2.9万多人,军长刘戡被击毙。创西北战场空前大捷。

第二,捣其补给基地。我国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任何一支军队,粮、弹的供给保障是其战斗力的基础。一旦断绝了供给,就陷入坐以待毙的绝境。因此补给基地乃军队作战之要害。尤其我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部队的补给主要靠取之于敌,攻占敌补给基地确是“一举两得”。彭德怀在作战中,对敌人的补给基地特别“关照”。1933年彭德怀率东方军东征作战中,其第一仗就是夺占当面之敌的补给基地——泉上。东方军入闽后,彭德怀根据敌情,决定先取泉上。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部,储备大批的粮食、食盐等物资,是敌人重要补给点。有敌一个团驻守。彭德怀认为进攻泉上,就可调动敌人来援,在运动中消灭当面之敌七十八师。但以项英为代主席的中革军委主张集中力量打大城市,认为泉上只是一小堡,弃之与否,无关紧要,反对攻打泉上的部署。要求东方军即使不打下大城市也要打县城。彭德怀据理力争,在周恩来、朱德的支持下,东方军得以按彭德怀的部署行动。7月上旬围攻泉上,果然调动了敌之七十八师驻归化、清流等部驰援泉上,乘敌调整部署之际,彭德怀指挥东方军于9日袭占归化,10日于延洋歼灭增援泉上之敌5个连,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在马屋附近击溃敌 1 个团。14 日 ,占领清流域 ,19 日 ,攻克泉上 ,全歼守敌。从而扫清东方军东进的障碍 ,为开辟新的苏区创造了条件。解放战争 ,彭德怀在同胡宗南较量中 ,在撤出延安不久即袭取胡宗南在陕北的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 ,一年后 ,即 1948 年 4 至 5 月 ,又指挥西北野战军大踏步向敌战略后方挺进 ,攻占了胡宗南在整个西北的最大补给基地宝鸡。这对于转变战略态势 ,由被动转入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 ,扼其咽喉要道。中国武术 ,有一个招式叫锁喉术 ,在比武打斗中 ,能将对手的咽喉卡住就必胜无疑。通道在战争中犹如人体的血管、气管一样重要。部队进退、各部之间的战斗支援、后勤保障等均须有畅通的道路为前提。一旦通道被切断 ,就会进退无路 ,供给无望 ,阵脚大乱。而扼其咽喉要道正是切断通道厉害的手段。彭德怀认为 ,对于驻守防御之敌 ,我应尽可能通过进攻其咽喉要道而调动敌人 ,变阵地战为运动战。对于处于进攻、退却或调整部署的运动之敌 ,则应派主力部队迅速地攻占敌进退之必经要点 ,以形成关门打狗之势。1933 年彭德怀率东方军东征中 ,当东方军攻取泉上之后 ,中革军委命令东方军从北向南攻打连城。彭德怀认真分析了连城地区的敌情、地形 ,认为按中革军委的作战部署行动 ,红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 ,难以完成任务。提出了攻打连城地区之敌 ,应以咽喉要道朋口为突破口 ,调动莒溪、连城敌人出援 ,歼敌于运动之中。经彭德怀的一再坚持 ,此方案得到批准。

朋口在连城南 50 里 ,莒溪北 20 里 ,位于龙岩至连城和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处 ,是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7 月 30 日 ,东方军集中兵力前后夹击 ,据守朋口的一个团和从连城出援的一个团全部被歼。东方军占领了朋口 ,为夺取



连城创造了条件。连城守敌之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得悉所部两个团被歼,急电十九路军总部请示对策。十九路军总部惟恐七十八师被歼,急令其弃城,撤向永安,东方军紧追不舍,急行军160里至小陶,再歼其1个团。不但不费一枪一弹收复了连城,同时开辟了泉上、清流纵横百里的新苏区,胜利完成了东方军第一阶段闽西作战任务。

彭德怀在对运动之敌实行包围迂回时,无不在锁喉上作文章。如在解放战争的扶眉战役中,当胡宗南发现自己的五个军已被西北野战军包围时,立即组织部队抢占撤退的咽喉要地罗局镇,但为时已晚,因彭德怀已派重兵迂回至此,先胡宗南一步卡死了这个口子,从而达成了全歼胡宗南主力4.4万人的战役目的。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亦是派第三十八军迂回抢占敌南逃北援的要点三所里、龙源里,才取得了二次战役的辉煌胜利。

### (三)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

彭德怀认为,由于我所面临的敌人是反动的阶级,他们尽管在反共反人民上目标一致,但其内部各集团之间,又有着各自的私利,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因此,要各个击破敌人,还必须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以我之因敌而异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使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充分显露、不断加剧,离心离德,为我各个击破创造条件。

彭德怀在解放战争时的西北战场上,对胡宗南集团与青、宁二马的作战,就表现出了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高超艺术。

西安被我解放之后,蒋介石急令胡、马联合,向西北野战军反扑。彭德怀分析认为,此时胡宗南元气已伤,想要借二马的力量来保住西北,而二马尚未受我之大的打击,还气势汹汹,企图与我一决高下,并借此取代胡在西北的地位,变

“胡西北王”为“马西北王”。我要加速西北解放战争的进程,打破胡马之间的联手非常重要。而达成此点的关键在于利用他们都想保存实力的心理,扩大其矛盾。为此连走了几着妙棋。

第一步是咸阳“炮吃马”,逼青宁二马保存实力离胡回防。当胡马联合向西北野战军反扑时,彭德怀摆出了一个孤军背水守咸阳的态势。这时十九兵团已从禹口西渡黄河入陕,先头部队已达富平、三原一线,彭德怀命其于三原按兵不动,又把西北野战军主力收缩到渭河以南,而命六军北上礼泉担任防御,命六军十六师离开咸阳,沿西北公路北上,节节抗击从郴州方向来犯之马匪第八十二师及第十一军之一六三师。胡宗南为了借马继援之手反共,特意向马通风报信说,共军主力全部集中于渭河南岸对付李振兵团,只有孤军一支背水扼守咸阳,以此煽动马匪大胆进攻咸阳进而反扑西安。马匪得到情报,又见我十六师节节后退,真以为是进兵的大好时机,因此全力向咸阳突击。而彭德怀这时却命令六十一军以1个师的兵力星夜兼程秘密进入咸阳,又命令十八兵团三个炮兵团、六军1个炮兵团、总部1个炮兵团,一共五个炮兵团加上六十一军一八一师的轻重火炮,共计400多门火炮隐蔽在咸阳城外。马匪果然上当,他们以为咸阳城内兵力空虚,当到达咸阳城下后,命令部队下马徒步攻城。彭德怀一声令下,所有火炮来了个射人先射马,一八一师则从城内杀出收拾离开了马背的“骑兵”,使这支凶猛剽悍的马家军伤亡惨重,狼狈向西南逃窜,退守彬县。他们认为此次损失是胡宗南为保存自己实力而以假情报鼓动马家军替其送死造成的。

马匪吃了苦头,不敢轻举妄动,胡马联防遭到了破坏,这时彭德怀走出了第二步棋:钳马打胡。以十九兵团之一部逼

近“二马”，形成将要对其展开进攻之势。而集中3个兵团向胡宗南集团发起扶眉战役。在胡遭到突然猛攻之际，急向二马求援，但鉴于咸阳“炮吃马”的教训，二马没有听从胡的调遣，按兵不动。使得一野得以全力攻击胡宗南集团。仅用四天时间就消灭了其四个军4.3万人。胡宗南集团主力受重创，残部退守秦岭。二马彻底孤立。至此，胡马联盟被完全粉碎。

于是，彭德怀走出了第三步棋：追歼二马，先马后胡。在扶眉战役后，彭德怀分析说：“现在放一放胡宗南，对全局、对局部都有好处。因为胡宗南背靠四川，如果我们打紧了，胡宗南会过早逃到四川，那样对二野不利，这是大局。如果将两个拳头分开来，一个打胡，一个打马，力量不集中，打也打不痛，因而两个拳头合起来打，打得才有劲。”进而组织了兰州战役，一举歼灭了青马的主力，继而解放了整个西北。

### 三、“包围迂回胜过中央突破”

迂回、穿插、包围、分割，是运动战中重要的战术手段。迂回是绕向敌人后方的机动。其目的是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协同正面部队包围围歼敌军某一集团。穿插是利用敌人部署的间隙或薄弱部位，插入其纵深或后方的作战行动，是夺取敌纵深的要点、分割和打乱敌人部署，使敌无法组织集中有效抵抗的重要手段。彭德怀认为，在运动战中要达成歼灭战，就必须“以相当强大兵力迂回至敌深远后方，阻击逃敌和战役二梯队之增援，威胁敌战役供应线，使敌阵势发生动摇”<sup>①</sup>。运动战的作战企图在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对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于处在运动之中的敌人,一般都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当发现自己处于劣势被攻击地位时,或“知难而退”,或夺路而逃,如不断其退路,就不可能达成歼灭战。迂回或穿插至敌后,则是实现对敌包围的最基本的手段。同时,对被围之敌,也只有将其割裂成若干小块,才能使其失去有效的指挥和联系,以利我之各个歼击。而穿插则是割裂敌人的惟一途径。特别是在敌军拥有装备技术优势的情况下,只有紧紧贴住敌人,与其短兵相接,才能使其坦克、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无用武之地或减杀其威力。进行穿插分割正是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实现优劣转化的高明之着。因此彭德怀论述对日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就明确指出:“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包围迂回胜过中央突破,在敌人后方侧翼积极活动胜过正面抵抗。”<sup>①</sup>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进一步强调“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我军应力求夜战,力求大胆地迂回包抄分割,勇敢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sup>②</sup>。

(一)依据敌之薄弱环节和地形特点确定穿插、迂回的路线和样式

穿插迂回方向和路线,对于穿插、迂回部队的行动有着极大的影响。方向正确,路线对头,可以较易到达指定的位置。否则,不但会给穿插迂回部队的行动增加难度,而且有可能完不成任务。因此彭德怀认为,在确定穿插迂回方向路线前,必须准确查明当面和纵深的敌情、地形,在此基础上,依据我之作战企图和担任穿插、迂回部队的行动方式的特点来选定穿插、迂回方向和路线。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2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敌之暴露的侧翼是我实施迂回最为理想的选择。当我预定的歼击对象存在暴露翼侧的弱点时,从敌侧翼迂回至敌后,较易实现包围。因敌之暴露侧翼便于我大部队隐蔽行动,出敌不意达成对敌合围。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对敌大兵团的迂回包围,由于战场地域广阔,一般都选择敌之侧翼。如1949年7月的扶眉战役,即是我大兵团从敌侧翼迂回以消灭胡军主力集团的典型范例。陕中战役后,胡宗南将其5个军部署在扶风、眉县地区渭河两岸,其意图是作战中可以南北呼应,无论是进攻、坚守或退却,兵力都相当集中。而在彭德怀看来,它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翼侧暴露,而且没有战役预备队,摆在秦岭的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而渭河两岸并无大军渡河设备,当我之进攻时,南北之敌不能迅速渡河增援。如我能在扶风、眉县地区将敌主力分割包围,必招致其全军覆没。因此决定集中第一、第二兵团全部及第十八兵团主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歼灭胡宗南主力。即以许光达之二兵团由集结地礼泉附近出发,越漆水河绕道西进,向敌侧后迂回,断敌西逃退路,从敌背后攻击,以周士第之第十八兵团附一兵团第七军由东向西进攻,王震率一兵团之一、二军,沿渭河西岸向南进攻。彭德怀在作战会议上特别强调:“最关键的是二兵团,你们要隐蔽开进,路上遇到小股敌人不要纠缠,突然插到敌后,直逼渭河。在占领青化镇、益店后,即向罗局镇、眉县车站进攻,抢占蔡家坡,切断陇海路,阻敌向宝鸡撤退。”7月11日上午,二兵团3个军主力部队到达敌后指定位置后,彭德怀一声令下,第一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发起总攻,使胡宗南集团猝不及防,只用一天多时间已从东西北三面将敌之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一一九军包围于扶风、眉县地区。12日午夜,一野第二、第十八兵团在罗局、午井地区胜利会师。接着,各兵团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乘胜西进,至14日,先后占领了蔡家坡、岐山、凤翔、宝鸡、益门镇等地,共歼敌4.3万人。

选择敌之部署中的较大间隙实施迂回穿插。彭德怀认为,穿插迂回作战,还必须善于“钻空子”。因为任何军队无论在攻防作战中,由于受到地理、兵力等条件的制约,部署上均会有一定的间隙。特别是处于运动中的军队,由于不同兵种对道路有不同的要求,不同部队有不同的前进目标,其间隙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指挥员在选择穿插迂回方向、路线时,应悉心研究敌人各部队行动中兵力不能所及或兵力甚微的位置所在,把我穿插迂回部队行动方向选在敌部署间隙较大而利于我隐蔽快速行进的部位上。从敌间隙中穿插迂回,亦应尽可能地在攻击发起之前行动,当敌之进攻一线或防御前沿间隙较大,而又对我即将发起的进攻作战毫无察觉情况下,从敌人“眼皮底下”穿插迂回至后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从蒋鼎文与蒋光鼐、蔡廷锴等军“约二十华里之间隙穿至莲塘、良村,进行挖心战。第一仗于莲塘歼灭上官云相师,第二仗于良村歼郝梦龄师,第三仗歼灭毛炳文师于黄陂”。<sup>①</sup>

从敌战线的薄弱处撕开口,尔后实施迂回穿插。在有的作战中,当面之敌正面形成了较为连贯的战线,而侧翼又不利于我之兵力机动,在这种情况下,要达成迂回包围,就必须乘敌立足未稳,在敌战线薄弱部分首先打开战役缺口,再实施战役迂回。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朝鲜战场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作战正面小,基本上不存在攻击发起前以大部队从敌暴露的翼侧或间隙秘密突然地穿插迂回至敌侧后的可能性。因此,彭德怀从实际出发,采用了先从敌战线薄弱处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1页。

打开战役缺口,尔后再实施穿插迂回の様式。在第二次战役中,使用两个军选择敌人翼侧薄弱的德川、宁远首先打开战役缺口,然后乘势以迅猛的动作向敌后穿插迂回,出敌不意攻占了敌南逃北援必经之地三所里和龙源里,从而打乱了敌人的整个布势,造成我正面四个军对敌人进行战术上分割的有利态势,对夺取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同样是在从正面突破敌人阵线后,命令左纵队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向济宁以南石长里地区穿插,切断南朝鲜军第二师退路,右纵队三十九军一一七师迅速突入敌防御纵深12公里,占领东豆川东山,将南朝鲜第六师的退路切断,从而取得了全歼南朝鲜军第二师二个团、第五师一个团大部、第六师一部的胜利。

(二)以插得到、堵得住、啃得动为前提选择迂回的终点

在迂回穿插行动中,不仅有个方向和路线问题,而还有个终点问题。彭德怀认为选择战略、战役迂回的终点,应根据歼敌的目标大小和敌军战略、战役部署纵深的长短而定。其基本要求是:

插得到,即迂回部队在充分发挥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的情况下,在预定时间内能够达到的地点,这不仅要考虑到距离,更要考虑可能遇到的敌情和天候、地形、道路等制约因素。如在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彭德怀选择战役迂回的终点,一般内层迂回或单层迂回离正面战线约在15~30公里,这一距离恰好是“联合国军”第一梯队师的后方,兵力比较空虚,同时也有利于志愿军部队在一个夜晚最多一昼夜即可达成迂回。如第二次战役的德川作战,选择南朝鲜第七师的后方遮日峰和去云松里,价川、军隅里地区选择美第九军后方三所里,第三次战役左路选择南朝鲜军4个师的后方上南里、美山里等,均距离敌正面约15~30里,实际迂回距离最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远 70 余公里,如第一一三师从德川向三所里的迂回距离为 145 华里。由于距离适当,一般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堵得住,即迂回的终点地形条件应是易守难攻,一旦抢先占领,即可卡住敌人的脖子,即使在敌人疯狂反扑和敌援兵拼命相援手的情况下,亦能在预定时间内坚守阵地。不使敌被包围部队同其救援部队汇合。抗美援朝的一至五次战役,志愿军的迂回终点一般选择在战役歼击目标纵深内的交通要点上,即“联合国军”撤退逃跑和后方部队增援必经之路,并有可依托的阻击地形。如第二次战役一一三师的迂回终点三所里,位于价川至顺川公路中点,是敌南逃北援的一道“闸门”。他们依托有利地形,坚决阻止了美第九军部队南逃和顺川、平壤美、英军各一部经此向北救援,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啃得动,对敌的迂回包围的目的在于全歼敌人,在选择迂回终点时,还应取决于被围之敌能否为我军所拥有的兵力、火力所承受。“贪多嚼不烂”,有把握吃掉敌人是选择迂回终点的前提条件之一。1948 年彭德怀在总结沙家店战役胜利后追击战时讲到:“岔口一仗,开始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结果越打越多,打出来五个旅。二纵队又想一吞,生怕敌人跑了,把敌人出路一堵,结果啃不动,只好放开一个缺口,让他跑掉。”<sup>①</sup>在进行力量对比时,不仅要考虑敌我兵力对比,而且要考虑敌我火力、机动力、突击力等技术装备对比多种因素。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敌我技术装备虽有差距但并不十分悬殊,且国民党军部队在士气勇敢精神上与我军相差甚远,因此一般兵力上有 3 倍优势即可达成围歼。然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敌我技术力量相差十分悬殊,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4 页。



在兵力上取得了3-5倍的优势,也很难在火力上压倒敌人,即使将敌围住,也没有能力将其吃掉,只能打成击溃战。如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七军在战役发起的当夜,即按计划将美陆战第一师大部和美步兵第七师一个多团分割包围于长津湖地区的三个点上。但是由于“联合国军”武器装备强,坦克多,被围之后,夜间由坦克组成环形防御掩护步兵,充分发扬火力,固守待援;到了昼间,被围部队在其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接应下,以坦克为先导,由炮兵火力开路,组织突围。敌人虽遭歼灭性打击,仍能突出包围逃跑。如果胃口太大,就有可能为敌所乘,给自己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必须从作战双方的综合战斗力对比的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把迂回的终点选择在作战目标能为我所全歼的范围内,

(三)从具有高度独立作战能力的要求出发选派穿插迂回部队

穿插迂回部队执行任务,一般都是孤军深入敌后,没有友邻部队的支援,在穿插迂回途中还会遇到敌军后方部队的阻拦、穿过深山密林、逾越江河障碍等各种复杂情况,到达终点后,要准备两面作战甚至三面四面作战,有的还要担任会同正面歼灭被围之敌的任务。因此,选择执行穿插迂回任务部队时应该考虑以上的特点,并以此为着眼点充分作好各种准备工作。这是穿插迂回作战成功最重要的保证。

使用精兵强将担任穿插迂回任务。由于穿插迂回在战略和战役中既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又特别艰巨,因此彭德怀强调执行穿插迂回任务的部队必须具有攻守兼备的作战经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灵活机动的应变能力。特别是其指挥员必须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经验和极强的临机处置的能力。他向来都将所属部队中的拳头部队和智勇双全的战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将用于执行穿插迂回任务。如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实施迂回的第一一三师、第三次战役左纵队的第一二四师、右纵队的第一一七师、均是主力部队,有较强的战斗力因而较好地完成任务。在第二次战役西线战役迂回时,为加强其领导,还派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随第三十八军行动,直接指挥该军的迂回作战行动。迂回部队的规模,依据作战目标的大小和其战斗力的强弱而定。彭德怀认为敌我装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我迂回部队的兵力与敌军之比一般在1:3左右即可完成任务。而在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则迂回兵力就应相应加大。如在抗美援朝时,我迂回兵力与预定围歼之敌兵力对比一般为1:1强,即预定围歼敌一个师,志愿军的迂回部队一般不少于一个师。二次战役第三十八军围歼德川地区南朝鲜第七师,则用第一一二师、第一一三师两个师的兵力从两翼实施迂回,第三次战役左纵队围歼南朝鲜第二师,则用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四师一个师迂回。预定围歼敌军二~四个师,一般不少于四个师,第二次战役西青川江志北地区作战,预定围歼美第九军指挥的二~三个师,并在美第一军南撤时予以追击和侧击,则用两个军实施双层迂回。

担任穿插迂回任务的部队必须针对任务特点进行充分的作战准备。彭德怀向来强调打有准备之仗,他指出,作战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准备是否充分。穿插迂回作战情况较之一般作战任务更复杂、更艰巨,因此准备工作要细致、更具体、更充分。是在装备的配备和编成上:既要求轻装,又要有较强的火力;“组织精干炮兵伴随向纵深猛插”;一梯队、二梯队的兵力火力同等编组,一旦一梯队受阻,则二梯队立即变为一梯队,继续前进。在给养和器材的准备上:要完全依靠自带,“尤需充分带足干粮”;要充分考虑部队行进路线上地形和自然条件,保证部队穿越密林、渡涉江河、攀登

山崖有便利的器材。在应变方案的准备上 :要尽可能地把穿插迂回途中可能遇到各种情况都设想到 ,并研究出相应的对应措施。在作战动员和战前训练上 :要有针对性地解决思想及战术技术上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果断灵活处置穿插迂回过程中的情况。彭德怀强调 ,执行穿插迂回任务的部队 ,在途中遇到预料之中的敌情时 ,应坚决地按预定方案执行 ,遇到预定方案之外的敌情时 ,应迅速判明敌情 ,以保证部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为总的原则 ,灵活处置。要尽快摆脱敌纵深部队的纠缠 ,“切忌恋战”。一般的处置原则是 :遇到小股敌人则以小部队将其歼灭或驱逐之 ,遇有设防敌军 ,则以尖刀分队采取迅猛动作 ,打开通路 ,掩护主力部队通过 ,若遇敌较大兵力攻击 ,而前进受阻时 ,则不必恋战 ,而应以小部队牵制、监视敌军 ,主力绕道通过。彭德怀还特别强调 ,在穿插迂回过程中。要“紧紧掌握指挥员靠前 ,火器靠前 ,敢于使用主力向敌纵深猛插之原则”<sup>①</sup>。

(四)讲究不同方向不同层次的穿插与迂回、穿插迂回与正面突击的整体配合 ,以实现围歼敌人的战略、战役目标

在战争中 ,任何一个胜利的取得 ,都是多种战略战术手段综合运用协调发挥作用的结果。彭德怀在运用穿插迂回作战样式时 ,注意强调以下手段。

建立多重迂回部署。彭德怀认为在敌突击力、机动力和应变能力较强的情况下 ,为确保实现战役迂回的目的 ,断敌退路 ,形成大量歼敌的有利态势 ,还应建立多重迂回部署。如在抗美援朝的第二次战役中 ,彭德怀即采取了多重迂回的部署。一是以第三十八军主力向院里、军隅里方向迂回 ;二是以第一一三师向三所里方向穿插 ;三是以第四十二军向顺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95 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川、肃川方向迂回。因为这次战役的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军、英军,其战斗力较强,装备技术远优于我,尤其是他们具有很强的机动力,在南撤道路较多的情况下,志愿军如仅采取单方向单层迂回的方法,将很难奏效。而建立上述三个方向、三个层次的战役迂回部署,不仅将使北犯之敌四面受到威胁,而且便于志愿军各路迂回部队相互配合,有利于战役迂回目的的实现。战役的进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向敌侧后实施多重战役迂回,使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一一三师到达三所里、龙源里后,敌人更加恐慌,开始全线溃退。而有的部队尽管因种种原因未能按时迂回到预定地点,但牵制了北援之敌,对达成战役迂回目的也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

大部队的穿插迂回与小部队的渗透相结合。彭德怀指出,不但要重视组织大部队迂回穿插作战,同时,要组织若干侦察分队、游击部队和尖刀分队对敌阵地和敌后进行渗透。“各兵团(军)插到敌后之侦察部队,应于发起攻击前一夜,寻敌间隙,秘密渗透敌后各预定地点隐蔽,不被敌先期发觉,待我正面攻击开始时配合之,才可起重大作用。如情况不许可,则于发起攻击同时由缺口猛插过去。”在正面攻击发起前,要“以精干的小部队(即称尖刀连、营)利用夜暗、地形险要处出敌意外,突然渗透至第一线纵深,以勇敢的战斗动作,首先袭击敌火力阵地和指挥所”<sup>①</sup>。混乱敌之部署,乘胜全面猛攻,使敌自顾不暇。

战术上的分割与战役上的迂回相配合。彭德怀认为,战役迂回只是为我军在运动中歼敌提供了条件,要歼灭敌人还必须进行战术上的分割包围。只有以战术上的分割包围与战役上的迂回相配合,才能最快实现战役迂回的目的,大量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页。

歼灭敌人。特别是在敌占有强大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机动速度快,当其处于不利环境下容易组织撤退或重新部署,改变其不利态势,使我难以达成将其歼灭的目的。因此在实施战役迂回的同时,须组织正面部队迅猛突击,对敌实施战术上分割包围,紧紧抓住敌人,不使逃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要求“各部必须紧紧掌握……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得力部队,渗透切断敌后路,以求干净、全部、各个包围歼灭敌人”,不但要以“相当强大兵力迂回至敌深远后方,阻击逃敌和战役二梯队之增援,威胁敌战役供应线,使敌阵势发生动摇。我正面向敌进攻之部队,应积极割裂敌阵地,使之成为无数小块,隔离其联络。……上述迂回、割裂、渗透密切结合起来,明确分工,再以积极动作中求得互相协助和行动一致”<sup>①</sup>。

#### 四、速战速决

运动战强调以“走”来创造“打”的机会和条件。一切“走”都是为了“打”。然而打的结果如何,也必然影响下一步的走。因此速战速决是运动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进行的运动战,大多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由此产生了作战的如下特点:一是在敌多路向我进攻时,其总兵力是占有优势的,我为了各个击破,必须准备迅速的连续作战;二是当我集中优势攻击其一路或数路时,如不迅速解决战斗,当其他各路之敌驰援赶至,我则不但失去兵力优势,而且可能被反包围;三是在敌拥有悬殊的技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92、423 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术装备优势时,敌具有很强的快速机动能力,空中和机械化部队的增援在很短时间内即可到达,如不能快速解决战斗,我则将陷入被动。四是在我军给养靠作战部队自行携带的情况下,其维持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如不在预定时间内结束战斗,则后续供给就无法解决。因此,彭德怀指出,为了保持我军的主动,在战役上必须实行速决战。“乘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减少敌人空军、炮兵及其他机械、化学兵种配合的效能”<sup>①</sup>。彭德怀指出,在运动战中要达成速战速决,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

#### (一)隐蔽企图,达成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

彭德怀认为,敌之不意和无备,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我之能够取得局部优势,迅速歼灭敌人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运动战中的速决歼敌必须建立在隐蔽企图、突然打击的基础之上。

隐蔽自己的实力,使敌估计不足。彭德怀指出:“我们应使自己不犯错误,而促使敌人犯错误,最好方法是隐蔽自己实力,使敌估计不足,较易获得胜利。”<sup>②</sup>例如,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即一再指示部队在战斗打响前,一定要利用敌人判断我出兵可能性极小或是象征性出兵的错觉,切实隐蔽我军的参战行动和军队实力,入朝时,选择黄昏和夜暗分路过江,不为敌空中侦察所发现。入朝后,避开主要道路隐蔽开进。他指出:“我军避开主要道路隐蔽开进,否则,就会过早被敌发觉,敌将停止前进或龟缩回去。”<sup>③</sup>如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页。  
③ 《抗美援朝研究》,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在侦悉西路敌军继续向北冒进,估计数日南朝鲜第六师将经过新安州进至博川及其以西地区,其第八师将进至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彭德怀当即命令部队向前开进中,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20公里的地区,以免过早被敌发觉。由于我伪装隐蔽措施运用得好,保持了作战行动的突然性。初战告捷,歼灭了南朝鲜第六师大部和第八师两个营,为尔后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隐蔽自己的行动企图,勿为敌察。在敌对我之总体实力已有了解的情况下,隐蔽我之行动企图,则是争取形成局部优势和达成战役突然性所必须的。彭德怀指出,战争指导者应“尽力隐蔽自己企图,勿为敌察。如此才能经常保持主动,克敌制胜”<sup>①</sup>。如在解放战争的陕北战场上,彭德怀之所以能在10倍于己之敌劣势力下,出敌不意,各个分歼敌人,其取胜要诀之一是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作战企图。他在总结三战三捷的经验时说:撤出延安后,“一纵队将敌人主力引向安塞、高桥方向,使敌发生错觉。果然,敌人以为我们在安塞、保安方向,集中五个旅向安塞扑了一个大空。而我主力则在青化砭,后将一纵队亦调到青化砭,一仗消灭了敌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团。……打了三十一旅,敌知道了我们在东面,便将主力从安塞转向东,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东,乃扑向延川、延长,又扑了空。于是以为我们在清涧地区,又向清涧扑了一空。又以为我们在瓦窑堡、永平地区,再次扑了空。而我们实际在蟠龙附近地区。……敌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南下,我们埋伏在羊马河(离瓦窑堡30余里),一仗将其全歼。……此后敌人又以为我们向东转了,故以九个半旅赶到绥德,想把我们撵到黄河以东。就在此时,我们又打了蟠龙一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次胜仗,歼敌正规军地方军七千余人”<sup>①</sup>。这充分说明了,即使在敌我兵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只要真正做到了隐蔽自己的作战行动方向和作战企图,同样完全能够达成战役的突然性。

示假欺敌,出其不意。在战场上要出敌不意,不仅在于“隐真”,而且在于“示假”,即通过设置假目标、组织佯动等手段,造成军队部署与行动的假象,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其要义是以此示彼,在对立的两极中反示意图,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一极,而自己的用意却在另一极。进而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其主要方法有:方位之变——示形于东,攻击于西。即在不准备攻击或机动的方向示之以攻击或兵力机动,使之转移兵力以对应,而我则在其相反的方向窥其弱点突然一击,使其猝不及防。如上所述,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彭德怀以一部兵力装成主力向延安之西北安塞方向撤退,使敌主力向西北方向扑去,而将自己的主力部队向延安之东北青化砭地区隐蔽待机,取得了青化砭伏击敌之三十一旅的胜利。远近之变——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采取这种方法,即可掩盖我真实企图不为敌所知,又可调动敌人就我范围,顾此失彼。这样我就可以乘敌兵散势虚之机,在我所选定的作战地点,出其不意,突然攻击,奇袭歼敌。如彭德怀为了攻取胡宗南的补给基地蟠龙镇,则在百多里以外的绥德、米脂以东黄河渡口示形,造成我军欲东渡黄河的假象,当敌九个半旅远涉绥德之时,彭德怀乘机攻克了孤立无援的蟠龙。虚实之变——实而虚之,虚而实之或虚虚实实,真假难辨。如以小示大,佯攻牵制等。

### (二)集中优势兵力突击,运用近战夜战歼敌

在达成战略战役的突然性,使速决歼敌成为可能,但要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页。



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仍有赖于作战过程中战术手段的正确运用和部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为此彭德怀强调各部队必须紧紧掌握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各个歼灭敌人及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之原则。

集中主力和火力于突击方面。彭德怀指出,“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sup>①</sup>力量的压倒优势是速战速决的物质基础。在战场上,要迅速地突破敌人的战线,不但要求在战役总的兵力对比上具有数倍的优势,而且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又将主要力量在同一时间内用于主要突击方面。这就是既要求时间上的兵力集中,又要求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如果把集中的时间过程拉长,就变成逐次增兵,变成添油战术,不能实现在一定时间内的压倒优势,也就不能实现速战速决。在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就是在对敌实施攻击时,应将其主要突击力量用于最易突入敌阵和动摇其作战部署的方向上,而不能多方向平分兵力,如果同时多方向、多地段、无重点的使用兵力,同样必然减慢作战的进程,乃至攻而不克。在打开敌人的突破口后,不要顾忌当面的敌人没有完全解决,而敢于向敌纵深猛插。“积极割裂敌阵地,使之成为无数小块,隔离其联络。”<sup>②</sup>这样,敌人就会失去有效的抵抗,便于我之迅速将其各个歼灭。

发挥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优势。扬长避短,以长击短,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战斗效能而减杀敌之作战威力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是争取速战速决的重要途径。我军在武器装备上一一直处于劣势,不但没有制空权,而且重武器数量、射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1 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23 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程也远不如敌人。实行近战夜战,是发扬我之勇敢精神和减少敌之火力优势对我杀伤的传统战法。彭德怀指出:在敌“不意的方面突然施以猛击,一开始就求得白刃战,是避开敌人技术优势的最好办法”<sup>①</sup>。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拥有空前强大的火力,在空中轰炸和炮击的单位火力密度都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最高纪录。彭德怀强调:我军无空军,必须利用夜间进行战斗(手榴弹、白刃战),……乘敌立足未稳,火力未展开时,予以猛攻。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将近战和夜战作为歼敌的主要手段,将传统夜战之战术手段发展为战役规模。运动战阶段,几乎一切行动都在夜间进行,在夜间开进机动,在夜间发起进攻、打乱敌军布势,在夜间包围歼敌,在夜间进行物资补充等等。一般是黄昏开始运动接敌,集中主力于一个夜间突破敌军防御,插入敌军战役纵深,断其退路,完成战役包围,动摇其整个战役布势以利战术上的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次日拂晓,乘其混乱继续攻击,或转入防御,巩固胜利,待黄昏后再行攻击。这样,一个夜间或几个夜间完成战役作战任务。实践证明,在没有制空权和武器装备落后非常悬殊的条件下,扬长避短,实施战役规模的夜战和近战歼敌,是达成速战速决的有效战法。

### (三)适时果断结束战役行动,快速转移战场

速战速决,是发起战役的突然性、进攻动作的勇猛性和结束战役的果断性与转移战场的快速性的统一。适时而果断地结束作战行动,快速而隐蔽地转移战场,是运动战中贯彻速战速决作战原则的一个重要环节。彭德怀认为,在战役的发展与预期作战行动方案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一般较容易做到这一点。因此,关键是在作战进程出现预料之外的新情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况时,及时果断地做出正确的决断。

在战局发展有利时保持清醒头脑,适时结束战役行动。在战争进程中,有时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自己的作战意图已基本实现,而战场仍呈现某些有利于我连续作战扩大战果的态势。是结束作战行动还是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彭德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员尤须头脑冷静,从保持战略、战役全局主动着眼,当打则打,当停则停。当战局确实有利我扩大战果时,当然要敢于连续作战,不放过夺取更大胜利的机会。但在许多情况下,利害相杂,表面的有利因素背后隐藏着实质上的不利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果断而迅速地结束作战行动才是上策。如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清川江以北敌军主力在遭志愿军突然而猛烈的打击败退到江南后,志愿军面临着的是渡江继续进攻还是停止进攻结束战役的选择。彭德怀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分析认为:其一,我军已取得部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达到了制止敌人进攻,初步稳定战局的战略目的;其二敌已在新安州至价川一线占领了沿江阵地,我已失去在此歼敌的机会;其三,我军所携带的粮食弹药消耗将尽,作战持续时间已达到了最大限度,如再渡江继续进攻,就将陷入被动;其四,这次战役歼敌主力不多,我军实力尚未完全暴露,尚有诱敌深入以利歼敌可能。因此果断地结束了战役,从而保持了战场的主动权,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进展不利的情况下切忌蛮干,坚决执行“打不赢就跑”的方针。1947年4月6日(即青化砭战役十天)后,彭德怀部署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永坪地区伏击刘戡的第二十九军,由于敌行动速度较快,且途经永坪时迅速占领阵地,一时难以将其吃掉,只消灭了敌600余人,彭德怀就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避免敌人“咬住”我主力决战。

在实现了对敌围歼的情况下亦要尽快撤离战场,防敌火

力报复。当对手具有强大的火力优势和制空权时,其空军和远程火炮在我与之近战,双方部队混战在一起时,因顾忌自己部队的安全,在救援时往往会有劲使不上。但当其得知被围部队被歼之后,则会尽全力进行火力报复,以杀伤我有生力量,并摧毁其被我缴获的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因此,在部队没有撤到安全地带之前,还不能算全胜。但在此时,由于剧烈作战行动部队已十分疲劳,胜利后容易松劲。而思想上的懈怠和行动上的迟缓,可能造成遭敌火力杀伤的巨大损失,甚至有可能使到手的胜利得而复失。因此,指挥员必须组织部队快速打扫战场、快速抢运战利品、快速撤离战场。同时也只有快速转移和机动部队,才能使敌对我军兵力机动的方向和下一步的作战行动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使我军在后续作战行动中保持主动。

### 五、“追击是消灭溃退之敌 最好、最便宜的手段”

追击是对退却之敌实施的作战,是进攻的继续。对败退之敌实施快速、勇猛和不停顿的追击,可使敌人不能实施有效的抵抗而被歼于运动之中。彭德怀在《关于几个战术问题》一文中,对运动战中“追击战”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我军传统的战斗作风是‘猛打’、‘猛冲’、‘猛追’,不给败溃之敌以收容整顿机会。追击是消灭溃退之敌的最好、最便宜的手段,问题是如何追击,在追击过程中有些什么问题,这是值得注意的。”<sup>①</sup>在这里他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

#### (一)高级首长靠前指挥

彭德怀指出:“敌由战场败退是恐慌混乱的,我追击愈猛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页。

此种现象愈严重。此时,敌最无战斗力。我击败敌人后发起追击时,由横宽的战斗队形,再变为追击的纵队或并列纵队,开始时是不免会有混乱。但我军与败退之敌基本上是不同的,我气势甚壮,敌则相反。问题是在如何迅速调整缩短混乱时间,这只有高级首长赶至最前面,迅速调整和区分追击部队。在直属上级未到前,应即向就近间接上级请示,并接受间接上级的指挥。在直接、间接上级均未到以前,同级指挥员应由资深者立即区分追击部署,继续追击,并一面报告上级。如同级无资深者,即按以先到的同级指挥员执行上述办法,以便迅速整顿混乱和调整部署,继续追击之。”<sup>①</sup>

### (二)跟踪追击和平行追击相结合

追击的路线和方向,对于追击战的战果有着极大的影响。彭德怀强调,“在追击中不仅要跟踪追击,更要注意平行追击和绕至敌侧后截断敌退路”<sup>②</sup>。跟踪追击即紧随退却敌军之后的追击,它可使敌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失去机动自由,降低退却速度,迫使敌人在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应战。但这种方法将遇到敌有组织的抵抗,追击部队所歼击的一般是敌军的后卫梯队,不易达成歼灭战。平行追击亦称“超越追击”,即沿退却之敌平行的道路、方向进行的追击,从敌一翼或两翼,取捷径猛插退却之敌侧翼或前方,抢占敌必经的隘路、桥梁、渡口与要点,切断敌退路,将敌分割包围,与正面追击部队围歼逃敌。因此,跟踪追击与平行追击相结合,才有利于围歼敌人。

### (三)追击成功的关键是积极主动、快速勇猛

追击是进攻作战的继续,但它又是一种作战样式和军队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页。

的转换。在进攻作战中,作战计划通常应作出对败退之敌的追击行动方案,当发现敌人开始退却时,则应不等上级的命令,主动将进攻行动转入追击行动。如请示待命,必然延误战机。攻击时的战斗队形转变为追击的战斗队形,一线的指挥员应特别注意敌战场情况的变化,一旦觉察敌人有逃跑迹象,即向部队发出准备追击的命令,从而使部队尽快由攻击转入追击。彭德怀指出:“在追击时,应以迅速手段歼灭、攻击溃敌之掩护部队,以免延误继续追击的时机,使敌主力无法逃脱。在追击敌人时,要克服困难,要不怕疲劳。要知道败退之敌更困难更疲劳。但追击中遇到敌人强大预备队时,或改为有计划撤退,主力已占领预定阵地时,我即应以追击的先头部队占领阵地,掩护主力展开,转变为阵地攻击。在最前面的指挥者掌握这火候是重要的,否则,以追击姿态投入阵地,攻击不仅难于取胜,且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危险,这是值得注意的。追击部队最好以主力军担任,通常以坦克、牵引炮兵和部分工兵加强之。”<sup>①</sup>

#### (四)在敌我机动能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只做相机追击

彭德怀认为对败退之敌要实行坚决的追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追击规模包括追击部队的编成、追击的距离远近、持续时间长短等却要根据敌退却时的态势、敌我双方的作战能力特别是机动能力和地形条件而定。战役指挥员必须审时度势,把握好追击的“度”。既要不放过任何可以通过追击而获得胜利的机会,对已失去有组织抵抗之敌敢于穷追不舍,又要量力而行,避免劳而无功乃至陷入被动的过度的追击行动。追击能否获得较大战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427页。

战双方机动速度,而部队的机动速度又主要决定于机动形式。如地面追击中,徒步与摩托化、机械化的机动力是难以抗衡的。一般情况下,当敌我双方机动形式相同或近似时,进行大规模的追击较易获得大的战果,如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军败退时,我军均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役追击,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在敌我技术装备相差悬殊时,则只能进行相应追击。如在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彭德怀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出发提出并坚持了这一作战指导原则。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战争有着许多不同的新情况。一方面,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志愿军的两条腿难以追上“联合国军”的机械和摩托化,即便追上也难以将其歼灭,而自身徒增疲劳,并且追击过远,在遇敌反扑时易陷被动。彭德怀指出:“在朝鲜战场敌有大量飞机、坦克和美英军的机械化部队,而我军无飞机和战车配合作战,只靠徒步追击实有困难,追击效果亦不大。”<sup>①</sup>另一方面,朝鲜战场南北狭长,三面环海,志愿军追击越远,侧后越加暴露,侧后的安全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加之志愿军后勤能力弱,追击越远,补给越加困难。因此,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未实行大规模的深远追击,而只是进行了相应的追击,适时决定战役的进止,第一次战役,当追至清川江时,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追击,果断结束战役;第二次战役追至“三八线”时,彭德怀又命令部队结束追击,转入新的战役准备;第三战役将敌追至“三七线”附近时,即停止了追击。在第四、第五次战役中,亦只作了相机的追击。从而较好地掌握了战略、战役上的主动权。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

## 第四章 堂堂之阵非堂堂

### ——阵地攻防的要诀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岳飞

阵地战是军队在相对固定战线上，进行阵地攻防的作战形式。它是一种典型的正规战，因此有人称之为“堂堂之阵”。在人类战争史上，它作为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作战形式之一，受到历代战争指导者的高度重视，形成了许多“规范”式的作战指导原则。

由于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装备技术相差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作为大量歼灭敌人、用以解决战争命运的作战形式是运动战，阵地战多为运动战创造条件的辅助作战形式。只是到了解放战争的后期，阵地战才成为歼灭敌人和夺取大中城市的重要手段。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略防御阶段，阵地战则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主要作战形式。彭德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战争经历最为丰富者之一，对阵地战的作战指导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性。他既善于从兵家熟知的阵地战的“规范”和原则中吸取精华，又敢于突破习惯的思维定式，创造了许多新的战法。本章前三个问题探讨彭德怀关于阵地进攻作战战略战术思想，后三个问题探讨其阵地防御作战思想。



## 一、隐蔽接敌 攻其不备

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不意和无备是夺取作战主动权的重要手段。彭德怀认为,在阵地进攻作战中,隐蔽接敌,攻其不备,同样是较为容易突破敌之防御的有效之着。这就要求在战前隐蔽作战企图和部队行踪,在敌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接近敌人阵地,以超常的战斗行动实施突然猛烈的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破坏其心理平衡、动摇其战斗意志、打乱其防御体系,以削弱和限制敌防御工事和武器装备的效能。使我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 (一)出敌不意地选择作战目标

在战争进程中,敌我双方都会对对方的行动企图有基本的估计和判断,都会在对方可能进攻的重点方向、地区或部位加强力量,充分准备,而这又势必影响其他方向的作战力量和准备工作。因而,彭德怀认为,在对敌防御阵地的进攻作战中,要达成作战行动的突然性,首先在于出敌不意地选择作战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切实了解敌之对我行动的判断,反其意而行之,而且要成功地实施战役欺骗,采取各种战役伪装措施,制定各种诈敌计划,组织战役佯动,隐真示假,迷惑和麻痹敌人,使之产生错误的分析判断。如1930年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对岳阳城的进攻,即是这一谋略的成功运用。岳阳原有13个团的重兵防守,而当时刚刚成立的红三军团尚不足1万人,公开把攻击方向指向岳阳,显然是难以攻克的。为此彭德怀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他调动部分部队迅速占领鄂城、金牛,虚张声势,佯攻武昌。鄂城、金牛距武昌百里左右,是长江南岸的重镇,武昌的南大门。我军兵临城下,敌人甚为惊恐,急调岳阳钱大钧部12个团星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夜赶往武汉保卫城池。此时岳阳城内只有正东原旅直属队和一个团守城。彭德怀立即命令攻占鄂城、金牛的部队,以强行军的速度挥师南下,围攻岳阳。从而一举攻克了岳阳城。

### (二)出敌不意地选择或转移主攻方向

在阵地进攻作战中,当敌我双方都预有准备的情况下,隐蔽接敌,出其不意,功夫应主要下在主攻方向的选择上。阵地防御一方,在其防御部署中,包含着对进攻一方主要突击方向的判断。对对手主攻方向的判断错误往往会导致整个防御部署的致命弱点乃至失败。在一般情况下,有利我进攻的地形,都是敌的防御重点。然而,有利和不利总是相对而言的,在敌人防御的重点方向上,有利的进攻地形将变为不利,而在易守难攻的方向,敌军往往兵力相对薄弱,而作战指挥上及作战心理注意力亦不在此,难攻之点反而变得相对好打,在这种情况下,将主攻方向选在敌意想不到的部位,往往可以一举突破敌军阵地。在对敌人较宽防御正面的攻击中,也可根据战役发展的态势,隐蔽而迅速地将主攻方向转移到敌之新出现的薄弱部位上,以达到攻其不备的目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县里围歼战,就是彭德怀精心谋划和指挥的以转移主攻方向而达成作战胜利的典型战例。

志愿军于1951年4月22日发起的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主攻方向是西线。志愿军集中了九个军和人民军的一个军团于西线汶山至春川段实施主要突击,战至28日,“联合国军”主力撤至汉江、昭阳一线构成新的防线,整个战线呈由西南向东北倾的态势,全部由南朝鲜军防御的从麟蹄西南自隐里、富坪里至东海岸襄阳里一线阵地突出出来了。彭德怀当即决定抓住敌人这一弱点,迅速转兵东线,以南朝鲜军为主要歼击目标。为给敌人造成我主攻方向仍在西线

的错觉,他命令“十九兵团(附人民军一军团)于高阳经议府至清平川之宽大正面内寻找两三个目标(每点一个营左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特别是炮火,彻底消灭之,以积极行动牵制住美军主力于西线。”<sup>①</sup>由于第十九兵团在西摆出了一副攻击汉城,渡江南下的态势,使敌人心惊胆寒,美英军部队全力加强了西线汉城和汉江沿线地区的防御。而就在此时,志愿军第九、第三兵团,在第三十九军的掩护下,隐蔽地进入东线春川至兰田里之间的北汉江、昭阳江两岸地区完成展开,在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于5月16日黄昏,突然向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军的防御阵地发动猛烈攻击,由于完全出乎敌军预料,各路迅速突破了敌人阵地。战至19日,将南朝鲜军第三、第九、第五、第七师大部分割歼灭。同时歼灭了美军第二师2个营、法国营大部,共歼敌2.3万余人。

### (三)出敌不意地选择突破口和攻击手段

在阵地进攻作战中,将突破口选在哪里,攻击部队采取何种方式运动到进攻和冲击出发阵地,以何种方式实施突破,不但直接关系到部队的伤亡代价,而且关系到能否迅速在敌阵中打开突破口。为此彭德怀特别强调阵地进攻战要周密侦察、精心准备,讲究战术和技术的密切配合。尽可能地将突破口选在利于我隐蔽接敌的部位上。尽可能地采用敌意想不到的攻击手段。他说:“弹药器材等必须事先有准备。开进、展开、分进的道路,敌阵地工事的强度、火力、兵力配备之诸情况,必须有周密之侦察。根据敌我条件加以客观的研究,决定攻击手段,选择突破口。总之,敌人既已占领阵地且有防御设备,就必须采取阵地进攻的打法。”如果“善于组织火力,不讲究战斗队形,……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隐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蔽接近敌人,单凭勇敢,蜂拥冲锋”就必然造成不应有伤亡,乃至进攻受挫。<sup>①</sup>彭德怀一生打过许多攻坚战,不管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隘口,还是“堡垒林立,固若金汤”的重镇,他总是攻无不克,其要诀之一就是“根据敌我条件加之以客观研究”,出敌不意地“决定攻击手段,选择突破口”。在我军缺少炮兵等重武器攻坚作战中,这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打的沙县县城攻坚战,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次反“围剿”前,红三军团包围了沙县城。县城由敌卢兴邦部2个团把守,装备精良,蒋介石给他们下了死守命令。沙城有又高又厚的城墙,只有四个城门可以出入。敌人凭借高墙堡垒,顽强抵抗。他们欺红三军团无重武器,十分骄狂,在城头挂起了一盏盏汽灯,不断狂呼:“有本事你们飞上来!”许多干部战士为敌人的嚣张气焰所激怒,纷纷请战攻城。可彭德怀认为,硬攻势必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他在前沿察看地形了解敌人的城防工事后,精心地制定了一个挖地道炸城的计划。并亲自目测了距离,严格规定了挖多深及长、宽、高的尺寸。部队很快将地道挖成,将准备好的装满炸药的棺材抬至城墙底下。彭德怀一声令下,随着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的缺口,就在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爆炸吓得魂飞天外的時候,早已做好冲击准备的红三军团官兵飞速从缺口冲进了城内,敌人的两个团全部被歼。

### 二、由小到大,稳扎狠打

在敌人拥有绝对技术装备优势、坚固防御阵地和先进防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

御手段的情况下,如何对敌实施阵地进攻,这是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遇到的新问题。在过去国内战场上,我军的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一般都力争在野战中消灭敌人而避免阵地攻坚。解放战争中虽然也打过一些大阵地攻坚战(如兰州战役),但技术装备的差距较之朝鲜战场要小得多,敌人的防御手段亦比较落后。而在朝鲜战场上,敌我火力和技术装备相差空前悬殊,运动战期间在敌未构筑坚固防御阵地的情况下,志愿军对美军营的单位有野战工事依托的阵地,都难以攻克,因而主要靠在运动中歼击敌人。但在第五次战役后,敌人在“三八线”附近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拥有空、炮、坦相互配合的立体防御手段,我军要想争取主动,大量歼敌,就必须解决阵地进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不断总结全军上下创造的新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对拥有技术装备绝对优势的先进防御手段之敌的阵地进攻战的理论和原则。1951年6月彭德怀在志愿军常委扩大会上作了《关于持久作战方针和今后作战的指导原则》<sup>①</sup>的报告,在论述坚持持久作战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作战的11条指导原则:

1. 有阵地地稳步前进,不要冒进。
2. 不断轮番,各个歼敌。
3. 反复拉锯,逐渐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4. 做好必要的准备再战,不打仓促无准备的仗。
5. 由小敲小打,争取逐渐发展到大打。
6. 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有重点地钳击敌人。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

7. 机动灵活 ,量力而行。
8. 攻防密切结合 ,双管齐下。
9. 战略上的持久战 ,战斗上的速决战。
10.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配合正面作战。
11. 大力开展敌军工作 ,切实做好瓦解美伪军的政治工作。

上述 11 条是整个阵地战阶段作战指导方针。就其阵地进攻战而言 ,其主要之点是 :我军实行阵地进攻作战时 ,要实行由小歼灭战逐步向打大歼灭战的过渡 ,需要依托坚固的阵地同敌人进攻 ,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同时 ,必须集中优势火力 ,并且有效地组织各兵种的协同。

### (一)由打小歼灭战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

歼灭战 ,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方针 ,也是实现战争目的的重要手段。阵地进攻战中同样必须贯彻这一指导方针。然而 ,歼灭战的规模则必须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及战场态势的实际出发。同样数量的兵力兵器 ,对于一定数量的运动中的敌人或立足未稳之敌有可能达成歼灭战 ,而对坚固阵地防御之敌就难以实现。因此 ,由打小歼灭战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 ,这是我军在技术装备严重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实施阵地进攻战的重要指导原则。彭德怀在五次战役结束后 ,当“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附近组成坚固阵地防御时即提出了“量力而行”、“由小敲小打 ,争取逐步发展到大打”的指导原则。在 1951 年秋季和 1952 年秋季志愿军举行的战术性反击时 ,对连排级目标攻击大多能迅速攻占阵地并完成歼敌任务 ,而对营以上阵地的攻击则往往发生困难。因此 ,志愿军更进一步具体确定了“寻找敌之弱点 ,……整排整连消灭敌人”的原则。虽然这种攻击在各个地区都采取以战术动作为

主的作战形式,却是在统一计划下于一定时间内在全线实施,因而在全局上具有战役性质和规模。如1952年秋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9月18日至10月5日实施了第一阶段作战,志愿军的6个军和人民军的2个军团在准备好后,不整齐地向“联合国军”的18个目标反击19次,都按预定作战计划攻克了敌军阵地,共打退敌人排至团规模的反扑160余次。至10月5日,巩固占领阵地6处,其余主动撤离,共歼敌8300余人(其中美军2000余人)。从10月6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开始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这一天,志愿军的7个军,共组织了1个团另13个连又23个排和35个班的兵力,在760门火炮的支援下,在180公里的正面上,同时向“联合国军”防守的23处阵地发起攻击,各突击部队在炮兵部队和坦克部队的配合下,迅速勇猛地突入敌人阵地,先后占领敌人阵地21处,其中除2处阵地因敌人惧怕而先行逃跑外,有16处阵地敌人全部被歼,有3处阵地敌人大部被歼。第二阶段反击原定23日结束转入正常防御,因“联合国军”开始了“金化攻势”,向上甘岭地区志愿军阵地猛攻,为配合上甘岭防御作战,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将战术反击延长至月底。23日以后志愿军一线各军又先后攻击了14个目标,除3个目标未克,1个目标守敌撤退外,其余均全歼守敌。31日,志愿军结束了第二阶段战术反击作战,共巩固占领阵地11个,歼敌1.89万余人。由于此次反击是统一计划,同一时间在宽大正面上组织实施的,使“联合国军”顾此失彼,全线告急。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法,达到了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我军则越战越强,积累了对敌坚固阵地进攻的作战经验,进一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1953年夏季反击战开始后,随着我军军力的增强和攻坚能力的提高,逐步实现由小到大的过渡。第一阶段(5月13

日至25日)对“联合国军”20个连以下目标攻击29次,除1个阵地未克外,其余均按预定计划攻克并歼守敌4100余人。第二阶段(5月27日至6月15日)对敌营团一级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攻击目标共51个,其中团的阵地3处,营的阵地9处,在64次攻击中除4次未克或敌人撤退外,60次均获成功,全部或大部歼灭守敌,共计歼敌4.1万余人。第三阶段金城反击战(7月13日至27日)则集中了5个军兵力对敌四个师的坚固防御阵地发起总攻,取得了歼敌大部并攻占敌防御阵地的胜利,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攻占金城以南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成为我军兵团(集团军)规模的阵地进攻作战最成功的范例。

### (二)依托坚固阵地向敌进攻

对敌阵地的进攻,我军本身亦必须有坚固的阵地作依托,这是彭德怀在对拥有现代化装备之敌实施进攻作战中所得出的又一个结论。通常,进攻一方拥有较大兵力特别是在优势火力的情况下,只需在进攻出发阵地构筑一般的野战工事即可,但在敌拥有大规模杀伤兵器、而我又无法与之抗衡的情况下,我之野战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在敌阵地前集结兵力都非常困难。1951年,毛泽东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办法后,彭德怀当时就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但需要有一过渡办法,使阵地稳固起来。站不稳脚就无法去敲别人。”<sup>①</sup>从这年秋天起,志愿军在前沿普遍修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阵地,并在后方建成了网状运输线,从而为我军的阵地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我军在发起进攻前,一般都利用前沿坑道和屯兵洞隐蔽地集结兵力和机动地调集火炮,出敌不意地发起攻击。如在1953年夏的反击战中,我攻击时利用前

<sup>①</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沿坑道和夜暗,隐蔽地接近敌前沿挖修屯兵洞,有的屯兵洞距敌前沿仅80米,部队提前进入这些工事隐蔽潜伏,战斗发起后即能迅速突入敌阵。这样,在敌拥有大规模杀伤手段的情况下,我军仍能以较小的损失完成攻击任务。

### (三)集中优势兵力的同时达成火力上的优势

彭德怀认为,在阵地进攻作战中,火力战是歼灭敌人最主要的手段,“在攻击区域内,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火力,向预定攻击线猛烈突破缺口,达到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之目的”<sup>①</sup>。强调“要精密地组织火力,使所有火器同时发挥作用”<sup>②</sup>。在对拥有现代化生武器装备之敌的阵地进攻中,仅仅形成兵力上的优势是不够的,只有同时也达成火力上的优势,才能较有把握克敌制胜。

抗美援朝战争进入阵地战阶段之后,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有了较大的改善,尤其是炮兵得到了加强。虽然同敌军相比,在质量和数量上仍处于劣势,但通过适时的机动,却可以在某一地段或某一点上形成局部的火炮优势。因此彭德怀要求部队在战术性阵地进攻作战中,注意尽可能集中战役集团拥有的火炮,加强和支援阵地进攻部(分)队的作战,以达成火力优势。实践证明,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一般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如在1953年夏季的反击作战中,进攻敌团的阵地,集中火炮250-400门,火力密度每公顷面积平均落炮弹200~400发,有的达800发。在金城战役中,志愿军司令部给二十兵团加强火箭炮兵、高射炮兵各1个团,榴弹炮兵1个团另1个营,反坦克炮兵3个连,工兵4个营。加强后的金城正面5个军,共有八二迫击炮以上的火炮1094门,平均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8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每公里 44.8 门,还有坦克 20 辆。当面之敌南朝鲜军与志愿军兵力对比为 1:1.3,火炮对比为 1:1.7。7 月 30 日夜,志愿军出敌预料,突然发起攻击,1000 余门火炮一齐向敌阵地猛烈袭击,经过 7~28 分钟的炮火准备,共发射炮弹 1900 吨,各作战集团的主要突破地段平均每公顷落炮弹 250~400 发,破坏敌地面工事平均达 30% 以上。在开辟通路的地段,破坏障碍物达 80~90%。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步兵的顺利突破。在火炮准备之后,各作战集团同时向南朝鲜军展开了猛烈突击,1 小时内即全部突破其前沿阵地。

#### (四)有效地组织各兵种的协同作战

彭德怀指出:“在现代战争中,任何一个兵种都不能单独解决战略、战役任务,任何一个兵种也不能代替另一个兵种,这就使得诸兵种的协同动作,成为现代战争中最最重要的问题。”<sup>①</sup>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军基本是单一的步兵,在各种形式包括阵地进攻作战中,协同比较简单。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才刚刚开始以新组建的炮兵、坦克兵等专业技术兵种配合步兵进行攻坚作战,协同作战水平还很低。即使在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我军的专业兵种也比较少,炮兵的机动能力又差,因而未能与步兵很好协同,造成我军支援火力不足。进入阵地战阶段后,我军的装备日益改善,炮兵、工兵都大大加强,装甲兵也开始参战,依托既设阵地作战行动也日趋复杂,从而也要求组织有效的协同作战。因此,彭德怀将成功地组织各兵种的协同,作为取得阵地进攻作战胜利不可缺少的条件加以强调。他在《关于几个战术问题》一文中指出:“战场观察、射击指挥和通讯联络这三项工作好坏,是直接影响战斗胜负的”。如在谈到步炮协同的重要性时说:“不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30 页。

善于组织火力的指战员,单凭步兵突击与高度技术装备的敌人进行战斗,欲取得战斗的胜利是困难的。”他批评有的部队对“如何组织火力,测量距离,炮火目标观察,弹着点修正偏差,严格执行射击纪律等,常执行得不具体或不重视。特别不注意将自己观察的所得情况,及时通知炮兵”。指出:“火战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须具备良好的射击技术、良好的射击指挥和良好的射击纪律,只有组织好各项火器,才能充分发挥效能,适合战术要求。”<sup>①</sup>1951年11月,志愿军对马良山、正洞西山等地的反击战,首次成功地实施了步、炮、坦、工兵和高射炮兵的协同作战。以后,我军的协同作战水平不断提高,在1953年的金城反击战时,成功地组织了兵团规模的协同作战。实践证明,对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实施进攻战,必须在统一指挥下使各兵种达成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克敌制胜。

### 三、决战攻坚,务求全歼

在阵地进攻作战中,最为难打的是带决战性质的攻坚战,因为它所进攻的目标一般都是敌人的重兵集团且有完整防御体系和坚固防御工事,它的成败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彭德怀认为,进行决战性质的攻坚战,其着眼点必须是只能成功,务求全歼。带有决战性质的阵地攻坚战,在我军历史上为数不多,解放战争中彭德怀指挥兰州战役是较为典型的一个。充分体现了彭德怀攻坚作战的指挥艺术。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428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 (一)着眼战略全局,敢于攻坚决战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由于我军一直依靠落后的装备与强敌作战,因此,一般避免进行城市攻坚性质的决战,而争取以运动战来与敌作决战性较量。但当战争进程发展到以攻坚战的形式与敌决战对战略全局更为有利时,即要毫不犹豫地定下攻坚决战的决心。

1949年7月扶眉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基本被歼,残部退守秦岭,青宁“二马”西撤至平凉地区。胡马联盟被粉碎,彭德怀决定抓住二马孤立的有利时机,歼击二马。二马原想在平凉合力阻止我军西进,但由于它们各自都想保存实力,其“平凉会战”计划流产。分向兰州、宁夏退却。

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交通枢纽,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彭德怀分析,敌人必定死守兰州。在兰州与青马决战,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但拖住青马在兰州决战对我军有利。西安解放之后,解放西北这个第二大城市和反共中心,就基本上解决了西北问题。如果让青马跑回他的老窝青海,那里是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短缺,就将增加我军作战的困难,势必延长解放大西北的时间。他阐述进军西北作战的作战方针时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它消灭的时候了。”<sup>①</sup>

正如彭德怀所料,青马确实把兰州看做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周密地研究对策,部署兵力,以其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军即第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5万多人据守城区;另以第九十一军、一二〇军等3个军3万余人为左翼,于兰州东北的靖远、景泰及打拉池地区布防,相机侧击西北野战军,以新组成的骑兵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军2万多人,控制临洮、洮沙地区,以保障右翼安全。青马企图依托兰州坚固工事正面抗击,由宁马、胡宗南军两翼包抄,歼灭西北野战军于兰州城下。青马之所以敢在兰州与野战军决战,还因为其自信兰州固若金汤。兰州北有黄河天险、白塔山作依托,南有险峻的南山作屏障。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就修筑了坚固的工事,青马又不断构筑加固。主阵地修有钢筋水泥碉堡,形成碉堡群,通向城里的各主要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联。外面有环形人工削壁1~2道,高6~10米,削壁腰部有暗藏的侧射机枪火力点,削壁外有一两层3~6米深的外壕,各壕之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还设有大量的地雷和铁丝网。其凭借坚固工事,既利于发挥火力,又便于组织反扑。敌兰州总指挥马继援宣称: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对兰州攻坚作战的艰巨性和可能付出的牺牲代价,彭德怀亦有足够的认识。但他更认为从战略全局出发,利大于弊,决心发动兰州战役。8月4日上午,他向第一、二、十八、十九兵团,发布了进军兰州、歼击青马的命令。8月20日,攻城部队进抵兰州城郊,包围了兰州。

#### (二)前后夹击,侧翼包抄

在阵地攻坚作战中,夹击与包抄是达成歼灭战的重要手段。一般情况下,单纯的正面攻击,对敌防御体系构不成根本上的动摇和威胁,敌可以按其防御部署组织有效的抵抗。我即便是能突破敌之防线,敌亦可组织有序的撤退,我只能达到击退敌人占领地方的目的,而难以达成歼灭战,因此,夹击和包抄是历代兵家推崇的作战手段。“兵家夹击,欲分其势也。彼势既分,其阵自弱。御前则后不支,御左则右不支,无所不御则无所不能支,所以胜也”<sup>①</sup>。因此彭德怀主张在阵

<sup>①</sup> 《草庐经略》卷十一,《夹击》。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地进攻作战中,应尽可能地采用前后夹击,侧翼包抄的作战部署。根据不同的敌情和地形,其具体部署或侧后迫胁、正面突击;或正面佯攻、侧后突破;或侧翼钳制,前后对攻。彭德怀所指挥的许多著名的攻坚战,如土地革命时期我军惟一次攻克省城的战役——1930年红三军团进攻长沙战役,长征路上攻克黔北军事要隘娄山关的战斗,第二次遵义战役等,均是采用前后夹击,侧翼包抄的攻击部署而得手的。彭德怀认为,带有决战性质的攻坚作战,欲达毕其功于一役,更是必须采取前后夹击、侧翼包抄的部署。而且这种部署,既要体现在战略上,又要体现在战术上。据此,在兰州战役中,彭德怀作出了周密计划,其整个战役总的部署是:

以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附一兵团第七军,在西安天水一线钳制胡宗南的残部;

以十九兵团之六十四军在海原、固原地区,钳制马鸿逵军;

以第一兵团附六十二军向临夏、西宁挺进,切断兰州之敌退路;

以主力第二兵团和十九兵团合围兰州。

其具体攻城部署亦形成了东、西、南三面包围。并部署一个军从西南过河,以从北面侧后攻击堵敌退路。

这一作战部署在战役进程中充分显示了它的正确性。战役发起后,胡宗南部和马鸿逵部受到钳制,不能按照他们战前所计划的那样向兰州驰援。特别是在兰州鏖战之际,西北野战军左路一兵团解放了临夏。马步芳深感后方空虚,老巢危急,不得不从兰州分兵回西宁,并急电国民党政府,火速分催陕署和宁夏友军行动。并叮嘱其子马继援,如马鸿逵、

胡宗南部及空军再也不来援,即从兰州撤守青海。但慑于彭德怀的部署,一个援兵也没有来,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青马坚守兰州的信心与士气,对我军更快攻克兰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三)先行试攻,投石问路

对敌坚固阵地的进攻作战,要取得胜利,不但在于总的作战部署得当,而且在于担任攻坚任务的部队具体进攻部署及战术技术准备充分。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本部队当面之敌工事设防包括每个火力点的位置都确切的了解。但在战斗发起之前,我军的侦察只能作出大致的判断。彭德怀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是有的,这就在正式发起总攻之前,先进行带有侦察和摸索经验性的试攻。

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抵达兰州外围后,即对外围阵地进行试攻。由于在前阶段追击作战中的顺利进军,部队中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了轻敌思想,准备不足,在外围攻打了一天,未夺得一个阵地,双方均有不小伤亡。为此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攻击。要求各兵团认真总结试攻经验,深入动员,克服轻敌思想;发扬军事民主,研究进攻战术,反复夜摸道路,挖壕接近敌人阵地。试攻受挫,部队震动不小。彭德怀分析说:“部队试攻虽然受阻,但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要教育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经过试攻后三天的再准备,于8月25日拂晓对兰州发起总攻,敌人的坚固阵地一个个被突破,使战役按照预期的进程得以发展。

#### (四)倾力于“制高点”与“致命点”

一个坚固阵地的防御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支援的要点组成的。但每个阵地在全局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只有找准

其中最要害的部位并倾其全力攻击之,方能迅速瓦解其防御体系并达成全歼。彭德怀认为,一般情况下,只有攻占敌借以阻击我军重要屏障(通常是敌阵中的“制高点”),才能掌握打开防御体系之门的“钥匙”,全歼敌人的致命点则是敌之退逃必经之点。战略和战役指导者必须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两点上,并以此来分配兵力。

在兰州战役中,彭德怀分析敌人的布防后看到,敌人主力在南山,敌东西两翼虽兵力不强,但两侧都是悬崖绝壁,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北面黄河铁桥是敌人惟一的退路。因此认为,攻占南山是攻打兰州的重点,而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并以此部署兵力。集中5个军由南向北进攻敌之南山主阵地,同时由一个军进攻西关,全力夺取铁桥。这样,一方面,在我绝对优势兵力的猛攻下,敌之南山核心阵地和各制高点在总攻的当日下午即被我所攻占,兰州的全部“钥匙”已掌握在野战军的手中。当敌人看到防御被突破,决定撤离兰州时,担任夺取黄河大桥的第三军于26日凌晨攻占西关,抢占了黄河铁桥,堵死了敌人的惟一退路。经过激烈巷战,野战军于当日中午肃清了城内残敌,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兰州全部解放。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西北战场上最后的一次大战役胜利结束。宁马主力基本被歼灭。

由于取得了这次决战的胜利,分割了西北国民党军各部的联系。剩下的仗就基本上是“走路问题”。彭德怀命令野战军猛追穷寇,左路直取西宁,右路夺取宁夏,中路进军永登,沿河西走廊逐次解放武威、张掖、酒泉,然后进军新疆。9月5日,一兵团解放西宁,马步芳等逃往香港,青马集团被彻底解决。至9月下旬,宁夏的马鸿逵集团亦被消灭。可见,攻坚兰州与敌决战的决策对战略全局的作用之大。



#### 四、阵地防御“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

建立完整的防御体系,使整个防御阵地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抗击敌人进攻的物质基础。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彭德怀即指出:“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sup>①</sup>此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又依据我之阵地防御作战的规模和作战对象特点,对阵地防御体系提出一系列深刻的见解。

##### (一)纵深配置兵力,组成完整防御体系

彭德怀认为,在现代条件下,武器的杀伤力和突击力不断增强,线性阵地防御体系和防御兵力配备是经受不住敌人的攻击的,防御阵地必须有相当的纵深。也就是说,针对现代进攻之敌的作战,防御部队须组成全纵深、全方位、有重点的稳固而积极的防御体系。基本要求是:实行纵深、立体、防反结合的兵力部署,控制机动力量,构成以营防御为基础的防御纵深、环形的防御体系,并适应于反冲击、反突击和伏击的行动要求,组成全纵深、全方位、有重点的火力配系,既能有效地突击敌之进攻目标,又能为我之进攻行动机动火力;设置针对敌不同目标的障碍,同时又不能妨碍自己的兵力兵器机动,组织全面的保障和防护。总之要既利于坚守,又利于反击等攻势行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要求志愿军担任坚守防御部队的防御纵深一般为,师7-9公里、团4-6公里、营2-2.5公里、连0.5-1公里。在整个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的战线上,形成了具有20-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成为最后赢得战争的基础。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 (二)火力配系坚持“分散配置、火力集中”原则

火力在阵地防御作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是杀伤敌人的主要手段,也是压制敌人火力使自己阵地少受敌人打击的惟一途径。当然自身也是敌人火力打击的重点目标。而火力在作战发挥作用的大小及损失轻重,不仅取决于火器本身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取决于它的配系部署是否得当。即是否将各种火器按性能、任务作适当的配置与分工而构成有组织的火力体系。彭德怀强调,阵地防御中“尤须严密组织与发挥炮火的威力,予进犯之敌以大量杀伤”<sup>①</sup>。火力配系应“取分散隐蔽、火力集中为原则”,“火器配备必须分散隐蔽,阵地必须多准备、多变换,火力必须集中”<sup>②</sup>。通常以炮兵、防空火力为骨干,统一规划各种火力,从远接敌地域、空域开始,到防御后方,组成全方位、全纵深、立体而有重点的多层火网,抗击敌人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攻击。如地面火力配系,一般由防步兵火力配系和反坦克火力配系组成,按照火力的密度由远至近越近越大,远、中、近结合,曲直结合,明暗结合,正射、侧射、反射结合,以打坦克为主的原则配置。基本要求是集中火力于主要防御方向,充分发挥各种火器的威力,协调一致地打击主要目标;火器疏开、隐蔽配置,适时实施火力机动,能对变化的情况作出快速的火力反应。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阵地防御作战中,尽管我之重兵器远不如敌军,但由于配置合理,特别在作战过程中能机动调集和集中火力,从而超常地发挥其威力,在有计划有准备的反击作战中,达到了在主要作战方向和目标上形成压倒敌人的火力优势。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 (三)“少摆多屯,前轻后重”

在与拥有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阵地防御作战中,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敌人的火力杀伤,同时又必须有足够的兵力以击退敌人的进攻。彭德怀的对策是少摆多屯,前轻后重。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志愿军依托野战工事进行防御作战时彭德怀就强调:“在阻击兵力配备上,应采取前轻后重,尽量多控制机动力量。”<sup>①</sup>“各担任机动防御、阻敌进犯的部队,必须确实掌握前轻后重、纵深配备的原则,特别加强工事,以减少自己的伤亡”<sup>②</sup>。当志愿军进入坑道防御作战阶段后,他进一步提出了“少摆多屯”的兵力配备方针。依据这一方针,志愿军将大部分人员都隐蔽于坑道防御工事之内,表面阵地只“摆”少量人员甚至在敌炮火最猛烈时表面阵地不留人员,全部退守坑道,从而大大减少了伤亡,保持了阵地稳定。

## 五、依托坚固的工事抗击敌人

进行阵地防御作战,首先必须有坚固的阵地作依托。特别是现代条件下大规模杀伤兵器的发展,对防御工事结构形式和坚固程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彭德怀在指挥作战的实践中,注意根据不同时期敌之装备和进攻手段的特点,研究探索既能有效防敌杀伤以保存自己,又便于发扬火力打击敌人的阵地防御手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阵地防御作战的奇观——被称之为“地下万里长城”的坑道防御战。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8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 (一)野战工事“应避免线式的”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彭德怀在论述防御阵地时就指出:“工事的本身,应避免线式的。因为线式的工事,目标大,火力不易交叉,防御多不易巩固。工事的构筑应采用圆周形或马蹄形,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互相交叉、互相支援。各个工事本身要能独立,纵深要大,正面求小。这样配备,既可节约兵力,减少牺牲,又不易被敌人突破。且因我正面窄小,易引起敌人向我侧翼包围,容易暴露敌人侧翼。又因我工事是圆周形,敌人即包抄到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因之而恐慌。”<sup>①</sup>

在入朝作战前他在谈到阵地防御指出:“关于阵地战,应采取纵深配备,每班为三四个小组,每小群堡垒挖成梅花形的,距离以二三十米为宜,构成火网,互相交叉支援。这种工事在敌人轰炸与炮击时,可以减少伤亡。并可有意识地做些伪工事,吸引敌人火力,消耗敌之炮弹。敌人坦克前进时,可使用爆炸手段,多做隐蔽工事,待敌人接近时,突然出击,进行近战,可以歼灭敌人。炮兵亦应构筑隐蔽工事,不要使之暴露目标。”<sup>②</sup>在志愿军依托野战工事防御作战阶段,均按照这一要求进行阵地构筑,在阻击敌人和稳定阵地上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 (二)依托坑道实现坚守防御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1951年5月,敌我双方经过5次战役较量,双方沿“三八线”形成了阵地对峙局面。1951年下半年,我军依靠野战工事进行防御,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其基本原因是:在敌炮兵、航空兵、坦克兵密集火力的猛烈轰击下,我军依托野战工事作战,很难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做到有效保存有生力量。

在此期间,志愿军士兵在实战中创造了加深的、拐弯的防炮洞(亦称猫耳洞),并逐步发展成为马蹄形的小坑道。这是坑道工事的雏形,这种初级坑道的出现即对我保存有生力量、巩固阵地起到了明显作用,引起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彭德怀认为在敌人飞机火炮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坑道工事是保存自己杀伤敌人的最好措施,指示志司在全军推广。1951年冬,我军在朝鲜前线掀起了修筑坑道的高潮。彭德怀还根据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地道战的经验,指示各军设法解决坑道通风、伪装、防毒、防炸、防淹、防困等问题。1952年4月26日至5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召开了第一线兵团及军参谋长会议,总结交流构筑坑道工事的经验,确立了坑道工事必须是一个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并统一了工事规格标准。要求坑道顶部一般厚度在30米以上,坑道出口顶部的厚度10—15米,能承受重磅炸弹的轰炸;每条坑道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出口,坑道内幅宽1.2米,高1.7米;第一线的坑道与野战工事——堑壕、交通壕、反坦克壕、各种火器掩体相配套。

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志愿军的阵地防御作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解决了在敌人强大火力下保存有生力量的问题,大大提高了防御的稳定性。4月间,“联合国军”以小部队向志愿军攻击60余次,志愿军阵地无一丢失,在五六月间防御作战中,坑道工事经受了较大的战斗考验,我三十九军在190.8高地防御作战中,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8昼夜,大量杀伤了敌人,巩固了阵地。在10月至11月间的上甘岭战役中,3.7平方公里2个连的狭小阵地上,敌军先后投入兵力6万余人,我军投入了4万兵力,我军依托总长度为769米的2条连坑道、3条排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坑道、和 18 条班坑道 ,与敌反复争夺 43 天 ,共歼敌 2.5 万余人 ,我军伤亡 1.1 万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巩固了阵地 ,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对于坑道阵地防御 ,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能不能守 ,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 ,办法是钻洞子。……吃的问题 ,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 ,很久不能解决。当时不晓得挖洞子 ,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的粮食 ,都有仓库 ,还有礼堂 ,生活很好。”<sup>①</sup>

彭德怀在指挥志愿军依托坑道实行防御作战的过程中 ,还形成了一整套坑道战的战术思想和独特的战术方法。主要是 ,构筑阵地时要将保存力量的坑道和打击敌人的野战工事紧密结合 ,在敌人以猛烈的炮火进行袭击时 ,多数守备人员进入坑道隐蔽 ,待敌人接近时 ,再以少而精的兵力逐次跃出实施短促的反击。在敌人火力过于猛烈 ,我军表面阵地无法立足时 ,防守部队也可以暂时全部进入坑道 ,坚持坑道战斗 ,然后和纵深部队相配合实行反击尽快恢复表面阵地。在依托坑道隐蔽或退守坑道时 ,基本手段又是积极的战斗活动 ,以此粉碎敌人对坑道的攻击和破坏。志愿军采取了这种防御战术后 ,迫使敌人在整个战线上 ,只能实施重点进攻 ,无法进行宽正面突破 ,我方则可以在敌人重点进攻的前沿吸引敌众多的兵力、兵器 ,使每一阵地的防御战都成为消耗敌人的“无底洞”。在朝鲜战场上 ,坑道阵地的出现和坑道战术的完善 ,标志着我军防御作战水平大幅度提高和阵地防御战术思想的成熟。我军有了坚固的阵地作依托 ,还大大节约了第一线的兵力 ,加强了纵深的机动力量 ,使整个防御体系更加完善和巩固。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第 67 页。

### (三) 战略要塞的坚固工事设防是贯彻积极防御方针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肩负着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对敌军事斗争战略指导重任的彭德怀,注意总结朝鲜战场阵地防御作战的经验,设计规划国家战略要塞坚固工事设防。1957年,彭德怀在论述我军积极防御作战方针时指出:“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的时候,我们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在实施这个战略方针的时候,就是要在沿海重要地区构筑坚固的工事……保证我军第一线和纵深的部队能够适时地投入战斗,掩护全国由平时迅速转入战时状态。”<sup>①</sup>为此,彭德怀亲自踏遍了万里边海防,实地勘察战略要塞设防的地形,指导国防前线和战略纵深要点的国防工程建设。并指出:“如果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一天不肯放弃侵略计划,我们的国防工程就要不断地加强和改进。我们坚信,这种国防工程与掌握现代武器的人民军队相结合,任何敌人对我国发动的侵略都不可能达到他们所幻想的目的。”<sup>②</sup>

## 六、防中有攻,以积极手段巩固阵地

彭德怀历来强调,阵地防御必须和积极主动的反击结合,即防中有攻,以积极消灭敌人的手段来达成防御目的。他说:“防御方面为了节约兵力用于进攻方面,以劣势兵力钳制敌人优势兵力……在相等的兵力下造成歼敌的优势。因此担任防御任务的部队,不仅要坚决阻击敌人,还须灵活的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89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58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进行反突击。吸引敌人于自己当面愈多愈好,愈容易使进攻方面奏效,所以我们的防御,无论从一个战役、战斗或战术来说,都是积极防御的动作,而不是消极防御或单纯防御。”<sup>①</sup>

## (一)反复争夺,短促出击

这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阵地对峙的第一阶段彭德怀采取的防御作战的重要战法。1951年6月中旬以后,交战双方沿着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战线亦随之相对稳定下来。随后交战双方开始了停战谈判。此时,彭德怀即预计到谈判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向部队提出要求,“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绝不能对敌人停战谈判抱有幻想”。他命令一线部队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相应提出:“以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形式,即积极防御与短促出击相结合的作战形式,以大量杀伤敌人,配合谈判。”

8月,“联合国军”在东线对人民军防御阵地发动了“夏季攻势”,西线志愿军根据彭德怀的命令,配合东线人民军作战,对敌第一线阵地开展战术反击,攻占了許多制高点和前沿阵地,改善了中朝联军中部战线平康地区的防御态势。东西线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彭德怀估计敌人还会发动新的进攻,要求各军指战员学会打阵地战。他强调指出:防御中应是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对每一阵地进行反复争夺,用不断的阵地反突击杀伤敌人。在这一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志愿军各部队在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有重点地部署兵力、火力,以坚决阻击和连续冲击,英勇地同敌人战斗,每一个阵地均经过10余次的反复争夺。10月24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第一线各军:“选择敌之弱点,集中绝对优势火力和适当兵力,每次以消灭敌2个连至1个营为目的”,连续打几次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



这种小反击,具体时间自行决定。各部遵照这一指示,自10月30日至11月底,均分别在各自的正面,选择敌人突出、暴露或防守薄弱的营以下单位阵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攻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共歼敌1万余人,攻占敌阵地21处,经过与敌反复争夺,巩固占领了9处。通过这种反复争夺,迫使敌人因伤亡过重而停止进攻。

### (二)冷枪冷炮,狙击袭扰

在阵地对峙中不断袭扰和消耗敌军,也是志愿军为保持阵地稳定而采取的重要战法。进入阵地对峙以后,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志愿军司令部即提出了“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阵地,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歼击运动的暴露的敌人,相机挤占地方”的作战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志愿军指战员把我军在游击战中袭扰疲惫敌人的战法创造性地运用到阵地对峙作战中,广泛开展了小分队出击和狙击活动(当时称冷枪冷炮运动)。部队一方面以阵地前伏击、偷袭、侦察等活动不断袭扰对方,一方面各部都挑选优秀射手和炮手,灵活巧妙地消灭暴露的敌人,并组织游动火炮,实施机动射击,对付运动中的敌坦克和车辆,摧毁敌炮兵阵地。狙击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一线部队仅5-8月份的狙击作战,即歼敌1.3万余人(不含游动火炮阻击效果)。同时,大大恶化了第一线敌军的生存环境,有效地限制了敌人白天在其阵地的活动自由。转入阵地防御之初,敌人白天三五成群地在阵地前晒太阳、打扑克、跳舞。经志愿军开展狙击活动后,白天躲在工事内不敢露头。敌人疲惫沮丧和厌战,对我军前沿阵地的威胁大大减轻。

### (三)控制强大预备队,适时实施反突击

在阵地防御作战中,我对敌人主攻方向、进攻规模和时

机只能作出基本的判断,我之防御部署也只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然而进攻的主动权毕竟是在敌人手中,战场情况出现预计之外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如我之某个防御阵地被突破、发现敌人在运动中转移兵力等。而要对变化了新情况作出正确的处置,手中就必须有可供使用的力量。因此,彭德怀认为,在阵地防御作战中,战役指挥员必须掌握有强大的预备队。他指出:“控制强大的突击队(预备队)于自己纵深侧翼之适当地点,待敌向我包围、暴露其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击。这样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防御本身的任务。”<sup>①</sup>在抗美援朝战争阵地战阶段,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敌人每发起一次新的攻势后,都能进行战术乃至战役规模的反击,并取得胜利,均是与各级都控制着强大的预备队分不开的。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 第五章

### “顺施诱惑而纵其错”

#### ——“让敌人听指挥”的奥秘

大凡逆之愈坚者,不如顺以导瑕。敌欲进,赢柔示弱以至进;敌欲退,散开生以纵其退;敌倚强,远锋固守以观其骄;敌仗威,虚恭图实以俟其惰。致而掩之,纵而擒之,骄而乘之,惰而收之。

——《兵经百篇·顺》

战场上致胜的关键在于调动敌人就我所范。然而在两军对垒中,双方都在力争“致人而不至于人”,采取一厢情愿、强加于人的办法,敌人是不会接受的。高明的军事家常常能做到让敌人听指挥,其奥秘何在呢?彭德怀的“妙诀”是:“顺施诱惑而纵其错”。他指出,要“深察敌人企图,顺施诱惑而纵其错,尽力隐蔽自己的企图,勿为敌察。如此,才能经常保持主动,克敌制胜。”<sup>①</sup>“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顺着敌人的思路,“投其所好”,因势利导,把敌人的行动引向极端,使他犯错误,不知不觉地为我所左右。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

## 一、示弱纵骄，佯北引追

面对骄狂之敌，如何调动其步入我之圈套？古兵法中有“两军对垒，不宜夸其所长，当匿其壮夫肥马，而以羸老弱，见短伏奇，以争一击之利。”彭德怀认为，最管用的招法是“抓住敌人的傲气”，先给点甜头，“养它一养”，然后来个反手把它打下马来。“示弱纵骄，佯北引追”，正是这种“招法”的具体运用。在彭德怀的对手中，败在此招之下的不乏其人，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了。

麦克阿瑟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军的高级统帅立下了赫赫战功，号称是“常胜将军”。二战后任驻日盟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多了一顶“联合国军”司令的头衔，更使他踌躇满志，渴望为自己的战功簿上再记上一个光辉篇章，特别是他制定的仁川登陆作战计划在力排众议而获得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通过并取得了成功之后，更是得意忘形，不可一世。

麦克阿瑟的骄狂，正是彭德怀所希望的。彭德怀还在入朝前与十三兵团司令部研究渡江方案时就指出：“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sup>①</sup>不出彭德怀所料，我志愿军十三兵团4个军和3个炮师共25万人秘密渡过鸭绿江竟不为敌人所察，结果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1.5万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虽然把“联合国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军”和南朝鲜从鸭绿江边打回到清川江以南,但歼灭美军主力不多,没有把麦克阿瑟打痛,因此第一次战役一结束,彭德怀就命令部队后撤隐蔽。美军从空中和地面侦察,在朝鲜境内未找到志愿军的踪影。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自信地说:“他们已离开了朝鲜,……我早就说过,北京无非是虚张声势。”麦克阿瑟判断我只派少数志愿军象征性地出兵,认为中国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百废待兴,无力支持这场战争,断言“战争在两个星期之内会结束”。<sup>①</sup> 随即倾全力发起了“圣诞回国总攻势”。为了阻止志愿军增兵,命令空军“全部出动,以最大力量摧毁鸭绿江上所有的桥梁和沿江一带北朝鲜的城镇和村庄”。与此同时,命令所部从11月6日开始进行试探性进攻。

可就在美军每天出动1000多架次飞机对鸭绿江大桥和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地域进行狂轰滥炸之时,志愿军后续部队第九兵团15万人于11月7日、12日、19日先后巧妙地由辑安、临江秘密渡过鸭绿江,担任东线作战任务。此时志愿军第一线作战部队达9个军30个师约40万人,为“联合国军”一线兵力的1.7倍。

在此种情况下,如何部署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彭德怀在志愿军常委全会上提出了一个“示弱骄敌,佯北引追”,“牵牛进屠场的作战方案”。他分析认为说:“麦克阿瑟虽然遭到第一次战役的打击,但美军主力未受损失,同时他对我军的兵力还不清楚,所以,肯定还会向鸭绿江大举进攻。我军虽然在兵力上占优势,但装备太差,如和敌军死拼硬顶,肯定要吃亏。不如先避其锐气,故意示弱,边打边退,迷惑敌人,诱其深入。我军可以后撤30至50公里以分散敌人,然后在运

<sup>①</sup> 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动中寻机歼敌,这是我军的拿手战术。我们要在清川江畔钓大鱼。”<sup>①</sup>当“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开始试探性进攻后,彭德怀即命令部队按照预定计划,以部分兵力实施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主力转入敌侧翼隐蔽待机。把清川江、德川、戛日岭、杜日岭、球场之间的地区全部让给敌人。

“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一线部队由于有了上一次分兵冒进的教训,开始行动比较谨慎,前进速度缓慢,到15日,总共前进仅9到15公里。为解除敌人的顾虑,16日彭德怀电令各军一律停止向前进之敌反击,以诱敌放胆向我预定战场前进。各军在后撤时沿途丢弃一些枪弹衣物,似已溃不成军。

麦克阿瑟果然中计,判断志愿军是因为“兵力不足、装备低劣而怯战败退”。并认为“空袭战役”已封锁了战场,中共的后续部队已经被阻止,不能进入战场。断言志愿军的兵力“最多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于是命令部队加快前攻步伐。到21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已进至了麦克阿瑟规定的战役展开线。麦克阿瑟十分得意,自信他的“总攻势”就要大功告成了。命令“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于11月24日8时在全线发起总攻势。几乎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在东京发表公报,向全世界宣告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开始了,“联合国军对在北朝鲜作战的赤色军的庞大压缩与包抄行动正在接近它的决定性努力”。他还给联合国安理会写了一份报告,得意宣称:“空军部队已经控制了纵深地区,左翼部队向前推进只遇到软弱无望的抵抗,右翼部队在海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支援下,可以充分发挥其有利地位,当两翼完全汇合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战争的结束。”并对部队广播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页。

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要迅速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

当彭德怀决定志愿军后撤诱敌作战方案刚提出的时候，朝方领导人十分不理解，询问为什么不乘胜向清川江以南追击。在彭德怀的说服和坚持下，双方达成了共识。此时，面对敌军的强大攻势，又有人对志愿军能否顶住飞机、坦克加大炮的敌人表示担忧时，而彭德怀却成竹在胸。他说：“要诱鱼上钩，你必须先给鱼尝点甜头。麦克阿瑟吹嘘说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看这次战役究竟谁把谁吃掉。”<sup>①</sup>为了进一步给敌人造成错觉，彭德怀命令继续以小部队边打边撤。到25日，西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完全进至西起定州，经云山、球场，东至宁远以北一线我之预定战场，“联合国军”翼侧暴露，后方空虚。

11月25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对麦克阿瑟的“圣诞总攻势”发起全线反击。彭德怀指挥各军乘敌立足未稳，分割包抄，断其退路，将敌军几个师压缩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攻势之猛烈，战法之高明，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全线崩溃，陷于欲战无力、欲逃无路的境地。美国人小克莱·布莱尔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11月25日天黑不久，灾难降临了。约20万中国人穿插进沃克的第8集团军与阿尔蒙德的第10军之间的空隙，向第8集团军的右翼——即韩国第2军发起了攻击。韩国部队崩溃了，仓皇逃跑，使中部美国第9军暴露出来。第9军先是收缩，然后坚守，最后与在左边的第1军一起后退。两天后，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年版，第427页。

11月27日在东部战场,另一支中国集团军攻击了第10军——奥利佛·史密斯的第1陆战师,中国军队插到背后,将海军陆战队围困在楚新水库地区……局势很快明朗了,“联合国军”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沃克的第8集团军被这突然的袭击完全打晕了头,很快开始后撤。<sup>①</sup>

此役,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3.6万余人,仅西线就缴获各种火炮500余门、坦克100余辆、汽车2000余台。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自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一带转为防御,使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转危为安。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十分震惊。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说:

“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美联社惊呼:“这是美国建军史上最丢脸的失败。”麦克阿瑟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12月2日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承认:“面临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以往那种成功地用来指导作战的战略思想,现在继续用来对付这样的强国就不行了。”

“示弱纵骄,佯北引追”作为一种诱敌轻兵冒进,以达到在运动中歼敌的谋略手段,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示形”功夫是否到家。彭德怀认为,其要诀有三:

#### (一)严密伪装,隐蔽实力

彭德怀曾深刻指出:“我们应使自己不犯错误,而促使敌

<sup>①</sup> [美]小克莱·布莱尔:《麦克阿瑟》,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页。



人犯错误,最好的方法是隐蔽自己实力,使敌估计不足。”<sup>①</sup>因此在战役的计划和组织中,必须把部队的隐蔽工作摆在首位。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示弱诱敌的成功,首先是因为彭德怀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隐蔽实力的措施。早在志愿军进入朝鲜前,彭德怀就对志愿军出国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向毛主席建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以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sup>②</sup>在第一次战役中,当敌逃至清川江以南后,他果断命令各军停止进攻,结束战役。因此尽管敌人挨了打,却并未摸清志愿军的实力在为第二次战役作准备的行动中,又命令后撤部队进入山林,严密伪装,昼不冒烟,夜不露光,消除各种可疑痕迹。正因为如此,敌人虽在空中和地面运用各种现代化手段进行侦察,竟然没有发现志愿军几十万人马的踪迹。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惊叹:“这在当代战争史上可称为是一件奇迹。”

### (二)假戏真做,“佯败”得法

“佯北引追”的目的,是将敌诱至预设战场,然而,敌人也是有头脑的,他们也在对战场上的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只有当确信自己掌握真实情况之后,才会做出决断。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佯一方所制造的假象是否已达乱真的程度。这就要求“佯败”各种迹象都要合乎一般战场败退的常规,否则就可能被敌人识破天机,反为所乘。彭德怀曾批评有的部队不会假戏真做,“常常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页。

<sup>②</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

这就等于告诉敌人你想干什么。<sup>①</sup>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为了让麦克阿瑟将志愿军的主动后撤视为败退,彭德怀采取了节节抗击,“战”而退之的战术,并适时地举行小的反击,如对于位于价川东北、瞰制平壤至满浦公路的飞虎山,是敌人向球场、江界进攻的必经之路。根据彭德怀的命令,我三十八军一二师自11月6日起在这一地区抗击敌人5昼夜,击退敌人百人以上进攻57次,到10日方撤出战斗。因此,在麦克阿瑟看来,志愿军是经过苦战,实在顶不住了才败退的,丝毫没有发现志愿军诱其深入的蛛丝马迹。

### (三)选派主力迂回敌后,断敌退路

诱敌深入的最终目的是将其歼灭,而要做到这一点,要害在于当敌人进入我之预设战场之后,迅速断其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如果切不断敌人的退路,到了嘴边的肉还可能溜掉。因此,彭德怀在部署和指挥此类战役中,最关注的问题是迂回部队是否能按时插到指定地点,是否能把口子扎紧,抗住敌人的突围与增援。他总是把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和最善打硬仗恶仗的指挥员用于执行迂回任务。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他让在历次战争中屡建奇功,而在上一次战役却动作迟缓没有按时完成阻击任务的三十八军再次执行西线的迂回阻击任务。并派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组成前进指挥所,直接指挥三十八军作战。临行前彭德怀对他说:“我听说三十八军过去在国内战如猛虎,很能打仗,这次我要再考验他们一次,看看他们的战斗作风到底怎么样。……这次阻击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你们沿途遇敌不要恋战,必须不顾一切,直插交通要道三所里,这是我军断敌南逃北援的一道‘闸门’,一定要按规定的时间插到底。”“在占领三所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里和龙源里后,要不惜一切代价,像钢钉一样,狠狠地钉在那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退!”<sup>①</sup>三十八军在韩先楚的直接指挥下,坚决执行彭总的命令,27日夜派一一三师一夜长驱70公里,于28日8时抢占了敌军南逃北援必经交通要道三所里,使几万敌军乱成一团,全线动摇。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和引导下实施突围,一一三师在三所里和龙源里顽强坚持了50多小时,使南突北援之敌,双方相距不到一公里,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无法会合,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 二、“蘑菇”战术 扰敌待机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既避免与敌决战硬拼,以保存实力;又积极主动创造和把握战机,各个歼灭敌人,从而促使敌我力量的转化,这可以说是战争指导艺术中的最高境界所在。解放战争中,彭德怀在陕北战场上以2万之众,迎战胡宗南的20万大军,且武器装备也远远落后于敌军。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连吃败仗,整旅、整师、整军的被歼灭。许多有影响的军队高级将领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那么这个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其因素是多方面的,就其谋略手段而言,最令胡宗南头痛的是彭德怀的蘑菇战术。

胡宗南1947年3月19日占领延安后忘乎所以,认为西野不堪一击。可就在其主力被西野部分兵力引导扑向安塞之时,彭德怀却在青化砭为胡宗南的三十一旅准备了一个“口袋”,3月25日,当自川口、拐峁至青化砭的三十一旅钻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页。

进“口袋”后，西野以排山倒海之势，仅一个多小时，就将三十一旅直属队及九十二团 2900 多人全部歼灭，旅长李纪云被俘。此时距胡宗南占领延安不足一星期，此地离延安只有 50 里。

青化砭一役，给了还沉浸在“大胜利”中的胡宗南一记闷棍。他急忙从西安赶赴延安，召集各路高级将领总结初战失败的教训。认为三十一旅之所以被歼，“一因兵力单薄，再因疏于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走川道，遇伏击不能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是为前车之鉴”<sup>①</sup>于是采用国防部为其策划的“方形战术”。就是把两个兵团排成数十里宽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只走山头，不下川沟”。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分散孤立而遭各个歼击，又可以在发现西野主力后不使其乘空隙而转移。

胡宗南的宽大方阵，对于只有 2 万人的西野来说，看起来确实成了一块难以啃动的硬骨头。在敌兵力集中，不利于我分割围歼的情况下，彭德怀审时度势，很快找到了破敌之策，组织小部队在敌兵团前后左右不断袭扰，长时间疲惫消耗敌人。我主力则选择有利于机动的地形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弱点暴露和分散再行聚歼。彭德怀形象地说，你大部队滚筒式一跃再跃，我就让你在滚动中推磨转圈，把你当小毛驴一样赶着走。

3 月 26 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目前寻找我军主力决战”。“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

4 月初，毛泽东给彭德怀、习仲勋（西野副政委）来电提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9 页。

出 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彭德怀认真考虑了电文的意见,认为有必要就敌人改变战法后敌我态势特点及我之对策进一步向中央作出报告,他与习仲勋等商量后,在4月2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写道:

“敌自青化砭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碾子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的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它、消耗它,迫其分散,寻找弱点。目前敌军甚疲劳,掉队、落伍、逃亡日渐增加。为对付敌人此种强大集团战法,拟分散三四个营兵力,以一连两连为一股(现群众游击战未开始),派得力指挥员,在敌人前后左右四面袭扰,断敌交通,将敌疲困,使敌不能不分散部分力量守备交通,以达成打击分散之敌与打援敌之机会。此法试行,妥否盼示。<sup>①</sup>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深为赞许,即复电:敌10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胡宗南的大兵团在彭德怀所派“导游”的牵引下,在延长、延川、清涧、瓦窑堡一带兜了一个大圈,在千山万壑之间转了十几天,“武装游行”400余里,也未找到西野的主力,其部队在无数山梁之间爬上爬下,睡野地,啃干粮,还经常遭我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小股部队袭击,被拖得疲惫不堪,给养严重困难,士气沮丧。第一师师长罗列在给胡宗南的电报中报告了所处的困境:

“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营,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者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坏,且士气亦远非昔比。”<sup>①</sup>

此时,陈赓部在晋南展开强大攻势,胡宗南不敢再北进转圈,便以第七十六师守备延川、清涧,以一三五旅留守瓦窑堡,主力于4月5日南下蟠龙、青化砭集结补充。彭德怀趁敌南撤之机,于4月6日在永平地区对刘戡的第二十九军打了一次小伏击,歼敌600多人后撤出战斗。这时胡宗南判断西野主力已转移到牡丹川、李家川(子长县)地区,遂集中8个旅,分别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调一三五旅南下策应。

彭德怀经过对敌军调动情况的综合分析,判断敌一三五旅可能南下向其第二十九军靠拢。决定抓住这一战机,来一个“虎口夺食”,在其同第二十九军汇合前予以歼灭。他分析一三五旅沿路程短、离主力近的瓦窑堡、蟠龙大道行动的可能性比较大。当敌主力前进态势显示敌一三五旅行动完全符合这一判断时,彭德怀当即决定,将南面进攻之敌主力吸引到蟠龙西北,把一三五旅歼灭于瓦窑堡以南。为了不暴露意图,他命令伏击部队让出一三五旅可能经过的高地,务必诱其就范。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佯装野战兵团主力的第一纵队,在“每天只让敌前进5至10公里”的命令下,采取运动防御,积极顽强抗击,以2个旅的兵力拖住了董钊和刘戡8个旅的主力。胡宗南根据我抗击部队的坚强阵势,断定西野主力在蟠龙以西地区,命令整编第一军和二十九军猛进,同时命令一三五旅火速南下,以便围歼野战兵团主力。

4月14日上午,奉命迅速南下的敌一三五旅进入彭德怀设定的伏击圈,西北野战兵团以4个旅对1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向其发起围攻。一三五旅成为笼中之鸟,急电胡宗南速派援兵解围。可董钊、刘戡8个主力旅在一纵的顽强阻击下,进展缓慢,至下午4时,一三五旅4700余人被全歼,董、刘距此尚有50多里。

4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将彭德怀的这种战术形象地称之为“蘑菇战术”。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的办法,“将敌人磨得精疲力尽,然后消灭之”。强调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经之路。

彭德怀作为“蘑菇战术”的实际“发明者”和实践者,认为运用此谋有三个要点:

#### (一)诱扰结合,让“磨盘”转起来

对于强敌,我之无力与之硬抗时,先退一步,待机破敌,这是积极防御思想所要求的。对于这一点,稍有军事头脑的指挥员都是可以做到的。但要把“待机”变成创造战机,则非高明的军事指挥员不能办到。彭德怀认为,在我一时难以找到其弱点时,要通过“磨”来为“打”创造条件。而要“磨”出战机,则首先是想法使敌人像“毛驴拉磨”一样不停地转起来。对此,彭德怀采取了两个招法:一是用“诱”的办法牵着敌人走,即抓住敌人急于找我主力决战的心理,令部分兵力装成主力,与敌若即若离,领着敌人在塬峁沟壑之间大游行,拖得敌人精

疲力竭。二是用“扰”的办法不让敌人有片刻的安宁,即以连为单位各带电台,分布于敌主力周围,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的办法,与敌纠缠,磨得敌人坐立不安,锐气顿消。敌人由于战线拉长,补给困难,兵力损耗,不得不抽出一部分兵力驻守要点。这样一来,其弱点就必然暴露出来。

#### (二)善于发现并及时把握战机

“磨”的目的在于创造战机。而这种战机往往稍纵即逝,特别是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说变色龙,是指它纷繁复杂,瞬息万变。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以极其机敏的眼光审视战争进程中的每一个新的情况和变化,及时捕捉住敌人暂短的失误而加以利用。就在西野与敌人“推磨”的过程中,4月11日中央军委收到了西安地下党组织的情报:清涧敌第二十四旅1个团于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后,一三五旅可能调动。中央即将这个情报电告彭德怀。这个动向引起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根据野战兵团司令部侦察报告董钊、刘戡2个整编军的主力,正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敌一三五旅可能南下向其整编二十九军靠拢,感到这正是歼敌的良好战机。于是,果断作出集中野战兵团主力歼灭敌一三五旅的决策。并结合地形对敌之可能行动进行了分析,认为敌一三五旅南下有三种可能,一是沿瓦(窑堡)蟠(龙)大道向南,与其主力会合;二是向西南,经安定窜安塞;三是向东南,经永平或清涧南下。但从敌人企图和地形看,以第一种可能性最大,遂决心阻南打北。乘敌一三五旅南下之机,在运动中歼灭之。

#### (三)抓住将胜机转变为胜利的关键环节

在战场上,战机只表现为一个方向性,当战争或战役指导者朝着这个方向走向自己的目标时,常常会发现前进的道



路上还是障碍重重,要把胜利的可能转变为现实,就必须从中找到破除障碍的关键环节,开辟出通向胜利目标的途径。在此次战役中,当彭德怀定下抓住战机歼灭敌一三五旅的决心之后,在兵团司令部驻地四野湾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人行动企图,研究歼敌方案。讨论中,大家普遍担心我军兵力有限,将要两面作战,弄不好会遭到敌人夹击。彭德怀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指出,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只要部署得当,就可以避免这种局面,并认为歼灭该敌的关键有两点:一是阻住敌人主力,不使其与一三五旅会合;二是速战速决。如不把敌军主力8个旅阻住或调开,不仅难以歼灭一三五旅,我军确将腹背受敌,如歼敌一三五旅用时太长,会增加阻击部队的困难,亦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据此决心以第一纵2个旅将敌主力吸引于西,集中4个旅歼敌一三五旅于东。为确保将敌主力阻住,彭德怀还亲临独立第一旅指挥阻击作战。在一纵的顽强阻击下,敌主力8个旅虽离一三五旅只有数十里(最近的只有数里)之隔,但也无法靠拢。彭德怀在指挥阻击敌军主力的同时,为速战速决歼灭敌一三五旅,决定首先集中3个旅歼灭该旅1个团,然后转用兵力,集中4个旅向一三五旅旅部和另一个团发起攻击,从而大大加速了歼敌的进程。此役,彭德怀针对敌众我寡的实际和敌人行动态势,紧紧抓住阻敌援兵和速战速决两个关键环节,从而确保了全歼敌一三五旅。

### 三、顺详敌意,将计就计

“顺详敌意”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详”通佯，意思是假装顺从敌人的意向，因势利导，欲擒故

纵,把敌人的行动引向极端,然后乘机而战胜之。彭德怀深谙此法,他强调在作战中要善于从敌人的思路中寻求为我所用的途径,善于顺水推舟,将计就计,让敌人在自以为得计的情况下,上当受骗,就我所范。他在指挥西野于羊马河歼敌一三五旅之后不久,又克敌之重要补给重镇蟠龙,可称得上是顺详敌意、将计就计之佳作。

1947年4月下旬,国民党空军侦察,发现绥德、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集中了一批船只,解放军多路小部队向绥德方向前进。因此敌统帅部断定“共军主力向绥德附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北进,又命令榆林的邓宝珊部二十二军南下米脂、葭(佳)县策应。企图南北夹攻,围歼西北野战兵团,或逼西北野战兵团东渡黄河。胡宗南依计而行,除留1个旅部带1个团、1个保安总队留守蟠龙外,命刘戡、董钊率9个旅于4月26日从蟠龙、永平北进。

董、刘主力开始出动之后,彭德怀判断敌人的企图认为,敌算定此举定能逼我与其决战或东渡黄河,自以为得计,但它的补给基地蟠龙却成了孤立之点,我可将计就计,攻歼蟠龙之敌。

蟠龙镇位于延安的东北,是胡宗南部集散地,同时又是战区枢纽和前方补给基地,储备着大量的军用物资。胡军每次出动之后,都要到此补给粮弹。守敌一六七旅是蒋介石嫡系整编第一师的主力旅,装备精良。且蟠龙四面环山,只有三条隘路东达永平、清涧,南下延长,北通瓦窑堡、绥德。地势险峻,并修了坚固的工事,易守难攻。在胡宗南看来,西北野战兵团重武器少,火力弱,还不具备攻打蟠龙的能力。而彭德怀对我双方情况作了全面分析后认为,只要敌人主力远离蟠龙,能至少有4天的攻击时间,就可以啃下这块“硬骨头”。

为此,彭德怀顺详敌意,投其所好,以三五九旅一部,并

从其他各旅各抽出1个排,扮演主力向北撤退。胡宗南的几十里方阵,果真紧紧咬住了彭德怀为它准备的“主力部队”,向北疾进,岂不知正中了彭德怀的声东击西之计。

4月27日19时,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

“(一)董、刘两军二十七日十五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一六七旅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

(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妥否望即复。”

毛泽东当即复电:“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

4月29日,彭德怀发出了围攻蟠龙的作战部署:一纵、独四旅、新四旅攻歼蟠龙守敌,三五九旅一部和教导旅分别阻击南北可能增援之敌。30日,野战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蟠龙镇。5月2日晚进攻蟠龙的战斗打响,激战至4日,蟠龙攻坚战胜利结束,全歼敌一六七旅6700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军服4万套,面粉1万余袋。

在蟠龙战役打响之后,胡宗南极为震惊,急电主力从绥德日夜兼程回援蟠龙,当5月9日疲惫不堪的援军赶到蟠龙时,镇上已空无一人。

从上述战例中可以看出,“顺详敌意、将计就计”运用之妙,精要在于:

(一)悉心研究敌人作战心理,窥破敌人的行动企图

了解敌人的意愿,识破敌人的计谋,这是顺详敌意、将计就计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必须研究敌人的心态,从他的一举

一动中,看出他的用意在哪里,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蒋介石给胡宗南下的命令,彭德怀并不知道,但他却从胡宗南放弃原抽兵援晋的计划,集中9个旅的兵力从蟠、永坪出发北进的行动中,准确地判断胡宗南认定我军主力已退向绥德方向,企图与榆林守敌南北夹击我军于绥德、米脂地区或逼我过黄河以东。正是由于彭德怀识破了敌人这一企图,才决心将计就计,调虎离山,趁敌主力劳师远涉、回援不及之际攻取蟠龙。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判断,也就不可能有下文。由此可见,军事指挥员必须有敏锐的洞察力。敌人的真实意图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掩盖,没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辨能力,是很难看透的。

#### (二)因势利导,不露声色

顺详敌意、将计就计,贵在一个“顺”字,妙在一个“就”字。但也难在这两字上。说它贵与妙,是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它难,是因为既要采取针锋相对的反措施,又必须顺着敌人的思路去表现自己,一定要装出正中敌人下怀的样子,决不能露出半点破绽。为了达到调离敌人主力远离蟠龙的目的,彭德怀投胡宗南所好,一方面,以一部兵力装成主力,采取节节抵抗,使其与胡宗南关于“共军主力正向绥德方向败退”的判断完全吻合,另一方面,以一部兵力在绥德以东制造东渡黄河的假象,虚张声势,从而更加深了敌人的错误判断。而我军之主力却在蟠龙附近的永坪东北地区待机,不露半点行踪。因此当彭德怀指挥其主力开始向蟠龙运动,蟠龙之敌将其有“受到共军主力包围迹象”的情况报告胡宗南时,胡仍认为“共军主力已被‘咬住’”,蟠龙方向可能是“共军游击队的袭扰”,直到彭德怀指挥我军对蟠龙发起攻击之时,胡宗南才如梦初醒,惊呼上当。

#### (三)随机应变,立于不败

这一谋略手段作为一个过程,是由许多环节和因素构成的。由于它和一般的作战行动相比,更具隐蔽性,要求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而客观上,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意外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因此,指挥员和部队只有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才能保证作战意图的实现。按原定计划,我军应于5月1日发起攻击,但因雨天行动不便,不得不推迟时间。为了有足够的时间保证攻取蟠龙,彭德怀命令执行诱敌任务的第三五九旅,于5月2日将敌诱至绥德地区,配合主力作战。以更大的空间来保证攻击所必须的时间。从而保证了作战的顺利进行。5月2日黄昏天气转晴,彭德怀命令部队发起攻击,各攻击部队先后攻占了敌外围阵地,但在继续向敌主阵地攻击时,由于我炮火弱,加之我部队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攻击受阻,部队伤亡较大。鉴于这种情况,彭德怀当机立断,命令各部队暂停止攻击,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攻坚准备。3日15时,指挥部队再次发起攻击,一举突破敌阵地。试想,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一味硬攻,很可能招致更大伤亡而不克,如果放弃,那就会前功尽弃。在9个旅的援敌向此逼近时,没有非凡的应变能力,是不可能做出先停下来总结经验准备好再攻的决策的。

#### 四、有意暴露,诱“鱼”上钩

在两军对垒中,双方都在尽力获得对方的作战企图和兵力部署等情报,以确定自己的作战方针和行动计划。可以说,敌情判断准确,即是成功的一半,而情报判断的失误则没有不失败的。因此,尽力隐蔽自己的实力及行动而不为敌察,同时以假象使敌产生错误的判断,调动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动,是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前提。然而,经过精心谋划的

“暴露”往往是达到隐蔽自己而引敌上钩的最佳途径之一。彭德怀指出：“有时故意采用许多方法，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兵力、驻地或企图，但又要适时地隐蔽起来，这样，就可以使敌神经错乱，而造成我主动消灭敌人的条件与机会。”<sup>①</sup>特别是在敌人急于获得我之行踪的情况下，这种有意暴露所产生的错误信息，更容易使敌人如获至宝，深信不疑。作为陕北战局转折点的沙家店战役，就充分体现了彭德怀有意暴露引敌上钩的艺术。

1947年8月，为了调动胡宗南主力北过无定河，为陈、谢部渡黄河创造有利条件，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组织围攻榆林战役，相机打援。由于敌三十六师走长城外沙漠而绕过西北野战军的打援部队，在敌进抵横山以北地区以后，为争取主动，彭德怀决定撤围榆林。有的指挥员要求再攻一次，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说不打就不打，再有一个钟头能打下来也不打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把敌人来回拖，找准机会再钓他上来。”其后不久，彭德怀果真钓上了三十六师这条大鱼。他所采用的谋略手段就是“有意暴露”。

从榆林撤围之后，彭德怀将主力集结在榆林东南、米脂西北地区。并根据胡宗南逼西北野战军东渡黄河的企图，将中央西北局和各后方机关从葭（佳）县移至黄河以东，而且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抽出部分电台过往河东频繁活动，同时以一部兵力掩护，显示大军将要过河的样子。

彭德怀故意暴露给胡宗南所提供的“情报”果然生效。胡军的情报部门根据其电台测向及实地侦察，向胡宗南报告“共军正在仓皇逃窜”，并说共军到了佳县已弹尽粮绝，把重武器都埋了。胡宗南因此断定西北野战军主力将渡河东去，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严令各军“迅速追击，勿失千载良机”。令刘戡的5个旅向佳县急速前进，于8月16日进到绥德义合镇地区；又令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南下，与北进主力会合。其意图是“迫敌于两河（黄河、无定河）之间决战”，将西北野战军围歼于该地区。

此时钟松的三十六师刚到榆林不到一天，经过沙漠长途行军，人马均已极度疲乏。但自恃解榆林之围有功的钟松看来，这是重建奇功的良机。因此马不停蹄，率两个旅经归德堡南下。对彭德怀来说，这正是吃掉敌三十六师的良机。他分析认为，这个师是胡军的主力，但经过长途行军，严重减员，已是疲惫之师。且钟松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为再立战功，已远离主力孤军冒进。根据其前进的态势，彭德怀断定其主力必经沙家店东进，决心在其与刘戡靠拢之前歼灭它。命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分区两个团）以部分兵力吸引钟松的前梯队，以主力抗击刘戡部，阻止该敌与三十六师会合。集中一、二两个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歼灭三十六师。19日戌（19~21）时，彭德怀报告中央军委：“拟明号（天）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北各个歼击之。”20日3时，毛泽东亲拟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对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22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对敌整编三十六师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全歼敌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俘旅长刘子奇，钟松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化装逃脱。

沙家店战役是扭转西北战局的关键一仗，我在西北战场由被动转入主动，西北野战军开始转入内线反攻，敌人则开始走下坡路。整个陕北的军事形势为之改观。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祝贺胜利。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

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

#### (一)运用多种“暴露”方式以产生综合效应

故意暴露,在一般情况下,是一种隐真示假,所暴露的真情往往是诱使敌人上当的假象。乘隙取利,捕捉战机,是每个指挥员共有的主观愿望。故意暴露,示以有利战机而诱其就范,正是利用了这一常理。然而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员特别是高级将领决不会轻易相信对方“暴露”行踪的真实性,都在时刻提防步入对手的圈套。只有当他们综合各种因素,反复权衡利弊,断定确实捕捉到了有利战机之后,才能定下决心,为之一搏。那么,如何才能使隐真示假的“暴露”让敌人信以为真呢?彭德怀认为,其要诀在于方式的多样性和巧妙性,以及产生的综合效应。特别是这种暴露应该是通过敌人最为可靠的情报手段获得的,而且为其他各条渠道的迹象所证实。在沙家店战役中,彭德怀为使敌人相信西北野战军主力准备渡江,不但以部分兵力摆出掩护大部队渡江的架式,而且真的将中共北方局和各后方机关转移到黄河以东,不仅如此,还让晋绥联防司令部的电台到黄河以东频繁联络。因此,敌人无论是空中、地面侦察,还是电台测向分析,都得出西北野战军主力将渡河东去的结论,这对于苦于找不到西北野战军主力的胡宗南来说,确实没有理由再去怀疑它的真实性。

#### (二)选用适合敌将口味的“诱饵”,使其见饵忘钩

故意暴露,是一种示利诱敌之策。军事对抗的双方无不是为利而战,趋利避害。然而战场上利害相杂,稍有头脑的军事指挥员都会懂得这个道理,敌人的指挥官也是如此。所以对战场上“利”与“害”的判断都不是轻易做出的,而权衡各方面情况后的结论。由于每个指挥员的经历、个性、认识能力、思维方式的不同,对同样的情况,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



的结论。因此研究了解敌人将领的特点,使“故意暴露”的“诱饵”对其口味,“鱼”才能上钩。在沙家店战役中,彭德怀之所以钓上了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整编三十六师这条“大鱼”,是因为对其师长钟松的“口味”有了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西北战场上,彭德怀连续打了几个歼灭仗,胡宗南手下的多数将领已经没有“勇气”再去吃“故意暴露”的“诱饵”了,但彭德怀认为钟松例外。一是他对自己这支“主力”的战斗力的估计过高,自认为彭德怀“可以吃掉别的军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二是他解榆林之围有功,受到蒋介石、胡宗南的奖赏,有些忘乎所以;三是其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因此见到有歼灭西野的“千载良机”肯定会争先抢功。果然不出彭德怀的分析,钟松扬言要“一战解决西北问题”,孤军冒进,结果全军覆灭。

### (三)反常用兵,化险为胜

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称赞道:“侧水侧敌本来是兵家所忌,而我们的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取得了空前胜利。”因为这一仗的作战地点不但离两支劲敌会合的地点只有几十里,而地理环境十分险恶:北面是浩瀚的沙漠,东面是滚滚的黄河,西南是无定河和敌军,侧水侧敌,回旋余地很小,处境十分危险。但彭德怀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反常用兵,不但能化险为夷,还能化险为胜。因为越是险,就越是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常常能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确是这样,即便是在8月18日敌三十六师与野战军主力开始交锋,因天下大雨而退至沙家店地区之后,钟松虽发现野战军的主力并未渡河,而在他的主力附近之后,仍未判断出野战军的意图,而彭德怀从敌两支军队的态势分析得出结论:敌军并没有摸清我军意图,因此仍决心按原计划先行歼灭敌三十六师,二天后(8月20日)向钟松的三十

六师猛攻 , 将其全歼。

### 五、攻其必救 , 张机设井

在进攻作战中 , 阵地攻坚比运动中歼敌需要有更强的兵力特别是火力优势。因此 , 变攻坚战为运动战 , 将战场摆在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地形上 , 就有可能把难啃的骨头变成好吃的肥肉。“攻其必救 , 张机设井”正是实现这一作战企图的谋略手段。在孙子兵法中论述了“攻其必救”的谋略思想 , 特别是在孙臆活用这一谋略原则 , 创造了“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之后 , 这种避实就虚、敌进我进的“攻其必救”谋略 , 成了历代战略家转换战场局势的常用到之策。

我军在革命战争中 , 将“攻其必救”谋略思想创造性地用到运动战中 , 创造了“围点打援”、“攻城打援”等新战法。宜川战役 , 就是彭德怀运用攻其必救 , 张机设井谋略的杰作。

1948年初 , 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举行战略进攻 , 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决策 , 决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 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当时西北战场的态势是 :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经过 9 个月的作战 , 歼灭敌正规军 6.1 万人 , 非正规军 1 万余人 , 而西北野战军已增加到 7.5 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已由原来的 10※1 变为 5※1 , 虽然敌人数量上仍占优势 , 但主动权已开始转移到西北野战军的手中。迫使胡宗南部困守一些点线 , 采取机动防御部署 , 陷入了被动地位。胡宗南以整编七十六师一部守备韩城及禹门口 , 阻挡在晋西南的二纵西渡 ; 以二十四旅守宜川 ; 以整编十七师两个旅及陕西保安十一团守备延安至富县的公路 ; 由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主力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宜君、临真镇地区机动 , 以便北援延安 , 东援宜

川,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实现其所谓“监视三面”,并保护其后方供给线。在这种情况下,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战略进攻的第一着棋应该如何走呢?

对此,彭德怀召开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会议进行分析研究。会上彭德怀提出了西北野战军战略进攻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北攻榆林,西出陇东,南出陕中。究竟哪个方向更有利于给敌以致命的打击,更能对战略全局产生重大影响?他让大家各抒己见,讨论中,有的主张打延安,认为收复延安政治影响大;有的觉得应该向陇东出击,打击“二马”;还有的主张直捣关中,掏胡宗南的老窝。彭德怀集思广益,分析认为,延安既有坚固的工事,又有重兵防守,现在直接攻打延安,必然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向陇东出击,同“二马”骑兵作战,很难打成歼灭战,胡宗南的力量没有消耗掉,如胡、马两头夹击,可能造成被动局面;而陕中方向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同时这一地区的地形便于我们对敌援兵进行伏击。因此,向延安以南黄龙山进军,插到敌后,在咸榆公路和黄河西岸的中间地带实施战略进攻是最佳的选择。彭德怀将这一作战部署生动概括为:“打宜川,调洛川(之敌);歼灭刘戡,收复延安。”<sup>①</sup>大家认为还是彭总全局在胸,棋高一着。

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的战略要地。彭德怀料定打宜川胡宗南一定会派兵救援,确定第一步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攻宜川。即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调动黄陵、洛川等处敌军来援,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然后夺城。彭德怀明确提出,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则应勇猛果敢,速战速决。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这一作战方针报中央军委后迅速得到批准。

按照围点打援的作战意图,西北野战军主力于1948年2月12日,分别由保安、米脂、绥德、清涧地区向南开进,16日到达甘谷驿、延长待机地域。同一天,第二纵队自晋南曲沃地区西进,准备由禹门口渡河,参加宜川地区的作战。为了不暴露西北野战军的企图,彭德怀将打援部队集结于离预设地区20多里之外,待敌作出错误判断上钩后,再令各纵队以急行军进入伏击地区。

按照彭德怀的部署: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的任务为“协同歼灭宜川守敌,夺取宜川并准备打援”,于24日完成对宜川的包围。27日,占领宜川外围主要据点。准备打援的第一、第四纵队也于23日到达瓦子街以北的出发位置。同日夜,王震率领的第二纵队从禹门口强渡黄河,集结于宜川以南约50里的圪台街附近。彭德怀根据这一带的地形条件,决定把歼灭敌援兵的“陷阱”设在瓦子街一带。在包围了宜川之后,彭德怀及各纵队的首长前往伏击地域察看地形。瓦子街是洛(川)、宜(川)公路的咽喉。由此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长约15公里。公路在两山之间的峡谷中穿行,两侧遍布梢林,便于部队隐蔽集结,进行野战。彭德怀十分满意地说:“敌人如走这条路,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当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城并开始对其外围据点发起攻击之后,宜川守敌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连连向西安绥署胡宗南急电求援。胡宗南一面令张汉初凭借宜川的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坚守待援,一面急令刘戡率整编二十七、第九十师4个旅2万多人火速前往解围。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军的5个纵队,可能有3个纵队的兵力用于攻宜川城,二纵渡河后必先夺取韩城、合阳,不可能用在宜川方面。用于阻援

的只有一个纵队。因此,命刘戡走经瓦子街这条最近的路线。刘戡接到命令后,连作战会议都没有召开,就下达了出发命令,于26日,由洛川、黄陵、沿洛宜公路经瓦子街,日夜兼程,增援宜川。27日到达瓦子街地区,进至瓦子街后,刘戡的参谋长刘振世认为前方隘路,有遭我军伏击的危险,建议从左向观亭绕进,刘戡也有此顾虑,但不敢自作主张,遂请示西安绥署。胡宗南回电:宜川紧急,按原计划,不顾一切,兼程向东驰援。28日,刘戡率部继续东进,当日,其所有部队均进入瓦子街以东隘路。

28日晨4时,彭德怀下令于次日拂晓对敌援军发起攻击。并适当调整部署,除第三、第六纵各留1个旅继续围攻宜川外。集中野战军9个旅的兵力在瓦子街至铁笼湾南北侧高地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同时,电令二纵集结于圪台街与瓦子街之间,准备由南向北侧击瓦子街及以东的援敌。

29日晨,负责扎口袋的一纵于瓦子街以西尾敌前进,6时攻占瓦子街。到当日黄昏,西北野战军已紧缩包围圈,将压缩在乔儿沟、任家湾、丁家湾及其附近高地的东西不到10公里长、南北约5公里宽的狭小区域内形成的合围态势。

3月1日拂晓,彭德怀下达了总攻命令,一纵沿公路及其两侧高地由西向东攻击,二纵由南向北、四纵由北向南、六纵一部由东南向西北、三纵一部由东北向西南对敌发起总围攻,激战至下午5时,胡宗南的增援部队全部被歼。敌整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在其回忆文章中对3月1日的惨败作了这样叙述:

“在解放军强大压力和勇猛攻击中,刘戡全军的阵地逐渐缩小,伤亡继续增加,特别是各级干部的伤亡更加惨重。整编三十一旅旅长周由之和整

编四十七旅旅长李达相继阵亡,其他中级与下级干部阵亡者更是数不胜数。此时全军士气颓丧已达极点,各级指挥已失去作用,士兵一批一批地后退,阵地相继失守。午后,整编第九十师师长严明,见战局无法挽救,乃自杀。就这样拖延到黄昏时分,刘戡见大势已完,再无任何希望,于是下令各单位,焚烧机密文件秘本,并毁坏了电台,至此战斗已至尾声,全部陷于混乱状态。刘戡在解放军围攻该军部时,眼看危及自身,遂跳出战壕自戕身死。”<sup>①</sup>

3月2日,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的部队发起总攻,至3日上午8时,全歼宜川守敌和二十四旅,宜川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全歼了胡宗南集团第二十九军军部,第二十七、第九十师2个师部5个旅共3万人,取得了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对这一战役的分量,双方的最高统帅都作了评价。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写道:

“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

蒋介石则在给胡宗南的“手启电”中悲叹:“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灭,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西北野战军大举南进,胡宗南不得不进一步收缩兵力,于4月下旬放弃了苦心经营了1年零1个月,构筑了坚固工事的延安。彭德怀“打宜川,

<sup>①</sup> 《文史资料选集》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35页。

调洛川,歼灭刘戡,收复延安”的作战意图全部实现。

“攻其必救,张机设井”作为转换战场态势的战略战术,其运用和实施有着很深的学问。彭德怀在其军事论著中,对此有许多极为深刻、精辟的见解,总的来说,是要处理好攻城与打援的关系,将作战的着眼点放在“张机设井”上,诱使敌人往我设置的“机关”、挖好的“陷阱”里钻。

#### (一)选择目标,务使“必救”

彭德怀认为,在运用这一谋略时,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必须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此点的得失,将对整个战局产生重大或较大的影响。只有这样,敌人才必救无疑。在西北战场上,宜川正是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对于胡宗南来说,宜川是把守关中的屏障,如宜川失守,关中门户洞开,将危及自己的老巢。而对于解放军来说,宜川像是黄龙区同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的一个钉子,拔掉这颗钉子,解放黄龙山诸城,可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因此彭德怀在考虑战略进攻方向时分析说,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们打宜川,胡宗南必然派兵来增援。这就便于我军以逸待劳,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正是这一正确的分析,奠定了宜川战役胜利的基础。

#### (二)掌握节奏,攻而缓克

在战场上,任何一个指挥官从主观上说,他只能采取他认为可能成功的行动。因此,在攻城时,要把握好“度”。既要使敌人打痛,使其觉得岌岌可危;又不可过早攻破,要给敌人造成我已尽全力攻击的错觉,使其觉得救援有望。但是如果只围不打,或打得不猛烈,就会暴露打援的企图。这就是彭德怀在宜川战役中所采取的“攻城部队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的道理所在。

### (三)“张机设井”必置于敌援兵的必经之途

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实战中却很难把握。因为从敌援兵出发地至被围地,往往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军事指挥员的高下之分,就在于能否正确判断敌人驰援的路线选择。刘戡从黄陵、洛川等地增援宜川,有三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且距离近,增援速度快,但有遭伏击的顾虑;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速援;三是经土庙梁到宜川,这是条山间小路,行动缓慢,重武器不易通过。彭德怀分析认为,如敌从后两条路救援,“我军则不易将其全部歼灭”,刘戡从自身安危想,也可能选择走小路。但下命令的是胡宗南,他要兼顾守军与援军,经瓦子街到宜川,既近又好走,可以达到迅速解围,此人主观成性,必然命令刘戡经第一条路线驰援。且刘戡在1947年10月延清战役中,因增援清涧来得慢受了处分,这次他要走得快,也只有走公路。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彭德怀才决定在第一条路上“张机设井”。战役的实践证明,敌人完全是按彭德怀预料行事的。



## 第六章 高屋建瓴谋大势

### ——战略谋划的基点

运筹策帷帐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刘邦

兵家权谋中 ,战略谋划居于最高层次。所谓战略谋划 ,即是对战争全局的指导和筹划 ,它的基本任务 ,是根据战争的性质及战争双方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条件 ,照顾战争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的关系 ,制定战略方针、计划和实施的形式与方法。古人云 :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域 ;不谋万世者 ,不足谋一时。这就是说 ,只有精于战略谋划的统帅 ,才能握有到达战争海洋彼岸的通行证。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整个历程中 ,彭德怀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不仅一直担任一个方面军的主帅 ,而且从红军时期开始即在最高统帅部居要职。土地革命时期任中革军委副主席(1930年开始)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的副总司令 ,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长期肩负着战略指导的重任。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针、决策的制定和贯彻 ,为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彭德怀战略思想广博精深 ,本章只是就其战略谋划的基本思路和着眼点作一探讨。

### 一、“深察敌我利害”

战争中的利害是指影响实现战争目标的主客观条件。对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敌我力量对比等利害关系进行分析判断,是战略谋划的起点。任何战略思考都是在权衡利害的基础上进行的。彭德怀在《关于作战指导原则》一文中对此作过深刻的阐述:“战争领导者必须反复思考,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认真分析敌我利害,深察敌人企图。”<sup>①</sup>他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出准确的战略指导”,真正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 (一)全面客观地估量敌我形势

敌我力量的对比,是进行战争指导的基本依据。在战略谋划中,正确全面的敌我形势估量,是作出正确战略决策的前提。换句话说,任何一场战争其战略指导方针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敌我利害关系的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战争是敌对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从总体上看,主要包括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人口、自然、地理等方面,它们的综合力量决定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而这些因素的每一方面,也都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如军事力量它包括军队的数量、编制体制、武器装备、战术技术水平、军事思想、指挥官特点、部队士气等。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只有对这些因素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也就是,不但要进行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要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地理环境等各方面力量的综合比较,在军队力量对比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

中,不但要看现有军队的数量质量,而要看后备兵员的数量质量,不但要看武器装备,而且要看军队军事和政治素质。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而不是全面权衡作出准确估量,就必然要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彭德怀指出:“必须认真了解对方各方面真实情况……,综合这些同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对比分析,然后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sup>①</sup>

彭德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所提出的战略指导方针,正是对当时敌我力量对比进行全面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我军的初创阶段,他认为必须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掌握政权而我根据地尚在创建中的客观情况出发,以盘旋式游击战争来壮大自己、消耗敌人。“红军惟一良好的战术即是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抗日战争之初他深刻地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摆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固然不应过分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而丧失胜利的信心,但亦不应轻视敌人的力量,而放松自己的动员与必需的准备。我们需要最高的抗战热情与胜利的信心,我们尤需要有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讲求争取抗战胜利的办法。”<sup>②</sup>他在抗战的各阶段所提出的一系列作战指导方针与战法,如对开辟、建设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艰巨性和必胜性分析,被后来的战争实践所一一证实,这种英明的预见性来源于全面客观的敌我力量的分析估量。

1939年,彭德怀在《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文中指出,由于目前敌后所处的战略位置的重要,尤其是华北将是决定最后胜负的重要战场。敌人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将减缓,而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围攻“扫荡”将更加疯狂。敌后抗战将陷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入紧张严重的局面,而且这种紧张的战争局面将随着全国战局的发展而继续发展,随着抗战相持局面的到来而更加紧张。由于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不易迅速改变,在敌人的不断扫荡之下,敌占区的面积一时有可能扩大,敌人之据点随军事之进展而有若干增多。“不仅是平原,甚至山地都可能钉上斑斑蹄踵。”但是,敌后地区辽阔,敌人兵力不足的基本弱点不易克服,其对敌后各地的围攻,一般只能采取集中兵力分区“扫荡”的办法。如此我们在被围的根据地反对敌人围攻的同时,未被围攻的根据地可以从四面围攻敌人。敌人因消耗过大,疲劳过度,困难增多,形势不利,不能不被迫退出围攻区域。我便可乘此间隙整理、巩固各种被摧残的组织,恢复和加强各种工作,扩大根据地,配合邻区,打击敌人,生息新的力量,准备迎接敌人的再次围攻。这种持久的、艰苦的战争,是造成全国战局转入相持阶段的重大因素,也是构成从相持阶段过渡到反攻阶段并夺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此后敌后抗日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彭德怀的分析预见。也正是据此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以空前规模的破袭战(百团大战)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以敌进我进的方针粉碎敌人的“强化治安运动”;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建设的全面加强,粉碎敌人的“总体战”。从而使华北敌后根据地在敌人一次次疯狂的围攻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成为最终战胜日军的主要战场。

### (二)用发展变化的眼光认识敌我战争潜力

彭德怀认为“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战争的进程中,敌我双方各自的力量都将随着战争潜力的不断发挥而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变化。“历史上曾有不少弱国战胜强国的事实,而在战争开始时,一定是弱国力量远不及强国。但在战争过程中,弱的国家不断发挥与生长了自

己的力量,终于在持久战下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sup>①</sup>。因此,在进行力量对比时,不仅要看到现有军事实力,而且要用发展的眼光对战争潜力作出估量。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他还从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等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存在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潜力。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从而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彭德怀还指出,在对一个战略区的敌我力量作出估量时,也不能只从现有军队数量看问题,而看到其发展趋势。1948年11月12日,他在给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和警四旅的指示电中分析当时西北敌我力量对比时,即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虽然从兵力上看,‘胡、马军现在还比我多两三倍或还稍多一些’”“敌大我小,从西北(陕甘)战局全貌来看还暂时存在,但从放弃延安时来看,从第一次歼灭三十六师来看,从歼灭刘戡时来看,从西府陇东战役时来看,从此次荔北战役前后来看,形势与内容均已经起了很大变化。而且一次比一次不同,变得于我们有利。全国各解放区胜利更大,益见接近全国胜利。对这一空前巨大的胜利看不清楚,或者看清楚了而产生等待友邻胜利来帮助西北,或者忽视西北当前具体情况,均是不对的”。并具体分析指出,胡军第一线防御部队九个师,除两个师未遭歼灭外,其余七个师均被消灭一至三次“胡军屡遭败及全国影响,士气益见低落,虽防守能力不算弱,但攻击精神一般都很差,故利于我阻击分割,集中主力各个歼击”<sup>②</sup>。

### (三)辩证地认识敌我利害关系

权衡利害是为了趋利避害。而战争中的利与害,既有绝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293页。

对性的一面,又有相对性一面。在某一个具体的军事行动中,针对双方的胜负结局,利与害有着绝对的意义,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必定有害,反之亦然。但在发展变化的对抗过程中,利与害只具有相对意义。比如,在战斗范围内出现的利,对于战役、战略任务来说,未必都有利。在许多情况下,一味地争夺小利,反而会影响战略大局。相反,有时因战略大局的需要,则要主动放弃战斗乃至战役的利益。同时由于对阵双方相互示形用诈,常常在战场上出现许多害中有利,利中有害,利害相杂的复杂情形。因此,辩证地认识利害关系,善于从不利中看到有利因素,坚定信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在发展顺利时看到不利条件,不为敌所算,乃是深察我利害的关键所在。彭德怀在其战略谋划中,处处闪现着辩证思考的光辉。他特别强调在胜利的情况下,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敌人的实力和自己的弱点。“军事上先胜后败,多半出自骄傲轻敌。骄傲轻敌的原因:一是对战争局势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认识;二是在胜利后,不易看出自己存在的弱点,忽视敌人的优点,因而产生轻敌情绪”<sup>①</sup>。在彭德怀的军事生涯中,打过许多在战争史上称之为奇迹的胜仗,而绝少有指挥上的失算,因素很多,能够辩证地认识敌我利害,在胜利后仍然客观而缜密地察彼度己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一条。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上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

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取得了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歼敌5.1万余人,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领土,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一带进行防御。这时朝鲜领导人和我军一些同志产生了速胜的思想。但彭德怀看到,敌虽遭两次打击,但主力未受大的削弱,敌人占有制空权、制海权,志愿军的运输车辆和物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5页。

资被毁严重。因此于12月19日致电毛泽东,对敌我双方情况及对策作了报告:“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较前低落,现在还有26万多兵力。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很不利。……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21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说:“你对敌情的估计是正确的,必须做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在打法上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感到不顺利,则适时收兵休整再战。”<sup>①</sup>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后,“联合国军”退至汉江以南,并放弃了汉城。中朝军队8昼夜向南推进了80至110公里。在举国和全军欢庆胜利的时候,彭德怀却冷静地分析认为,我军只歼敌1.9万人,敌人主力不战而退,是企图诱我南下,造成我军后方供应困难,侧翼暴露,以便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因此彭德怀于1951年1月7日断然命令各军自8日起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对此苏联和朝鲜方面都有人感到困惑不解,认为只要中朝军队继续向南追击,美军就会退出朝鲜半岛。中朝军队内部轻敌速胜的观点也在增长。1月10日,金日成到中朝联军司令部讨论继续向南追击的问题。在听取了彭德怀对敌情的有说服力的分析以后,金日成赞同了彭德怀的看法。战局发展的态势很快表明,彭德怀的决策是正确的。“联合国军”诱志愿军南下未成后,即于1月25日发动了反攻。27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部队后撤15至30公里,休整再战。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未同意这一意见。并要求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彭德怀坚决地执行毛泽东的决策。第四次战役虽歼敌2.2万人,但志愿军伤亡亦较大。一线兵团连续作战,大量减员,前线部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38、439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队衣、鞋、粮、弹均未补充,而第二番轮战部队还在鸭绿江边。彭德怀对此种局面深感忧虑,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2月21日回到北京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说明敌我现实情况,阐述朝鲜战争不能速胜的看法。毛泽东在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分析之后当即表示:“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从而为志愿军确定了持久作战的正确方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 二、着眼于全民战争力量的发挥

中国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着眼于全民战争力量的发挥,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战略指导方针的根本依据。在彭德怀的战略思想和他所作出的战略指导下,这一特点也十分鲜明。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阐述了认识和发挥人民群众巨大的战争潜力,对赢得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一系列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的方针和方法。为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群众优势是革命战争的根本优势,依靠这一优势取胜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一条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战争也是这样,它是敌我双方综合力量的竞赛。在这种竞赛中,优势的一方必然战胜劣势的一方。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就其军事和经济力量而言,革命势力无疑是处于劣势的。但力量的对比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也是民众人心的对比。彭德怀认为:“一个国家的生命,系之于全国人民的身上,一个战争的胜败,也系之于人民



的向背。”<sup>①</sup>从这一点说革命战争也有它特殊的优势,这就是人民群众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完全为最广大劳动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战争,它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和支持。这一点是我们的敌人所不可能具有的。因此革命战争的根本战略就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优势,依靠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来弥补军力经济力的不足。通过“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团结与生长民族的力量,高度发挥民众抗战的热情,建立正确的战略和战术,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势。”<sup>②</sup>

首先,人民群众中有着战争所必须的巨大的人力资源,能为革命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战略谋划中,发掘兵员潜力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无论任何形式的战争,都直接表现为人与人的对抗,其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当战争进行的时候,能否有足够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兵员补充,就成为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一切非正义战争都是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只能用强制的手段去获得战争所需的兵员和其他人力资源,兵员不足是这种战争中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当战争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且也为其所认识时,人民群众就会积极参加到战争中来。彭德怀指出:“军队作战的人力消耗是很大的,加上我们还需要组织更多的新的军队,才能应付战局开展的需要,这就非需要全民族的动员不可。”“强迫抽派或征调的军队,是无法支持最顽强的战斗的。反之,在民主与民生的纲领的实施中,人人将自动地踊跃地奔上前线,家中的父母妻子也将热烈地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上前线。这样军队,质量要好得多,战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斗力要坚强得多,与人民的关系密切得多”<sup>①</sup>。

其次,人民群众是战争赖以进行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民众中蕴藏着用之不竭的物力和财力资源。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是物质力量的竞赛。而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财富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离开了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连最原始战争也无法进行。中国革命战争是在物质力量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行的,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弥补物力财力不足,是必须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彭德怀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途径仍然是要发动和依靠群众。“有了民众的动员,可以增加后方的生产,特别是军需工业的生产,保障战争需要的源源供给,可以使军队得到民众无量的帮助。”<sup>②</sup>彭德怀作为一位统管全局的战略家,从来都是把经济问题放在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谋划的。如在抗战时期,八路军出师华北,彭德怀作为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不仅负责军事指挥,而且还受朱德之托,掌管八路军的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他将增强抗日战争经济力量的着眼点放在调动民众的农、工、商积极性,开发人民群众的财富创造力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战略和措施。1942年,他在《开展全面对敌经济斗争》一文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针对日军经济封锁和国民党卡扣,提出了“巩固根据地经济阵地”的七项战略措施:坚持正确的贸易政策;执行正确的保护税制;巩固根据地自己的货币;认真注意发展工业;积极增加农业;广泛发展群众性的合作社;组织敌后武工队。这些方针、政策和措施的贯彻执行,使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功地解决了不断扩大的八路军的供给。自1939年起,黄河即被封锁,我军与大后方隔绝,孤悬敌后粮弹两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缺。人民群众“异常艰苦地开展了生产运动,保证了军民粮食,克服了空前严重的灾荒”<sup>①</sup>。华北抗日根据地屹立于敌后。

再次,人民群众是克敌制胜新的战法的创造者,是产生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源泉。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而且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在精神力量中,除了民心士气等政治道德因素外,人在战争指导上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军力、客观条件上的优势只是具备了打胜仗的可能性,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有先进军事思想理论和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的指导。可以说,在既定的物质基础上,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将胜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决定因素。彭德怀认为,人民群众是先进军事思想和战法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指出,我军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来自人民,又为了人民的”<sup>②</sup>。1943年他在《关于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工作》一文中深情地写道:“人民群众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凭其固有的机智,有许多天才创造。办法之多,运用之妙,远非局外所能想象。”<sup>③</sup>革命战略家应该把眼光投向群众,集中他们的智慧战胜敌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战术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创造性,从而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环境中,获得了新的发展”<sup>④</sup>。彭德怀曾分析说,我们的敌人就个人才智而言,并不比我们差。他们将领的文化和军事专业理论水平总体上说比我们高,然而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面前,再高明的对手也一筹莫展。根本原因他们依靠的只是个人的

-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 ③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 ④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才智,而我们则是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

(二)关心、解决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是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发挥全民战争伟力,是建立在战争与人民群众利益追求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彭德怀认为“蕴藏在群众中极其丰富的战斗力量”的发挥程度,除了取决于战争本身是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还取决于人民群众对自身利益与战争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战争领导者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等现实利益的关心和解决程度。

首先,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革命战争代表着他们的根本利益。彭德怀认为,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和宣传,具有战略意义。从总体上说,作为革命战争主体的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战争与自身的关系,最终是会认识清楚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人们在获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之前,不可能有彻底的阶级觉悟,也不可能对战争的本质有彻底的认识。特别是在敌人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欺骗宣传的情况下,使一些人一时难分真伪。因此,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向人民群众揭示战争的胜负与其利益息息相关,才能使他们把革命战争看成是自己的战争。1929年彭德怀在总结平江起义后一年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红军在目前的任务还是争夺群众组织,扩大宣传的时期,要使千百万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和党内来,所以在红军里的同志,不单是武装斗争员,有时要担负着组织宣传的责任。”<sup>①</sup>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更是反复强调只有进行全民族的动员,方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灵活地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不论在敌占区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或我占区,不论男、女、老、幼,都要深入地动员和适当组织起来”<sup>①</sup>。

其次,只有尽最大努力去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要求,才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彭德怀认为,这是动员民众参战的前提。如果只要求人民为革命战争作出牺牲,而“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就必然失败。<sup>②</sup>彭德怀分析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是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只有承认战斗与农民的实际利益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积极性”。而与农民利益联系最紧密的是土地问题,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因此,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杠杆。正确的土地政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彭德怀认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是在于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湘赣边区实行土地平均分配,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湘赣两省白军‘会剿’时,永新有一个区没有被搞垮,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这一条”<sup>③</sup>。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主张暂不搞土改,但满足人民群众现实利益要求这一原则不能改变。对此彭德怀指出:“进行人民战争,必须使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应有的改善,即是说,抗日斗争必须与民主、民生密切结合,而民生的改善,又成为抗日斗争、民主运动的基本环节。因此,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就成为发动与组织群众的中心问题了。”<sup>④</sup>

-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 ③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 ④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第三,只有军队的一切言行都替人民利益着想,才能真正实现军民一体,同仇敌忾。人民群众对战争与自身利益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民关系来判断的。彭德怀认为,军民关系的好坏,决定于军队本身有无爱护人民的观念,有无严肃的纪律,他一再告诫部队:“军队要是脱离了民众,便会无法生存。……在战争期间一切决心在敌后方坚持的部队都应极度改善自己的纪律。部队内部都应加紧纪律教育与建立纪律检查制,不但做到不侵犯群众利益,而且要能处处为群众打算,为群众利益着想。以资军民融成一家。”<sup>①</sup>1947年,他在《亲密军民关系,开展群众战》一文中,就如何改善军民关系作了深入详尽的论述,认为它关系到“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能否得到最有效的贯彻。

(三)发展群众性革命武装,建立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武装力量体制

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战争伟力的重要途径。在战争中,人民群众以何种方式参与,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以间接的方式参加,他们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需要军队这个中介才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而建立群众性的武装,使人民群众本身就是现实战斗力的一部分,可以直接作用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直接弥补军力的不足。彭德怀在《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武工队的组织与斗争》、《加强地方武装》等论著中,对这一战略思想作过系统的阐述。

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最好组织形式。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中,已初步提出并实行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相结合的革命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了深刻的领悟。早在1929年,他就认识到:“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的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sup>①</sup>在抗日战争中,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完善和发展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武装力量体制的重要性,逐步把军队建设从过去偏重于主力军的扩军整训转到致力于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性游击武装的建设。1941年2月22日,彭德怀向华北各大小战略区发出关于军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八路军的基干兵团与军区组织系统分开,建立起军区独立的组织机构与系统。3月28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发表了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演说,提出的建立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设想。对三者各自性质、任务和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

正规野战军完全脱离地方性,有高度严密的组织性和很强的战斗力。它主要执行超地方性的作战任务,集中主要力量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役和战术集团。同时,帮助、培养、训练地方武装也是它的经常性的任务之一。

地方军是地方正规兵团和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它的基本任务是坚持地方斗争,执行区、县区域内作战任务,保卫党政机关和群众的利益。配合正规野战军在本地区的作战。并创造使之逐步发展升级为野战正规军的条件。

民兵是一种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组织。其基本任务是封锁消息,侦察敌情,掩护群众,配合主力作战。民兵应成为义务兵役制的基础。

<sup>①</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彭德怀的这一方案,使敌后抗日武装的几个方面在毛泽东抗日游击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赞同。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肯定和普遍实行这一武装力量体制。这一体制成为以后解放战争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体制的基本形式。

### 三、在积极防御和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现势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一个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里发生的,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进行的。其战略谋划必须着眼这些客观条件。“积极防御”和“持久战”,就是从这一客观条件出发而采取的正确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彭德怀作为我军重要的战略谋划和决策者之一,对此有着极为深刻而精辟的见解。“积极防御”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贯穿在他战略指导的全过程之中。

(一)积极防御是防御一方改变战略形势,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必然选择

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或进攻,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挫败敌之进攻的防御,亦称攻势防御、决战防御。当用于战略指导时,通常以各种积极的手段,不断消耗和歼灭敌人,转化力量对比,以便适时转入战略反攻。古今中外的一切军事家都十分重视积极防御。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提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普鲁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首次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概念,他认为防御不应该是消极的,“迅速而坚决地转入进攻是防御最光彩的部分”。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最有效的防御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彭德怀紧密结合中国革命



战争的实际,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经验,为中国革命战争积极防御战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彭德怀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决定了我军只能而且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就认识到,要粉碎敌人的“围剿”,必须执行“防御中的进攻作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个作战指导原则,实行积极防御。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消极防御战略。就在这一错误的战略方针提出之初,彭德怀于1933年10月24日、25日两次致电中革军委,要求红军仍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红军“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而应诱敌深入,集中主力,发挥机动作战的作用,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恳切地说:“望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可惜这一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在阐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时深刻指出:“因为中国并无侵略他国的野心,而完全处于被日寇侵略的地位,我们是为自己而抗战,所以战略上是防御的。”但若采取消极防御是不能打败敌人的,因为我们兵器远不如敌人,国防设施又极其微弱,因而应采取积极防御。应在运动中求得战机,以积极的战役和战术攻势行动打破敌人的进攻。“至若单纯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于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身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彭德怀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必要性、重要性进一步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规定我国在国防和军事上应当是战略防御的方针。但这种防御必须是积极的。就是“战争在爆发之前,我们要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敌人发动侵略战争后,我们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不但要在设防地区依托坚固的工事迟滞敌人的进攻,而且要“在战略部署上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能够在战役和战术上适时组织反攻和进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sup>①</sup>。

在战争进程中,如何正确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彭德怀认为,坚持积极防御,要求将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巧妙结合起来。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指出:“积极防御的要诀,在于乘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只有在运动中解决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目的的最好手段。”<sup>②</sup>1963年,他在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文选时,联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对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防御战中的进攻作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个作战指导原则,是辩证的指出防御与进攻两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89~590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方面的相互关系……防御是手段,进攻是目的,只有进攻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以很小的兵力牵制对方很大的兵力,适时转入外线,突然包围歼灭敌人一股,再歼另一股,达到各个击破敌军的进攻和‘围剿’,这是最积极的防御。”<sup>①</sup>

(二)持久战是中国革命战争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必由之路

战略上的持久战,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通过长期作战,逐步削弱敌人,转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最后赢得战争胜利的战略。毛泽东在阐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时曾深刻指出:“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sup>②</sup>彭德怀作为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的成员之一,不仅是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的忠实和创造性的执行者,而且也是这一战略思想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平江起义后,彭德怀在领导红五军和红三军团开辟和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就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有相当明确的认识,他多次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战略决策,同王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彭德怀对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更是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1937年11月,他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抨击了“弱国牺牲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论证了以持久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客观必然性及实行持久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战术。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2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彭德怀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制胜的战略,这是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全部因素决定的。他指出: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都远不如日本,拒敌于国门之外或一下子把敌人赶出去都是不可能的。“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是惟一正确的结论。因为只有在持久抗战中,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彭德怀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揭示了敌我强弱对比在持久战中演变趋势。从政治上看,向来被认为一盘散沙的民众,将在抗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反之,战争越持久,敌人内部的矛盾越加剧,军队士气越低落,人民的反战情绪越高涨,不啻于为自己挖掘坟墓。从经济上看,我国虽很不发达,但资源丰富,在持久战中我们的民族经济将得到发展,将树立国家的经济基础,我们有长期支持战争的能力。反之,我们的敌人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从军事上看,我们能从不断的教训中提高军队质量,加强战术素养,改善武器装备水平,我们的军事力量将不断增强,敌人的力量将不断减弱。从国际关系上看,敌人将遭到愈来愈多国家的反对,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国际地位每况愈下。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我们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总之,“从任何一方面看,我们只有而且能够从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的现势,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sup>①</sup>。

彭德怀在这篇文章中还进一步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六条战略战术原则:

第一 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进攻。彭德怀指出,持久战在战略上是防御的,但不是消极防御,而是以广泛的游击战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 ~ 38 页。

争调动敌人,分散敌人,使正规军得以采取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战术原则,主动出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第二,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彭德怀指出:由于在战争全局上的敌强我弱,所以战略方面,我们还是以弱抗强,然而在战役或战术方面,我们必须求得以强攻弱,即使是在战役上自己的力量小于敌人,也要求得从战术上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

第三,持久的消耗战。他指出: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在持久的消耗战中来解决的。消耗战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耗敌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战局的变化,改变敌我的形势。欲达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惟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的根据地,分散敌人力量。此外就是战役战术的灵活运用,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以战术胜利的发展,以求得战役胜利的展开,决不是同敌人对拼消耗。

第四,争取主动。他认为,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根据地,来分散敌人的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在战略上着眼争取主动造成战役上的各个击破,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战役战术上则应该以主力用于突击方面,以大步进退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第五,节约防御兵力。他指出,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其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同时控制强大预备队,适时实施反突击。

第六,统一指挥与机动。他强调,统一指挥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之一,整个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均须在统帅及战区高级指挥官总的意图下进行。但是不能因此而限制兵团指挥员的机动,相反,应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

彭德怀提出的敌我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强弱关系相互转化的论断及促进这种转化的战略战术思想,在以后毛泽东著

名的《论持久战》著作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

### 四、把握战略布势的关节点

谋划运筹的目的,在于主动创造一种有利于己的环境、格局和态势。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在于如何分布、使用自己的各种战争力量。因为在力量一定的情况下,由于它所处的空间、时间位置不同,而可使自身蕴含的能量发生倍增或衰减。如在战斗中双方都力争夺取制高点,就是因为处于高位势在对抗中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威力而又制约对方力量的发挥。这就是说,军事对抗不是交战双方实际力量的直接简单撞击,而是转化为势能后的功效比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力量在运动中要改变其形态。实际力量虽小,但处有很好的“位势”,所产生的力量会倍增;实际力量虽大,但占据的“位势”不利,只会产生小于原来力量的战斗力。因此把握战略布势的关节点,即占据对战略全局有利害关系的空间位置,把握对战争进程有决定性影响的有利战机,是战争指导至关重要的一环。彭德怀认为,把握战略布势的关节点,最集中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正确选择战略方向

战略方向是关系着战争全局胜负的作战方向。无论战略进攻还是战略防御,都有一个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选择问题。其正确与否,将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战争中的“一招不慎,全盘皆输”,集中地表现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因此彭德怀认为,战略谋划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正确的战略方向,战争指导者必须深思熟虑,务求透过复杂而多变的战争风云,找出利于争取战争全局主动的用兵方向。总体上说主要进攻方向应选在利于我一举突破、对战争进程能产生决定性的方向,主要防御方向则应选在对整个防御体系安危相关

的方向。选择战略方向的基本着眼点是：

第一,着眼于最有利于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实现以劣胜优。选择作战方向(地区),是对战争空间因素利用的一种形式,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目的有着直接的联系。任何一支军队无论就其实力还是战法上都会有其所长和所短,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而攻击敌人的短处,才能最有效地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长、短”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战地域、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选择作战方向,在一定意义上说,即是选择最有利于发挥自己长处之地域和环境。彭德怀认为,在敌占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依托根据地与巩固的后方作战,是取得作战主动权的重要条件。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前夕,在中央红军中发生过一场战略方向的争论,即是红军去进攻长沙、南昌等大城市,还是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根据地来打,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主张,表现出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已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着眼于避实就虚,以打乱敌之战略企图,改善和转换战场形势。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敌人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这种情况下,彭德怀致电中央,提出了一个极具远见的具体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sup>①</sup>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分析当时应采取作战方针时指出“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

<sup>①</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为战略进攻 威胁敌之根本重地 ,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 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 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 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 ,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 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sup>①</sup>可见彭德怀的主张与毛泽东的见解完全一致 ;可惜这个正确战略出击方向的建议不仅没有被采纳 ,还被斥为“脱离中央苏区的冒险主义”。结果使蒋介石得以分而治之 ,先镇压了福建事变 ,回过头来再调集重兵“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 ,最终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完全丧失 ,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第三 ,着眼于占领和坚守战略要点。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中 ,在战略区域内 ,都存在若干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地点。在战略进攻中 ,它表现为我之最有利的进攻出发地域和敌之最薄弱而又最核心的防御地带 ;在战略防御中 ,它表现为关系安危 ,能控制敌人主要进攻方向的地域。战略要点的得失 ,往往关系到战略布势的成败。清楚地认识战略要点所在 ,先于敌人占领它或从敌人手中夺取它 ,并尽最大的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是任何一个具有战略头脑的战争指导者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中 ,八路军之所以能在华北敌后开辟战场 ,不断扩大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 ,就是因为朱德、彭德怀早在抗战之初即着眼于敌后战略要点的夺占。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共重建了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与国民党军共同对日作战。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 ,中共中央决定只以少数兵力驻守陕甘宁边区 ,主力开赴晋绥前线 ,和国民党军共同支持华北 ,万一国民党军放弃黄河以北 ,红军仍要拖住日军 ,坚持华北抗战。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36页。



彭德怀,思考着如何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打开局面。出师之初,他在提出并组织八路军配合山西友军侧击平型关之敌的同时,同朱德一道,在五台山地区实地考察。1937年9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建议:“河北涞源,山西灵丘、广灵地区山脉很大,地形比晋西北好,人口不少,粮食不缺。可在上述地区连同浑源、繁峙、五台、盂县、河北阜平一带创建根据地,与晋西北相呼应。这无论对现在和长远来说,都是上策。”<sup>①</sup>朱、彭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央的赞同。一个月以后,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敌后第一个抗日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在这个地区诞生,它在战争实践中的作用正如朱、彭所预见的那样,成为华北敌后战场一个主要的支柱。

1938年2月初,日军从太原沿同蒲线两侧大举南下,同时又以大迂回的战术,用平汉路的第一军第一〇八师自邯(郸)长(治)路直趋临汾,企图打通同蒲线夺取风陵渡,逼中国军队渡过黄河。面对敌人的三面进攻,朱德、彭德怀又作出一个极具战略胆识的重大决策——八路军总部向晋东南敌人后方挺进。指挥中国军队利用太行天险,建立新的抗日支点。这一举动使日军惊恐不已,即调集重兵3万余人分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可在朱德、彭德怀的精心对应下,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歼敌4000多人,收复县城18座。将敌人赶出了晋东南。此后,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行山脉为依托,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也一直转驻于晋东南太行山上,指挥整个华北敌后抗战,直到胜利。

## (二)适时实施战略转折

战略转折是战局发展中由一阶段转变为另一阶段的战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略步骤。适时正确地实行战略转折是战争指导中的重要环节。它是建立在对战争力量对比变化的判断、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时机的把握等综合权衡谋划基础之上的。彭德怀认为,对战略转折的筹划和决断,既需要有对战争全局的发展状况、趋势的深刻了解及时机成熟时的果敢决断,更需要有为实施转折提前“埋下伏笔”的预谋和远见。

第一,善于预见可能出现的转折,努力为其创造条件。任何一场战争的战略转折都是其敌对双方战争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能否从其趋势中预见到战略转折,并以自己的主观努力促成其转变的实现,是在战略转折上争取主动,趋利避害的前提条件。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根本转折点。这一伟大的战略转折对于从根本上确立我军的战略主动权,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驾驭这一战略转折的主要决策者是毛泽东,其时作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也为这一决策的形成及实现作出过极其重要贡献。早在1946年11月,彭德怀就开始考虑战略出击经略中原的问题,11月3日,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薄一波、王宏坤、杨立三并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中即指出:“来年春或初夏向中原出击,须多预先筹备经费,主要是衣服、油、盐、小菜钱。你们可否筹十万至十五万兵一年的上述经费?”1947年1月12日,在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根据现在情势,打退敌战略进攻和自己的必要准备,战略出击须在今年六月或再迟一点,但各项准备工作即须分别轻重缓急开始进行。”<sup>①</sup>并从提高地方兵团战斗力使之脱离地方性升级为野战兵团,粮食准备和弹药准备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见。后来出击中原的历史性转折表明,彭德怀在推进战略转折的造诣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第二,把握战争进程中开始出现的转折,适时进行战略指导上的转变。当着转折时机已经来临或转折已经开始的时候,能否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则是正确实现战略转变的关键。彭德怀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中,充分表现出了他在战略转变上英明与正确。战争第一阶段,由于志愿军入朝后所面临的敌情与出国前所预计的有很大的变化,彭德怀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而果断地修正了原来组织防御的计划,改取以进攻为主要特征的运动战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积极寻找战机,连续进行了五次攻势作战,将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根据战争已转入相持、敌人表示愿意停战谈判的情况,将战略方针适时地由战略性的反攻转到“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由以运动战为主转到打阵地战为主。在决定战与和的关键时刻,采取坚决的战略措施,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和战后的相对稳定。即在敌人叫嚣扩大战争,准备进行侧后冒险登陆的时候,指挥志愿军全力以赴进行反登陆准备,得以不战而胜,打破了敌人的冒险计划。在停战协议即将签字,而李承晚集团在释放战俘问题破坏协议的时候,彭德怀向中央建议推迟签字,发起金城战役,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从而胜利地保证了有效的停战和战后相对稳定的局面。

第三,以关键性战役的胜利来促进战略转折的实现。在战争进程中,交战双方的战略企图都是通过一系列的战役行动来实现的。而持续不断、不同规模的战役作战,不断地改变着双方的力量对比,到了某种程度,一次或几次重要的或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往往会成为战略上的转折点。因此,当战局发展此种态势时,战略指导者应集中全力,筹划和组

织这种具有战略转折性质的战役,将战略转折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如1947年8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撤围榆林后,刘戡、钟松两部敌军南北对进,相距只有百里左右,如南北之敌会合,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将被敌挤在佳县、米脂、榆林三县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内。然而,正是在这种严峻时刻,彭德怀却看到实现战略转折的时机。他分析认为,只要在钟松与刘戡会合之前,集中我之主力将钟松的三十六师吃掉,不但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可以脱离险境,而且可以实现我之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转变。因此彭德怀将这一仗称之为“陕北战局的转折点”。为此他向西北野战军部队发出了歼灭敌三十六师的动员令,指出:“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正如彭德怀所判断的一样,当8月20日彭德怀指挥我军在沙家店全歼三十六师之后,整个陕北的军事形势为之改观。为陈(庚)、谢(富治)集团渡河南进创造了条件,我军开始内线反攻,敌人则开始走下坡路。8月22日,陈、谢集团相机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转战豫陕鄂边地区。8月26日,绥德以北地区敌军主力开始南撤。毛泽东高度评价沙家店战役的意义,他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说,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实现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转折。”

### (三)建立正确的战略联盟

在战略布势中,选择和争取最佳的联盟对象,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有着极为重要意义。彭德怀指出:“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这对于革命是有决定的意义的。”<sup>①</sup>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第一 注意研究敌人营垒中矛盾与斗争 ,从中选择与争取同盟军。彭德怀认为分化敌人力量与扩大自己力量 ,是建立战略联盟的根本目的。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 ,从敌人的营垒中寻找可能分化的对象与之达成同盟 ,化敌为友 ,常常是改变不利战略态势的关键之着。对于这一点 ,彭德怀早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就表现出了超人的远见卓识。如 1933 年 ,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东征时 ,其对手是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十九路军系由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扩编而成 ,“九·一八”事变后 ,调赴上海执行卫戍任务。1932 年 1 月 28 日 ,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 ,奋起抗战一月余 ,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当年底 ,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与红军作战 ,以实现其既消灭红军 ,又削弱内部主张抗日势力的目的。彭德怀分析认为 ,十九路军存在着成为红军同盟军的可能性 ,因此主动开展了对十九路军的争取工作。《彭德怀自述》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们在闽西行动时 ,对他们是有争取也有批评。说他们抗日是对的 ,来闽‘剿共’是错误的 ,也是蒋介石的阴谋 ,——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 ,对蒋介石都有利。”<sup>①</sup>十九路军在与彭德怀的东方军交战时连吃败仗 ,也寻求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 ,彭德怀又亲自和十九路军派来的代表谈判 ,并给蒋、蔡写了亲笔信对他们的主张表示欢迎。请他们派代表直接同中央谈判。1933 年 10 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11 月 20 日 ,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 ,宣布脱离国民党 ,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树立反蒋的旗帜。福建事变后 ,蒋介石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和浙江地区抽调 10 万余人 ,分几路从苏区边沿通过进攻十

<sup>①</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82 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九路军。这是红军联合十九路军截敌歼击,以打破敌第五次“围剿”的最好时机。彭德怀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力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认为:“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我们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sup>①</sup>针对中央“左倾”领导者反对与十九路军联盟的观点,彭德怀强调指出,如果“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就失去了依托,政治上就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sup>②</sup>。但中央“左倾”领导者否认“福建事变”积极意义,不愿派红军支持十九路军。使红军失去了一个最有力量的同盟军,陷入孤军作战,以至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时机。

第二,依据不同阶段对敌斗争的主要矛盾,积极主动地促成统一战线的实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我军能否与别的军事力量结成军事上的联盟,取决于是否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因此,只有依据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并由此产生的对敌斗争的主要矛盾,对国内外各种军事政治力量在斗争所处的地位作出正确的分析,才能认清战略上的同盟者,并努力促成与其实现战略上联盟。如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同盟者,并推动整个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就成为可能。彭德怀认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红军重要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任务一样重要”,“统一战线工作是为着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使民族革命战争组织与行动起来,达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实现”<sup>③</sup>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彭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②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德怀积极贯彻中共建立全国统一战线的方针,全力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和彭德怀共同署名发表《告围攻陕甘宁苏区各部队长官与士兵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红军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彭德怀还亲自对东北军进行联合抗日的动员工作。红军在与东北军六十七军作战中俘虏了一一〇师的一个主力团团团长高福源。高原系北京大学的学生,当过张学良的卫队长,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受张的信任。彭德怀决定以做好高的工作为突破口推动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多次找高谈话说明红军抗日救国的诚意,请高观看红军演出抗日节目。还派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做高的工作,使高对红军心悦诚服。在此基础上,将高送回东北军,让高去做张学良和其他高级将领的工作。1936年1月16日,彭德怀派李克农同高一起会见了张学良,第一次会谈便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此后又与前线对阵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达成口头协议,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对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线,在防区恢复通商关系,彼此负有保护责任,为中共领导人与张学良就抗日救国大计进一步会谈创造了条件。4月9日,周恩来赴延安与张进行了著名的肤施(延安)会谈,双方对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所有这些对于促使张学良采取劝蒋抗日、以后发展到逼蒋抗日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 积极主动与盟军协调战略作战思想与作战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联盟战略的作用。首先是要采取各种手段向友军宣传我之战略战术思想与作战方针,为双方的协同作战奠定基础。在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利用与上至蒋介石、下至国民党军基层官兵接触的一切机会,宣传阐释持久战战略方针和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思想。彭德怀作为第二战区东路军的副总指挥,除指挥八路军外,还指挥着十几个师的国

民党军队。针对国民党将领从没有打无后方的游击战争,对敌后游击战争十分惶恐的情况,1938年3月24日,朱德、彭德怀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第三军军长曾万钟等高级将领,阎锡山、卫立煌的代表,蒋介石的联络参谋,与八路军的将领一起参加了会议。会上彭德怀作了关于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总结了太原、南京沦陷的教训,阐述新的作战原则:实行战略上的防御战,战术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消耗战,战术上的速决战与歼灭战,运用运动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发展游击战以造成我基干军队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机会。并深入讲解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与会国民党将领都感到受益匪浅,经过会议的热烈讨论,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作战纲领报告,划定了各军、师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协同打通了后方交通线。会后应友军的邀请,八路军总部由左权副参谋长主持为友军办了游击训练班,朱德、彭德怀、左权都亲自给训练班授课。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是一次以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后联合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奠定了基础。

### 五、时变法移

战争是人类社会最为剧烈的活力对抗,多变则是活力对抗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动之中,但战争进程的敌我力量对比、战法和战局的变化,不仅比一般事物的变化更急速、更突出,而且更难把握。从一定意义上说,谁能更好更快地把握和适应这种变化,谁就可以驾驭战争的进程。这就要求包括战略谋划在内的一切谋略思考,



都要以对手的转移为转移,以时间的转移为转移,以条件的转移为转移,以地点的转移为转移。即便是自己过去成功的战略方针和战法,也要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古人云:“兵形似水,水无常势,兵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彭德怀在战争指导中,无论是战略谋划还是战役战斗的指挥,都极为强调“时变法移”,他在论述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时说:“指挥员必须从死背操典中解放出来,必须认真从当前的具体环境里,从中日战争的规律性里,研究出真正主动灵活的抗日战略战术来。”<sup>①</sup>他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其精要正在于此。

#### (一)因敌而变

彭德怀历来强调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激烈角逐的战场上,对阵的双方都是根据对手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作战方针的。对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战略和策略,当对手的实力和作战指导发生变化之时,也要随之改变自己的对应之策。

长达20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宏伟的战争,在不同的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有着明显的不同,原因很多,但首要的是作战对象的变化。彭德怀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的各个革命战争阶段,都负有战略指导的重任,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研究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手段,亦是彭德怀战略谋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他在论述我军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转变时指出,我军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集中统一指挥的运动战,转变为分散的游击战,从战争形式来看,是降了级的。没有这种形式的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改变,就不可能适应敌后形势的发展”<sup>①</sup>。原因何在?1942年他在《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一文中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今天我们是处在敌后,敌人武装力量的顽强,是超过中央第五次围剿时的敌人的。那时阶级敌人的军队,武装配备虽也是现代化的,但士兵在政治上的顽强性,则远不如日本士兵。苏区时期敌军的许多士兵同情土地革命;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则受武士道的麻醉相当深。”<sup>②</sup>用基本的游击战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代替内战时的旧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坚决地实行了这一转变,敌后抗日根据地才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使之成为团结人民赢得抗日战争中胜利的希望所在。

在敌实施战略进攻、沿交通线长驱直入时,彭德怀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在敌翼侧和后方以伏击和袭击的形式,歼灭运动之敌,切断敌后方补给线,配合正面防御作战。当敌为解除后顾之忧,对我初创根据地实施多路围攻时,朱、彭则采取内外线结合,以内线歼敌为主的作战方针,即以一部兵力于内线消耗、疲惫和牵制敌人,为主力机动歼敌创造条件;主力则转移到围攻之敌侧后隐蔽待机,尔后抓住其孤立突出、疲惫沮丧的一路,予以歼灭或歼灭性的打击,再转移兵力击破其他各路,以粉碎敌之围攻。当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由战略进攻转为以保守其占领区为主,并企图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对我根据地由过去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围攻,变为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圈、然后分割清剿的“扫荡”时,彭德怀则将以内线歼敌为主,转为以外线歼敌为主,即在敌分进合击逐步推进时,主力适时转入外线对“扫荡”之敌的后方交通线及据点展开积极的广泛的攻势,迫使进入我根据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5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

地之敌回援,从而粉碎敌之“扫荡”。当敌利用点线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实行“囚笼”政策时,彭德怀则指挥八路军对敌占交通线发动不同规模的交通破袭战,以打破敌之分割封锁和变线的占领为“面”的占领的企图。在战略相持阶段中期,敌为巩固其占领区,使之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我根据地采取了“铁壁合围”、“辗转抉剔”、“拉网式扫荡”,并配合以“蚕食”、“治安强化运动”。对此,彭德怀对策是:在敌展开合围时,采取“化整为零”,以分散对敌之集中,避敌锐势,保存力量;在敌分兵进行“辗转抉剔”时,则“化零为整”以集中对敌之分散,给敌以有利打击,挫败其“扫荡”。尤其是针对敌之“蚕食”与“强化治安”,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派出大量的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把斗争的焦点引向敌占区,变敌之后方为前线,变我之被动为主动,从而有效地挫败了敌人企图,扭转了根据地退缩的局面。在战略相持阶段后期,当敌人取守势时,彭德怀则指挥八路军转为主动地、有计划地对敌展开攻势作战,广泛采取围困战的形式,迫敌撤退,并在其撤退时歼灭之;同时集中较大兵力,对边沿区敌之城镇据点展开攻势,以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正是因为彭德怀善于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总方针,依据敌后游击战争形势的发展,敌变我变,才使八路军和根据地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壮大。

### (二)因势而变

彭德怀认为,任何高明的军事家,在战前对战争发展态势的分析都只能是较为原则抽象的,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方针、战役乃至战斗的决策,不完全适合实际情况在所难免。战争指导者的高下之分,不仅在于对战争进程的预见性,而且在于战争进程中的应变能力。这就是说战争指导者必须清楚认识和把握战局发展的客观情况,并适时调整自己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彭德怀强调指出:“当时情况确实有了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改变,也就要改变自己的部署,部分的改变,甚至全部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切不可固守陈规,企图侥幸。也不要误虚为实,自失战机。”<sup>①</sup>在彭德怀参与指导和直接指挥的战争中,无不体现着因势而变的战争艺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

抗美援朝战争面临着与国内战争相比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况和战前难以预料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战场的主动权,更依赖于因势而变的高超艺术。

志愿军入朝前,中央军委为志愿军确定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实行阵地战,即先敌赶到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组织阵地防御,稳定战局;“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优势条件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sup>②</sup>可是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敌已先进占了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据此彭德怀果断决定放弃原定作战方针,决心以运动战歼灭冒进之敌。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目前美伪军北犯中,所遭人民军抵抗甚微,仍无顾忌地分途北进中,……敌在未发觉我行动前,将仍会向北冒进,因而我军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是可能的。”提出了改守为攻,即以进攻为主要特征的运动战方针。彭德怀的这一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志愿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连续进行了5次以运动战为主的战役,以积极的攻势行动,将敌人一直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当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敌人表示愿意举行和平谈判的情况下,彭德怀又适时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院1993年版,第122页。

略方针,志愿军由战略性反攻转入“积极防御”,从以运动战为主转到以阵地战为主。在策略上则采取打谈结合,以战促和。正是由于适时实行了上述转变,才使志愿军愈战愈强,不但粉碎了敌人的一系列局部进攻,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还使我军有了巩固的后方,增强了现代化战争的作战技能。

### (三)因地而变

军事对抗对自然地理条件有很大的依赖性。不同的地理条件,对军队的作战行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彭德怀十分强调有什么地形打什么仗。并认为研究地形特点,不仅是战役、战斗计划中的重要一环,更为重要的是在战略谋划时,要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思考对策,制定因地制宜的作战方针。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提出的许多新战略战术原则,充分反映了因地而变的思想。

早在志愿军入朝前夕,彭德怀就根据朝鲜是一个狭长半岛,三面濒海,北部多山,回旋余地小,不便于大部队行动的特点,提出了运动与阵地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彭德怀指出:“因为朝鲜地面狭小,敌人暂时还占有某些优势,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配合。”<sup>①</sup>在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在西线实施进攻时,在东线即实施了防御。在第四、五次战役中,志愿军也均将运动战和阵地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种方式的配合,为运动战阶段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着眼于朝鲜的地形特点,彭德怀还提出了在运动战中保持战线的稳定和连续的问题。在过去国内战争中,我军以流动性作为组织运动战的重要手段,通过机动调动敌人来创造战机,因而战线很不固定。可是朝鲜战区地域狭窄,使我军无法在敌人腹地开辟战场。同时我军主要靠徒步运动,机动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力远不如敌人。因此彭德怀指出：“根据敌情和地形条件，过去我所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不一定适合于朝鲜战场。”<sup>①</sup>从第三次战役起，志愿军改变了无固定战线的大步进退方式，进行运动战时也保持一条战线。在进攻时，依托这条战线进行准备；在防御时，依托这条战线节节抗击。创造了有限地域条件下运动战的新理论。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24 页。

## 第七章 相反相成

### ——武装活力对抗中的辩证关系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结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毛泽东

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活力对抗:体育场上的竞技、经济领域内的竞争、政治舞台上的搏击……,战争,是人类社会所有活力对抗中最激烈、最残酷、最惊心动魄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活力对抗,是两个武装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在这种武装活力的对抗中,双方都以消灭、战胜对方,或迫使对方就范,服从自己的意志为目的。构成战争力量的各种要素——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等等方面在这种对抗中相互作用,呈现出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局面和态势。彭德怀认为军事指挥员要驾驭战争,就必须懂得军事对抗中各种力量使用的艺术,而这种艺术又是以准确把握力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为前提的。

#### 一、优势与劣势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是战争胜负的基础。战争的运动发展及一切变化,都是战争力量诸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因素相互作用及由此决定的战争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彭德怀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战争进程中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的判断,特别强调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认识敌我双方的优与劣,特别善于创造由弱变强、以劣胜优的条件和战机。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战争力量优势与劣势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和驾驭之上的。

(一)战争力量的优劣决定着交战双方在战争中的地位及其战略战术

战争力量的优劣即敌我双方战争力量诸因素综合对比的差异性。战争中,双方战争力量的综合比较,总是表现出一方强一方弱,或暂时处于平衡。正是这种力量的对比决定着战争态势。

战争力量的优劣是决定交战双方在战争中的主动或被动地位的物质基础。彭德怀指出:“战争双方兵力优势或劣势,是决定主动和被动的客观物质基础。”<sup>①</sup>在战争全局上,战争力量优势的一方,一般占有主动地位,而劣势的一方,则处于被动地位。前者往往采取战略上进攻,后者往往采取战略上的防御。这种战略态势与战争指导有关,但主要是战争力量的强弱决定的。彭德怀在《关于作战指导原则》一文中分析指出:土地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在半年时间内对红军能够举行三次大规模的‘围剿’,这是因为他在各个方面——兵力、人力、物力、财力都占有优势。”<sup>②</sup>

战争力量的优劣是决定交战双方作战形式的根本因素。战争的基本形式是进攻和防御。在战争中,交战双方的进攻或防御,也主要是由战争力量的强弱决定的。古代军事家孙子指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就是说,在力量上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2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2页。



不能胜过对方时则可防守,在力量上胜过敌人时则可进攻。战略上如此,战役战斗也是如此。战役战斗中,力量弱于对方的进攻,只能是失败。因此彭德怀强调:“在战役或战术方面,我们必须求得以强攻弱。”<sup>①</sup>在作战样式上,是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还是阵地战,在作战时间上,是采取速决战还是持久战,在作战效果上,是歼灭战还是击溃战,这虽与作战指导有关,但就其根本原因来说,仍是由双方战争力量的对比决定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彭德怀指出,由于红军的力量太弱小,不具备打运动战、阵地战的实力,因此“盘旋式游击”是“红军惟一良好的”作战样式。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在论述抗战为什么只能实行持久战时指出:“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在这样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人于国门以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其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惟一正确的公论了。”<sup>②</sup>他在论述抗日敌后战场作战的基本样式时指出:“由于战斗力上的敌强我弱,产生了战争的游击性与根据地的游击性”<sup>③</sup>从主观上说,我们是多想争取一些运动战的歼敌机会,但“由于敌我装备悬殊,敌寇广泛采用堡垒主义,……因此运动战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已不可能,游击战的比重大大增加,普遍的游击战已成为敌后最基本的战争形式。”

战争力量的强弱,是作战双方确定其战略战术运用的基本依据。战争中交战双方战略战术的确定和运用,从表面上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0 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 ~ 35 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9 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看完全是战争指导者主观意志的体现,但任何主观意志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在作战中,指挥员之所以采用某种战略战术,其基本的依据是敌我双方的战争力量的强弱对比。凡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都是正确分析估量当时敌我战争力量对比的结果,反之,错误的战略战术,大都源于对当时双方战争力量对比判断的失误。如大踏步地进退,是我军国内作战中实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成功经验。而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的一至五次战役中,则均只作相应的有限进退,对败退之敌不作深远追击。这一作战方针的决策者彭德怀指出:“在朝鲜战场敌有大量飞机、坦克和美英军的机械化部队,而我无飞机和战车的配合作战,只靠徒步追击实有困难,追击效果亦不大。”<sup>①</sup>同时敌军凭借强大的空军和海军,不但对我战场后勤保障造成极大困难,我军每次战役进攻,都靠自带粮弹,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而存在着敌在我后方海上登陆及空降的可能。“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恢复部队体力、巩固海岸防务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我们没有采取猛追和连续进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sup>②</sup>。

### (二)优势与劣势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的优势和劣势,同其他任何事物矛盾性质一样,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彭德怀指出,战争指导者对敌我力量对比优劣既要有总体上的估量,又要作具体的分析,特别“必须清楚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战争过程中“是必然会变动的”<sup>③</sup>。这是因为,综合力量的优势不等于一切方面均占优势,具有现实的优势不一定具有潜在的优势,在战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略全局上占有优势不等于每个战区、战役都占有优势,弱军亦存在优于敌人的方面。彭德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对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历来坚持两点论,既看到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去研究和指导战争,保持清醒的头脑;又看到敌人强中有弱,我军弱中有强,努力实现强弱转化。

1941年彭德怀在分析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力量的对比时指出,一方面,敌人在总体上是占优势的。经济力量:华北人口,我占四分之一,敌占四分之三。华北面积,乡村我占十分之六,敌占十分之四,城市我占百分之二(华北四百三十七座县城我占十个)敌占百分之九十八。我占区贫穷,敌占区富庶,人烟也较稠密。军事力量:敌华北有九个师团另十四个独立旅团,计32.5万人,此外还有伪军11.7万人。我之兵力与敌数量大致相等,但由于技术装备极不相称,因此在战斗力上表现为敌强我弱。这种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还不易迅速改变,在一定阶段之中,敌占区面积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产生了今后必然遇到的更大的人力物力的困难。

另一方面,我也存在着“胜利地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条件”。国际形势于我们有利:“目前已经没有‘东方慕尼黑’”,“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正在严重的发展着,美国援华较前积极”,日本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地理环境对我有利:“敌后根据地的地区广大,各根据地可以互相配合”,“华北有利山地大部为我控制,敌人兵力始终不敷分配”。政治上于我有利:“全国配合作战,中国抗战阵容之各组成部分,在抗战积极程度上虽不能一致”,“但全国基本的抗战形势却是不会变更的”,“民族革命战争有广大的民族社会基础,敌虽控制主要人口,但这只是军事上的、形式上的控制,敌占区绝大多数人民是拥护抗战,反对日寇的”,“有共产党、八路军成为团聚人民的核心,有我党正确政策的领导”。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从总的方面看,敌在目前虽占优势,但仅是相对的优势,并非绝对的优势。即此相对的优势,亦仅是军事上及经济上的优势,而在政治上,在国际形势上,在得人民的拥护上,我们均占优势。”

即使是军事上的优势,也只是从总体上说的。敌人的兵力有限,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能集中兵力对我某一个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扫荡”,在这里我军力量处于劣势,而其他根据地,则敌军的力量就相对减弱,只能防守其要点而无机动兵力,我在兵力上就能处于优势。在这些地区我就可以优势兵力对其后方交通线、据点实施进攻。通过长期的消耗敌人和发展壮大自己,敌强我弱的形势就会逐渐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最终我将在综合力量获得优势而战胜敌人。

### (三)运用强胜弱败的规律,实现以弱胜强的目的

在战争中,强胜弱败,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以弱胜强,不是对这一规律的否定,而运用这一规律,在总体弱势的情况下,通过局部以强胜弱的积累,逐步在总体上取得优势,以最终战胜敌人。就其战争开始的力量对比与结束胜负来说,是以弱胜强,而就其每一次战役、战斗以及最后的力量对比来说,却是以强胜弱。

第一,扬长避短,以长击短。由于强军不是一切方面都强,弱军不是一切方面都弱,而是强中有弱,弱中有强这就为弱者辩证地运用强胜弱败规律,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实现的基本手段即是扬长避短,以长击短。

在战争全局上的扬长避短,主要是发扬和发掘我在战争力量诸因素的比较中,优于敌军的因素,以确定促进强弱转化、实现以劣胜优的战略。在任何一次反抗阶级压迫的国内革命与反对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的军队在综合力量的对比中一开始总是处于劣势,然而亦

有自己的优势。如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敌拥有军事力量的优势,而我拥有人民群众支持这一人心对比的优势,实行人民战争,就可以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敌拥有现实的军事优势,而我之战争潜力则比敌人深厚,实行持久战战略,就可以在我之战争潜力不断发挥的过程中“改变强弱现势”,最终战胜敌人。

在每一个战役、战斗中的扬长避短,则主要着眼于采取适合我军装备技术水平特点的战术。因为任何一种具体优势与劣势的本身,同样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也就是说,每一个强的因素之中,亦包含着其对立的否定因素。如军队的机械化程度高,占有火力、突击力、防护力、机动力强的优势,但它同时存在着目标大、消耗大、后方补给难度大和对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大的弱点。而无重型装备的部队虽火力、突击力、防护力等方面处于劣势,但它有行动灵活、对地形、气候条件适应性强,对后方勤务保障依赖性小的优势。对自己的优势运用得当,同样可以达到以弱击强的目的。彭德怀在分析八路军同日军作战的战术时指出:“敌人的长处,主要是技术的优良,我亦避其长而攻其短,如深入敌人后方或远后方,在不意的方面突然施以猛击,一开始就求得白刃战,是避开敌人技术优势的最好办法。”<sup>①</sup>彭德怀在敌后抗战中,正是以这种战术与敌军作战,使八路军由弱变强,使敌后战场成为抗击1/2以上的日军、2/3以上伪军的重要战场,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对手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美军,敌我技术装备的差距更为悬殊。对此彭德怀指出:“对敌军的装备优势应该如何估计,如何对付?三次战役的经验证明,敌军的装备虽占优势,但只要我军依靠灵活的战役指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挥和勇敢顽强的步兵作战相结合,是可以胜利的。”<sup>①</sup>为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彭德怀十分重视近战、夜战和断敌退路。在第一次战役我军与敌初次交锋之后,他及时总结经验,分析敌人的长处和短处指出:敌人“怕近战、夜战和切断后路……应该发扬勇猛精神,迅速捕捉战机,敢于断敌后路,敢于逼近敌人。”随后,他又指出:“敌人离开了飞机大炮,攻不能攻,守不能守,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夜间,实行大胆迂回包围穿插作战是可以歼灭敌人的。”近战夜战可以大大限制敌人飞机大炮的作用。在五次战役中,彭德怀为充分发挥我军善于夜战的优势,进攻时通常是白天准备,黄昏出动,夜间攻击,拂晓前基本解决战斗。每个战役,一般利用一两个夜间,从战役上实行大胆穿插迂回包围,割裂敌战役布势后,再用几个夜间在战术上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完成战役任务。如第一次战役中的云山战斗,我三十九军于11月1日17时发起进攻,激战至2日凌晨,攻占云山,歼灭美伪军各一部,并在云山以南堵住由云山撤退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直属队及其第三营的退路,将其压缩包围于诸仁桥地区。2日至3日昼间将该敌围住不使其突围。3日夜,我再次进攻,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彭德怀针对敌人机械化程度高,对道路和后方依赖性大的情况,十分强调迂回、断敌退路。五次战役均派主力部队穿插迂回至敌后方,从根本上动摇敌之战役部署,以达成歼灭敌人的战役目的。

第二,在全局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争取局部优势。可以说,战略上的以劣胜优,是通过战役、战斗中的以强胜弱来实现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强弱的转化。如就战争中的兵力而言,在全局上优劣,这是一时难以改变的,但在全局处于劣势兵力的情况下,通过灵活的兵力机动,在决定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性的时间和地点,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以造成局部上的相对优势,则是能够做到的。彭德怀指出:“怎样才能实现以强攻弱的原则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假设敌我都是四百人作战,这是相等的兵力,我们应该采取进攻的战术,以小部(百人)向敌人积极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应战,我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假设首先消灭了敌人一百人,敌已由均势变为劣势,则我集四百人再以同样的手段,最后解决敌人。如此,虽相等兵力作战,我仍维持战术上的优势。”<sup>①</sup>如1947年的陕北战场上,敌我兵力之比是10※1,我处于绝对劣势。而在彭德怀发动的每次战役中,均形成了3倍以上于敌的兵力优势。如三战三捷的青化砭战役,彭德怀以2个纵队、2个旅伏击敌1个旅直属队及1个团,兵力对比是5※1;羊马河战役以1个纵队、2个旅(共4个旅)伏击敌之一个旅,兵力对比是4※1。在蟠龙攻坚战中,亦是以2个纵队2个旅攻歼其1个旅的守敌。正是因为成功地实现了由全局上的劣势向局部优势的转化,才创造了以2万兵力战胜敌之20万大军的奇迹。

第三,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彭德怀指出:“如能经常保持主动,虽劣势之兵力,亦能战胜强敌。这样的例子在中外的历史中不胜枚举。”<sup>②</sup>战争力量的优势,是争取主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的现实,要把主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经过人的努力。主观指导上的正确与否,是主动与被动的决定因素。毛泽东曾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sup>①</sup>作为战略处于劣势的军队,以劣胜优,必须经历一个由被动转变为主动的过程。

彭德怀认为,在劣势情况下争取主动,是一件难事,但只要主观指导的正确,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在论述争取抗日战争主动权时指出“我们怎样争取抗日战争的主动呢?……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的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在战略上着眼争取主动,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目前指挥作战的方针,在使用兵力上,主力应用在主要战区与利于反攻的方面。在战役战术上,主力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作用于防御与钳制方面。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为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作战计划,争取主动”<sup>②</sup>。这就是说,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是靠战役战斗的优势和主动来改变的。因为在战略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存在着获得战役战斗上优势的可能性,这就为变被动为主动提供了可能性。而通过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从而摆脱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

### 二、全局和局部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和局部。全局和局部,是标志着战争的整体和部分的一对范畴,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驾驭战争、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彭德怀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既善于着眼全局,争取总体上的主动与优势,又善于从局部突破,用一个个局部的胜利去实现最终解决战争总目标。

#### (一)战争是局部与全局的对立统一

战争的全局与局部,从横的方面看全局是战争的各个方面或各个部分的总和,各个方面或各个部分就是局部;从纵的方面看,全局是指战争的全过程,包括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各个阶段对全局来说就是局部。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脱离局部而独立存在的全局是没有的,局部隶属于全局,局部也不能脱离全局而独立存在。

战争中的局部和全局具有相对性。它们的界限在特定范围内是确定的,全局就是全局,局部就是局部,不能混为一谈。但在一定范围内的全局,在更大的范围内则是局部,反之,一定范围内是局部,在更小的范围内则是全局。如世界性的联盟战争,这是最高一层的全局,各国战场是局部;如一国的战场作为全局,那么各战区、战役又是局部。一次战斗,也可以作为一个全局,构成战斗具体作战行动和单兵就是局部。因此,除了最高层次的全局不能转化为局部和最低层次的局部不能转化为全局之外,中间层次的全局和局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战争全局对局部起着支配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们之间是统帅和隶属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全局决定局部的地位和作用、全局规定局部的任务和行动、全局的主动和被动从根本上影响局部的主动和被动。局部作为战争全局的一个部分或一个阶段,受全局的支配,但它本身并不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而总是以自己的活动方式和效果,积极影响和反作用于全局。首先,局部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局的强弱。如战争中各级指挥员的素质,只是战争全局中的一个因素,是局部,然而这个局部的强弱,对全局强弱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当局部变化达到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全局的变化。彭德怀在论述每一个战斗与解放大西北这个全局的关系时指出:“要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要一点一点地积蓄力量。要解放大西北,就要先从一个村、一个乡做起,然后才能扩大到东府、西府,到全陕西。”<sup>①</sup>再次,关键性的局部对全局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战争要点的得失、战略方向的选择等等,都对战争全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二)着眼全局,驾驭战争的进程

毛泽东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sup>②</sup>人类战争的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战争全局关照得好,战略指导正确,战争就一定取得胜利,如果对全局关照不好,产生战略指导上的失误,就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彭德怀之所以能在战争舞台上导演出许多至今仍令人拍案叫绝的活剧来,善于从全局出发筹划和指导战争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一,善于从全局出发确定战争行动。彭德怀认为必须首先对战争的全局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然后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防则防,当攻则攻。”<sup>③</sup>如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出兵朝鲜,并侵占我国台湾。我国要不要出兵参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当时中共政治局在讨论这一决策时,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其主要考虑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还都不能和美国抗衡,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彭德怀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认为,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出兵朝鲜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如果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反动派的气焰就会高涨起来,亲美派就会更加活跃。如果让美帝占领了朝鲜,对我们就是一个直接威胁,他就会把兵力转向越南、缅甸,到处搞鬼,我国就将陷于被动,国防、边防都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如果我们不及时给他以打击,好些动摇的国家和阶层就会倒向美帝国主义方面去。同时他从全局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时指出,美军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他战线太长,从柏林到朝鲜,侵略兵力有限,“这个力量我们是能抵抗得住的”,美空军、坦克和炮兵占优势,“这是敌人比我们强的地方”,“但在战术方面我们就比敌人强,坚决勇敢,敢于近战,用炸药,拼刺刀,投手榴弹,这些都是敌人害怕的”,美军“远涉重洋作战,补给运输困难,来回一次,即需三十八天”,美军进行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人民反对,兵心厌战”,“我们是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是正义的战争,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援助”<sup>①</sup>。因此从全局上看,我们不但应该积极出兵,而且能够最后赢得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彭德怀之所以能够指挥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首先源于其高屋建瓴,从战争全局出发分析判断形势,做出行动决策。

第二,关照好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协调与衔接。彭德怀认为,着眼战争全局,还要求战争指导者把战争全局中各个局部周密地组织进来,关照好各个战略集团、各个战略阶段之间的关系、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我方全部活动与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等,使之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协调一致,以达成总的战略或战役目的。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322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抗美援朝的一至五次战役,彭德怀在考虑当前战役发展时,就为下一次的战役埋下了伏笔,即在何种态势、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结束战役行动,不仅着眼于本次战役的得失,更重要的着眼于怎样才能最有利于下一个战役的作战行动。如第二次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奠定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这一胜利的取得,正是得益于彭德怀从全局出发,关照好两个战役之间关系的高超指挥艺术。志愿军发动的第一次战役,将敌从鸭绿江边打回到清川江以南,而正当敌全线溃退时,彭德怀却果断地下达了结束战役的命令,并指示各军后撤30~50公里。打了胜利仗,不乘胜追击,反而后撤,这在那些只从战役局部看问题的人觉得不可理解。对此,彭德怀的考虑是:“我们在第一个战役后不但未追击,且将主力后撤了三十至五十公里,这是因为敌人主力还未被击破,敌人对我军力量还没有正确估计,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没有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野心,这些造成我军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可能。而如果我军乘胜进行追击,则只能赶跑敌人,不能歼灭敌人。”<sup>①</sup>战局的发展正如彭德怀所分析的那样,麦克阿瑟不断收到来自前线的电报:“中国人似乎在全线撤退”,“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因此决定发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他发表广播讲话说“战争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结束。要迅速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结果不是美军打到了鸭绿江,而是被志愿军歼灭2.3万余人,并打退到“三八线”以南。

第三,掌握好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关节。战争的全局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而各个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这就要求战争指导者在驾驭战争的进程中,认真分析比较各个部位和各个阶段在全局中的作用,根据轻重缓急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区别对待,把注意力放在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关节上。只有对这些重要关节把握住了,才能实现其作战方针,达成战略和战役目的。反之,重要关节局部的失利,将对全局产生极为不利的影 响,乃至招至全局的失败。如在志愿军入朝作战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都特别强调要打好入朝第一仗,确保首战必胜。因为我军面对的最强大、最凶恶的敌人,与这样的对手较量,还是第一次。因此,夺取初战胜利,这不仅关系到稳定朝鲜战局、利于下一步的战略展开,而且对于树立敢打必胜信心、取得对美军作战的经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要实现这一点,无疑需要全局各个方面精心准备,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关节是什么呢?彭德怀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出敌不意,达成作战行动的突然性。因此,要利用敌判断我参战可能性极小的错误,“在战斗打响之前,绝对保密……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sup>①</sup>。明确规定:“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到翌日4时即停止,5时前隐蔽完毕,必须有切实检查”,确保不被敌人空中侦察发现。部队入朝后,要“避开主要道路隐蔽开进。否则就会过早被敌人发现”。志愿军派出的侦察部队一律伪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由于我军伪装措施运用得好,从而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不但赢得了入朝首次战役的胜利,而且为第二次战役中再次出敌不意创造了条件。

后来接替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美军上将李奇微对此评价说:“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利用隧道、矿井、丛林和村落进行隐蔽。……因为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运动痕迹,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中国的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还写道：“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很多部队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sup>①</sup>

第四，为全局的利益勇于牺牲局部的利益。战争中，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从总体上说是一致的，全局形势有利，局部也将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但也存在着矛盾的时候，突出表现在，为了全局的胜利，需要局部作出更大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局部的指挥员，要从全局利益出发来认识利害得失，坚决服从全局利益的需要，自觉地、主动地承担起以局部利益的牺牲换全局利益的重任。在处理局部之间的关系时，则应“坚持团结互助的方针，主张从整体利益出发，从利害与共的原则出发，积极主动地帮助别的部分，反对本位主义。各部分必须在上级和同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主动与别的部分取得配合，以保证平时工作的协调，战时的协同动作。片面强调自己方面的重要性，忽视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各自为政，互不关照，都是十分有害的”<sup>②</sup>。

### （三）从局部突破，将局部的胜利扩大为全局的胜利

彭德怀认为，无论战略指挥员还是战役、战斗指挥员，在胸有全局的同时，还必须重视从局部突破。因为任何全局都是由局部组成的，没有一个一个局部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全局的胜利。他指出：“领导人要有全盘工作计划，要有步骤地去进行，要从局部开始。一个战役、一个战斗是全盘的，都要先从消灭敌人一个地碉及一个排一个连开始。接近了前沿才能发展到纵深，部队是不能不经前沿就飞跃进纵深去的。

<sup>①</sup> [美]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8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5页。

所以作战时不能只看全面而忽视局部。但在作工作计划时应以全局为主,不应先考虑局部而延误全盘计划。而在工作时就应以局部为主,只有有计划地突破点,突破局部,然后才能扩大到面,到取得全局的胜利。”<sup>①</sup>因此在具体的作战指导中,要着眼于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一点一点地积蓄力量。他联系西北战场的实际指出,一个战役消灭敌人几个师、几个军,首先都是从消灭敌人几个伏地碉,几个连,几个营开始的,尤其是消灭胡宗南几十万人首先是从青化砭消灭他一个团和一个旅部开始的。争取大西北的解放,也要从一村、一区、一县做起。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几百架飞机都毫不可怕,但只要有一架飞机飞临我的头上,一个伏地碉、几个敌人在我面前,就得注意。我打不下拦在面前的伏地碉,就不能继续去攻击消灭全部敌人。

从局部突破,体现对每一次战役、战斗的高度重视和周密组织。不但要定出正确的作战计划、部署,而且要一项一项检查落实。彭德怀指出:对敌人一个连,一个排,一个机枪手,单独一个伏地碉,都是不应当轻视疏忽的。从局部开始,这个问题虽简单,但常常被忽视。计划的检查、快与慢均须很好的结合。计划了,会开过,方针也定了,但是不检查,工作常常流产。“忽视具体情况与具体准备,更不细心研究取得每个胜利应有的手段和步骤,那只是空喊胜利的官僚主义者。我们要把全局胜利与一个一个夺取敌人阵地,一点一点地积蓄革命力量联系起来,去处理问题”<sup>②</sup>。他特别强调在全局形势有利和部队士气高的情况下,同样不要忽视充分的准备。“军队情绪高是打胜仗的根本条件,但不应把这看成是惟一的条件。士气高,还要看战斗准备、计划、部署及战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8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术、技术的配合,才能打胜仗。情绪高、士气高时就容易疏忽大意,领导人要仔细检查,不要疏忽”。“梁周村战斗士气很高,领导上粗心大意,不看地形,不作具体部署,结果就打不下来。独二旅的领导人曾说:我们的战士似泰山,准把它压碎。但结果就没有压碎,因为我们的战士并不是‘泰山’,而是肉。这就是因为情绪高而疏忽所造成的结果”<sup>①</sup>。

### 三、集中与分散

集中与分散,是兵力部署与使用的两种形式。战场上的活力对抗中,战略战术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通过不同时空的兵力集中与分散来体现的。自古以来,没有呆板使用兵力而获胜的。彭德怀认为,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是一种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特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为战略指挥员不懂得运用兵力中的集中与分散的艺术,就不可能实现由弱到强、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也就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 (一)集中兵力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原则

所谓集中兵力,就是把我方分散在各处的兵力在一定时间内调集或使用于一定战场,并在兵力对比上取得对敌优势。古今中外的一切高明的军事家都强调集中兵力,把它作为用兵的根本原则。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认为:“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用兵应“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sup>②</sup>西方著名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略上最重要而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88页。

<sup>②</sup> 《孙子兵法·虚实篇》。



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sup>①</sup>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在决定性的时机和决定性的地点拥有压倒优势，这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sup>②</sup>中国革命战争的统帅毛泽东认为，集中兵力，“是我军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彭德怀在指挥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对这一原则有着非常深刻了解和准确的把握。他指出，在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军由弱到强，从战略防御中取得胜利，基本上依靠集中兵力这一着。因此“领导者的妙诀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sup>③</sup>。

集中兵力是实现战争目的的根本方法。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它们是歼灭战的中间环节，形成作战形式、用兵原则的有机统一。歼灭战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战法，而集中兵力是达成歼灭战的首要前提。彭德怀指出，在兵力对比上拥有数倍于敌的优势，是打歼灭战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在技术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没有兵力上绝对优势，要达成歼灭战是不可能的。他一再强调，贯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争取在每一次战役、战斗中，都能集中优势兵力，即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战役上自己的力量小于敌人，也要求得从战术来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sup>④</sup>。

集中兵力是夺取战场主动权的有效途径。毛泽东曾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主动地位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是不能分开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战区、一个战

- ① 《战争论》第1卷，战士出版社1964年版，第219页。
-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21页。
-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
- ④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役、一次战斗,谁持有力量的优势,就等于握有战场主动权。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军在战略上长期处于内线作战的防御地位。只有善于集中兵力,才能将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从而改变敌我进退、攻守、内外线的形势,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彭德怀在总结土地革命时期一至三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时指出,三次反“围剿”作战“白军都占绝对优势,红军绝对劣势”、“白军主动,红军被动”,“但由于红军善于集中兵力,采取各个击破敌军的战术原则,对于每一次战斗,红军都优于白军几倍。因而在战斗上红军主动,白军被动”<sup>①</sup>。

(二)一定条件下的分散兵力是实现集中兵力的前提和保障

分散兵力是指根据作战的客观需要,把兵力分为几个部分,用于不同的战场和作战方向,即“化整为零”。彭德怀认为,兵力的分散使用大体是依以下几种情况实施的: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之可能,需要对敌进行普遍的袭扰和破坏时;在敌大兵团进攻面前,由于敌之兵力集中而我之兵力有限需要分散敌之兵力时;遭强敌围攻,一时无法打破其围攻,为着减小目标转移兵力以脱离敌包围时;为保证我在主要攻击方向上形成兵力上的绝对优势,需要在其他方向上对敌进行牵制和阻援时;需要在广大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帮助地方政权进行根据地的建设时。显然,这里所说的分散,是指与集中兵力相辅相成的分散,而不是与集中兵力相背离的那种分散。集中兵力与分散兵力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一方面,没有集中,就没有分散,另一方面,没有必要的分散,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分散保障于集中,服从于集中,是指挥员兵力使用上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2页。

应该以我之分散破坏敌之集中。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有各个击破才能实现强弱转化,而各个击破的前提是要造成敌人的分散。因此,当敌兵力相当集中时,我要求得战机,最有效的办法是以我之部分兵力分散袭扰敌人进攻部队和袭击敌之供应基地、后方战略要点、交通枢纽要害部位,从而迫使敌分兵加以防范,使其难以集中更多的机动兵力,或迫使其把已经集中起来的兵力再分散开来,为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条件。彭德怀将战争中的这种对策称之为“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即以班、排、连为单位,组织战斗小组,配合当地民兵、游击队,在日军前进或宿营时,进行袭击扰乱,达疲劳削弱敌人。集中主力,采取敌进我进,从敌间隙转换阵地,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军弱小部分”<sup>①</sup>。

在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的同时,还要分散兵力于次要作战方向。无论是在防御作战还是在进攻作战中,没有主要方向上的兵力集中,就难以达成作战的胜利,而要保证主要方向上形成兵力优势,就必须分散部分兵力在次要方向上牵制敌人的兵力,把敌军力量吸引到次要方向上来,以减轻主要作战方向上的压力和阻止敌人向我主要作战方向上增援。彭德怀指出:“在突击方面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劣势兵力,保证以多胜少的原则,切忌平均使用兵力。战斗的胜负决定于主要的方向,到处顾虑,结果没有一处打得好。”同时他又指出,这种主要方向上的兵力优势,则是要通过我用一定的分散兵力牵制敌人来实现的。“牵制,是以少数兵力吸引敌人多数兵力于自己的当面,而使敌人误认为是主攻。因此,牵制的队伍必须积极动作,尽量吸引敌人于自己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6页。

的当面,使突击方面易于奏效”<sup>①</sup>。

应该把握集中与分散的“度”。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战斗上,兵力使用上的集中与分散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要防止绝对的集中与分散。在集中兵力于主要战场、战役、战斗时,必须有适当的分散兵力去关照其他与之有关的方向。在主要以分散兵力行动时,亦应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在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平均分散,以应付可能的事变。因此集中兵力并不是集中的数量越多越好,分散兵力也不是越分散越好,总的要求是要从当时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及作战态势出发,以有利于达成作战企图为着眼点。从集中兵力来说,由于作战目标、作战企图(歼灭战还是击溃战)、作战地形、作战形式(攻进还是防御、运动之敌还是驻止之敌)的不同,兵力集中到何种程度才能达到优势也是不同的。同时,战争力量不仅是一个兵力对比问题,而包括武器装备、军队士气、指挥能力等在内综合因素。兵力集中的多少,应以在综合力量上占有作战企图要求达到的优势为“度”。分散兵力亦应根据敌情和任务以确定适当的规模。彭德怀在论述红军游击作战中的分散时指出:“部队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过大行动不敏捷,难免不遭意外的硬战,过小则类穿山甲,倘遇挨户团、靖卫队都难抵御,……以三四十人一股为适宜。”但“有特殊任务,亦可以有时间性作小的分散工作。如肃反、打土豪等,适宜于一二十人枪为一股,方能行动敏捷迅速。”<sup>②</sup>

(三)从客观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兵力的集中与分散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就指出:“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要根据战争进程的发展,当利于集中则集中,利于分散则分散。1940年9月,他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从兵力集中与分散的角度,对百团大战前党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回顾,深刻阐述了八路军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兵力集中与分散的高超艺术。他指出,百团大战以前,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曾经过了三个时期:

第一战略时期——平型关的胜利到粉碎九路围攻。基本上集中兵力、协同友军打击敌人。基本上是有后方的正面作战。但仍有相当在一部分分散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这个时期是处在整个抗战第一阶段的开始及其进行中,是敌人疯狂进攻的时期。当时我们基本上集中作战,根据下列三个理由:

(1)友军缺乏与兵器精良的敌军作战的经验,形成严重混乱与恐慌,尤其是在华北方面被敌截断交通的兵团更甚。因此,我们集中力量协助友军,争取某些战役和战斗的胜利,打击惟武器论和亡国论,提高抗战情绪,减少友军恐慌和混乱情形;特别是要帮助后方被截断的友军,使之安心,不为敌算。

(2)我们要在战争第一阶段(敌进攻我防御阶段)中,尽量削弱敌人,造成第二阶段条件的到来。

(3)在华北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是我们党对八路军确定的任务。协同友军,多削弱敌人,是于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有利的。

第二战略时期——粉碎九路围攻到1939年3月30个团的整军。这个时期华北敌人有某种程度的削弱,交通破坏亦未完全恢复,敌占据战线亦不巩固,敌需一个时期消除疲劳,补充部队,恢复交通,巩固战线。我八路军全部转入敌后,由正规军分散进行游击战,由集中指挥到分散指挥。但还进行了部分运动战。当时我们基本上是分散作战,根据下列三个理由: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1)利用敌人力量削弱的时机,放手分散,猛烈扩大,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消灭伪军,瓦解会道门和土匪,打下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基础。

(2)在广大敌占区,如不迅速发展游击战争,争取群众,巩固敌后抗日基础,任听敌人安稳占领,则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毒计可能成为事实。

(3)徐州英勇会战、长江两岸坚决抵抗,使敌寇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与打击,华北敌军有部分南调。武汉失守后敌亦有相当严重的疲劳,均有利我放手分散,猛烈发展。

第三战略时期——1939年3月30个团的整军到百团大战的开始。这一时期是敌人占领武汉后,已受到我游击战发展之威胁,虽在疲劳中,仍回师华北,加紧扫荡。同时,国内破坏抗战的分子,亦于此时乘机大肆活动。我分散与集中相对平衡,但在地域与时间上均有所不同。我们当时改为相当集中作战,根据以下两个理由:

(1)为着迎击敌人当时的“扫荡”和争取反“扫荡”的胜利,以便更多的吸引敌人,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兵力必须相当集中。

(2)我们在第二阶段开始时,将正规军分散成许多游击军,数量上虽然得到很大发展,质量上却有某种程度的降低。……所以使它分散到一定程度,应集中整理训练,提高军队质量。如果只注意数量的扩大,而不注意质量的提高,就有严重危险存在。

很显然,没有第二时期的上述集中,是不能粉碎敌人一年来的长期反复“扫荡”,不能打击投降派对根据地的破坏和对八路军的进攻的,更不会有百团大战的胜利了。<sup>①</sup>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1~85页。

#### 四、计划性与灵活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战争舞台上的活力对抗中,这种“预”即表现为作战行动的计划性。纵观古今中外战争历史,无一军事胜利不是精心运筹、周密计划的结果。“不打无准备之仗”是我军重要的作战原则。然而,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这是战场上活力对抗的最显著的特征,将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使是重要情况都“计划”进去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还必须有灵活性。只有把计划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应付自如。彭德怀正是善于将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大师,他对计划性与灵活性两者辩证关系的把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 (一) 制胜的把握产生于周密的计划

计划性,就是对战争双方力量的计算、分析,以及对战争进程、结局的预测、准备。它包括战略战术、作战方针、作战方案等。彭德怀强调:“战役、战斗前须有确切的计划,周详的准备,严格的检查。切戒粗率行为。”<sup>①</sup>他批评那些虽有决心却无周密计划的人:“有些同志常爱说‘不完成任务,你杀我的头。’这虽然也表示愿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决心,但仅仅只有这样勇敢的决心是不够的,而必须在勇敢的决心上考虑到如何完成战斗任务。”<sup>②</sup>科学周密的计划来源于对敌我情况的真正掌握。掌握真实可靠与作战有关的各种情况是制定可行性作战计划的客观基础。在作战活动中,作战计划不是指挥员凭空产生的,而是掌握大量客观情况以后,通过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做出的决断。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在战场上,各方面情况若明若暗,真伪并存,要把真实情况弄清楚并非易事。彭德怀指出:“因为军事行动敌我双方都有伪装,即‘兵不厌诈’。因此必须认真了解对方各方面真实情况,如敌军数量、援军远近、技术装备、训练程度、指挥者的能力、精神状态、内部关系、具体部署。综合这些同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对比分析,然后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sup>①</sup>同时还强调,要充分认识作战情况的动态性,及时掌握情况的变化。在战场,敌对双方的情况无时不处在变化中,不仅敌方情况会变,而且我方情况也会变;不仅有形因素会变,而且无形因素也会变。这就是战场活力对抗的特点。因此在定下作战决心、形成作战计划和展开作战行动时,必须及时了解掌握正在发生的情况变化,及时作出新的分析判断,研究出新的对策。

要善于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依靠集体智慧形成正确的作战方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无论多么高明的指挥员,对战场情况的掌握和分析也不可能是十分全面准确的,其决策也难免有误算之处。彭德怀特别强调作战决心、计划、方案的形成必须集中群众的智慧。

(二)灵活性是创造性执行作战计划、完成作战任务的灵魂

灵活性是指依据作战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变通、补充、修订以至改变作战计划,以确保作战任务的完成。彭德怀曾提出,一支军队要做到不可战胜,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中的第三条就是“要有机警灵活的指挥”<sup>②</sup>。他认为无论战略上还是战役战斗上,其作战方针的制定和贯彻执行,都必须具有灵活性。作战计划本身不具有灵活性或机械地执行作战计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划缺乏“灵活性”、“主动性”、“自动性”，是不可能完成作战任务的。只有依据客观情况，灵活运用作战原则、方针和灵活执行计划、方案，才能克敌制胜。

首先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就应该把灵活性考虑在内。这就是说，在制定作战计划方案时，除了依据战争中那些确定性、固定性、必然性的因素之外，还要考虑战争情况的不确实性、流动性和偶然性的因素，体现在计划方案中。就是要有几个方案，几种打算、几手准备。要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把可能出现的情况尽可能地想得周全些，以提出不同情况下的应变措施。但即使如此，实际情况也不可能完全像计划中所设想的那样。所以要想把计划搞得太细、太具体也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作计划时，要给实施计划留有余地。这种余地就是幅度，就是给执行计划留有自由度。只有在制定计划时，也把灵活性考虑在内，才能利于计划的实现。

执行计划过程中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修订原来的作战方案。由于战争情况的确实性是有限度的，敌我双方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变动之中，其中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因此彭德怀指出：“当时情况确实有了改变，也就要改变自己的部署，部分改变、甚至全部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切不可固守陈规，企图侥幸。”<sup>①</sup>

彭德怀认为，作战指挥中的灵活性还要求“上级指挥员应给下级以较大机动，不要令下级事事都待命令”<sup>②</sup>。在作战中强调作战计划的权威性和执行作战计划的严肃性具体表现为坚持统一指挥。坚持统一指挥，这是统一全军的作战行动，发挥诸军兵种整体威力，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但同时，又必须赋予下级机动权，即通常所说的临机处置权。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46 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3 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彭德怀在《论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一文中指出：“统一指挥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之一。整个的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须在统帅及战区高级指挥官总的意图下进行。但统一指挥，并不应该限制兵团指挥员之机动。相反的，应该发挥兵团指挥员及各级指挥员之机动性。因为前线上的指挥员，常能看破敌人的弱点，了解有利的时机。如果缚束在请命、待命范围内，常易失掉最好的机会。”<sup>①</sup>为此他要求“上级给下级的命令不应过分死板，要给以较大的活动可能。一般的最好给以训令”。“上级对下级因机动专行去消灭敌人而吃了亏时，也不应过分责备，应当鼓励这种自动性”<sup>②</sup>。

作为下级指挥员，则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当出现有利战机或遇到不利敌情时，敢于机断专行。彭德怀将此称之为“自动性”。他指出：“一个良好的指挥员必须富于自动性，自动配合友军，自动打击敌人。”好的指挥员不但能够抓住战机，打开战局，主动地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而且在共同作战的友军陷入危险的时候，必须不待命令，自动地驰往应援。他举例说，假如自己当面之敌已经解决，而友军方面正在吃紧，则应自动向炮火、机关枪射击猛烈的方向增援。最好寻求在敌侧后方进行猛烈的突击，与友军协同解决敌人，以求得一个战斗或战役的全部胜利。如果请命、待命，易失良机，甚至丧失应得的胜利。所以拘守待命，毫无机动的指挥员，不能独立打开战局，造成胜利的有利条件，自己也时常陷入被动。因此“一个兵团指挥员只知奉命守法，不图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2 ~ 43 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3 页。

有功,只求无过,这不能说是好的指挥员”<sup>①</sup>。

### (三)正确处理指挥权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计划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在组织形式上,则表现为上下之间指挥权集中统一同适当分散之间的关系。彭德怀指出:我军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和指挥关系,应该是高度的统一集中和高度的积极性灵活性相结合。对于高一级的领导机关来说,必须把那些对全局和整体有重大关系的权限坚决地集中起来,防止分散主义;同时又要恰当地考虑和照顾局部具体情况,凡是应当下放的权限,就要坚决地放下去,实行按级负责,避免统得过死和绝对集中主义。对于一切被领导的部队和机关来说,必须坚决地服从整体利益,服从统一的指挥和领导,防止本位主义;同时又要善于依据总的意图,在统一领导的原则下,结合实际情况,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地执行指示和命令。平时工作如此,战时也是这样。情况复杂而且变化很快。这样,一方面,高度的集中指挥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指挥上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也相对地显得重要。不集中、不统一、不协调、不主动地积极配合,机械执行和等待命令,在战时会丧失战机,在平时要延误工作。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 第八章 以治为胜

### ——统兵治军的方略

以治为胜。……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

——吴起

军事对抗中的胜败，不仅取决于战场上调兵遣将、设谋用计的高下，而且在于对军队的治理是否得法。因此治军之道在历代兵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彭德怀以严于治军、善于治军而闻名中外。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以治为胜”的治军思想，在创立、建设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而富有特色的治军经验，提出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治军方针、原则和理论。

### 一、治军治心 教育领先

任何一支军队，有凝聚力才有战斗力。而这种凝聚力来源于军队成员的共同信念、统一意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勇敢献身精神。因此，治军首先要治心。彭德怀指出：“我们应当承认技术装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更要重视政治因素的决定作用。没有政治上的团结作为基础，装备技术是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而要达到政治上的团结，就要

采用民主的方法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以启发和提高全体军人高度的政治觉悟。”<sup>①</sup>因此,在任何时候,都要把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军队建设的领先地位。彭德怀在湘军任职时,他就利用士兵会组织在部队中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正是首先从唤起广大士兵政治觉悟入手,开始了对这支湘军队伍的内部革新,从而为平江起义及其红五军迅速成长为红军的主力部队奠定了基础。平江起义后不久,彭德怀即在龙门对红五军进行了以政治建军为主要内容的整训。在部队中建立政治机关和政治教育制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军队建设和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中心环节。除了进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带有普遍性教育外,着眼于人民军队的特点,特别突出了三个方面教育。

#### (一)启发阶级觉悟 坚定为工农阶级而战的信念

军队作为一定阶级和政治集团实现自己政治任务的工具,治心首先是向军队成员灌输服从和忠于其政治目标的思想。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由于军队中的广大士兵来自于被压迫的阶级,因此尽管它们对军队中教育具体内容和方法各有不同,如中国封建阶级和近代的军阀都将封建阶级的“三纲五常”作为军队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则重视“武士道”精神教育,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掩盖教育的阶级实质,淡化模糊士兵的被压迫阶级意识,用反动思想麻痹和愚弄士兵,使广大士兵能为其维护统治和侵略扩张服务。彭德怀认为,作为人民军队,军心的凝聚,最根本是启发官兵的阶级觉悟。因为人民军队“它和一切反动的军队固然根本不同,就是和历史上有过一定进步性的军队也有本质的区别。……人民军队是劳动人民解放自己,消灭阶级剥削制度,保卫人民国家的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军队的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9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成员,包括军官和士兵在内,都是来自劳动人民,他们的根本利害和奋斗目标是相同的”<sup>①</sup>。所以当他们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之后,就会真正懂得自己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从而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彭德怀自始之终把启发军人的阶级觉悟作为治军治心的根本之着。1947年11月下旬至1948年的2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领导下开展的著名的新式整军运动,正是这一教育最富创造性的表现。

从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以来,西北野战军经过九个月的作战,部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新成分不断增加,特别是补充了大批解放战士(俘虏兵)。平均在70%左右,有的连队达80%多。加上严酷战争环境中,战斗频繁,政治思想教育跟不上,不少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情绪极不稳定。在部队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些人怕艰苦,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人贪生怕死、打“滑头仗”,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发挥。为此,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部队需要整训,需要普遍深入地进行诉苦运动与土改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增强团结,以提高部队战斗力。随即做出了冬季整训的计划安排。要求营以上领导干部深入连队具体指导。

针对有些人对解放战士教育缺乏信心和办法的问题,彭德怀指出:“解放兵可要而不可怕。……只要能注意及时加以教育,就能改正他们的落后思想,他们就会变得很好。”<sup>②</sup>他深情地说:“解放兵多数是劳动人民……可以说解放兵约百分之九十的数目都是贫苦的农民。他们不过是武装了的、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他们在政治上受过若干反动教育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4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的影响,在生活上也受过若干影响,如欺压群众、打人骂人及耍赌等。从社会现状来看……帝国主义与大地主、官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使许多农民沦为破产或无法生活的境地,所以他们的痛苦最深,觉悟容易提高,革命性强,容易改造。”<sup>①</sup>

冬季整训首先是从土改教育入手,发动士兵诉苦,提高阶级觉悟。我军大多数战士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亲自遭受过地主与富农、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给予的各种痛苦。他们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经过诉苦,挖穷根,算剥削帐,再从大量典型事例中,归纳出问题一层一层深入讨论,搞清楚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是怎么回事,反动统治阶级代表谁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是谁,天下穷人为啥是一家,等等。讨论具体深入,有情有理,使广大指战员把苦变成恨,把个人仇恨变成阶级仇恨,知道了“苦从何来,仇向谁报”,发自内心地喊出了“穷人要翻身,消灭国民党军”。极大激发了官兵的求战情绪。在诉苦讨论和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阶段,以纯洁思想、纯洁组织、坚定斗志。然后转入第三阶段,即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通过练兵,使勇敢与战术、技术密切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干部的指挥能力。关于这次运动,彭德怀在整军报告中总结道:经过诉苦三查,“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党在部队中威信大大提高了,过去解放兵、子弟兵间的隔阂和不团结的现象,被阶级友爱代替了。它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增强了部队团结,加强了组织纪律,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发扬了群众创造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毛泽东在听取西北野战军进行诉苦三查汇报后,把它称之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在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进行推广,对促进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有力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的推动作用。

### (二)学习革命理论,掌握作战与军队建设的行动指南

彭德怀认为,我军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军人仅有朴素的阶级觉悟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革命军人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只有在掌握了一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之后,才能真正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明确的奋斗方向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提高干部战士思想政治觉悟的根本指南。彭德怀说:“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思想领导,经常地按照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军队进行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以提高全体军人的社会主义觉悟。”<sup>①</sup>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要真正认清工农阶级的阶级使命和前途,认清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克服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政治眼光的狭隘性和由此产生的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不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是不行的。彭德怀曾批评一些单位在作战中执行命令不坚决、打滑头仗的根源时指出: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若经过改造,则与服从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党内军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相当数量,是值得注意的。而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用革命理论武装干部战士则是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本途径。他在指挥西北解放战争时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前委、纵队、旅的领导干部中,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修养也不够,……我们要加强马列主义及马列主义在中国已具体化了的、中国革命经验已总结成条文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我军需在前方成立流动图书馆,把中央指示要读的书搜集几百本。……”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9页。



这个图书馆在打仗时就放在后面。今年冬季我们将准备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政治干部学习的地方,抽调从连一级到纵队一级的军政干部来学习。”<sup>①</sup>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干部战士提高认识能力的锐利武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改造思想意识、提高政治觉悟的科学世界观,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改造思想方法、提高认识能力的科学的认识论。是我们政治上军事上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彭德怀指出,要使全军将士对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有深刻的理解和掌握,并在作战中和军队建设中自觉地运用它,没有一定理论基础也是不行的。只有当广大干部战士不但有坚定的阶级立场,而且有基本的理论知识,才能极大地推进军队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提高部队作战和工作的效能。彭德怀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对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和我军建设问题作了详尽的阐发。这些著作,一直是我军进行革命战争的行动指针和战斗纲领。”<sup>②</sup>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彭德怀强调军队的革命教育必须从军队的实际出发。对不同对象要有不同的要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学习重点。要把向书本学习和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结合起来。真正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部队思想和行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一支军队生命力首先取决于它的政治方向。军队建设能否保持正确的方向,则取决于它是否有一个正确的政治领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52页。

导核心。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军队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正确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彭德怀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胜利,首先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历史证明,离开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我军就招致严重的失败”,“革命军队要取得胜利,避免失败,必须有党的正确领导,必须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领导。否则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党的政治任务是通过其路线方针政策来规定和实现的。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军队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因此,深入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提高全军指战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彭德怀强调,必须把各个阶段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及其方针政策的教育作为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措施抓住不放。1953年12月他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就是要在全军开展对党的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使全体军人都明了我国目前是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军光荣的任务,就是要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因此,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技术、文化的水平,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sup>②</sup>他提出“必须和一切脱离党的领导的哪怕是微小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要求“全军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对党中央的一切政策、决定和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51、552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页。

指示,都要贯彻执行,成为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sup>①</sup>。

## 二、苦练出精兵,训练为中心

战争是人类社会中最为剧烈的对抗活动,它所赋予人们的各种客观要求,必须通过训练来达成。军队的战斗力,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其内部诸要素中人和武器装备,在训练之前,只是一种潜在的战斗能力,经过训练,才能实现人和武器的有机结合,成为现实的战斗能力。因此彭德怀把组织军队的刻苦训练作为治军的经常性的中心任务。他指出,加强军队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军队人员的训练”<sup>②</sup>。“要建设一支优良的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军队,还必须正确地解决人与技术相结合的复杂问题”。“只有把人和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军队才能有高度的战斗力。在我军实行这种结合,……必须有严格的组织和训练”。“并且通过切合实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使军队中的成员能熟练地掌握手中武器,提高军队的战斗技能,提高各级军官的指挥能力和业务能力,使军人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民战士”<sup>③</sup>。

### (一)要把训练摆到军队建设的中心位置

在战争年代,彭德怀总是利用一切战争间隙组织练兵。平江起义后,红五军一直处于非常险恶的战争环境,即便如此,彭德怀仍抓住短暂的间隙训练部队。据张平凯回忆,1929年10月彭德怀率部队从井冈山返回湘赣边区,在打退了敌人2个师4个旅的进攻之后,除派出部分分队进行清除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8、609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94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7页。

地方地主武装的作战外,大部队即在永新城进行军事训练。当时部队中的一些人由于习惯了几乎天天行军打仗的战斗生活,转入每天从课堂到操场的军事训练后,反而有些坐立不安,纷纷要求上前线打仗。彭德怀给大家动员说:“仗是要打的,而打仗必须要有本领,训练,正是为了打更大的仗,打有把握的胜利仗。磨刀不误砍柴工,不学习、不训练怎么能打仗呢!”他还亲自授课,亲自到训练场给大家讲要领做示范,传授组织训练的方法。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各个历史时期,彭德怀所领导过的部队战斗力都特别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苦练出精兵”的治军原则。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军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更加重视部队军事训练问题。明确提出了军事训练是“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性的中心工作”。1953年12月他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在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过去我们的技术和装备比较简单,现在已逐渐在改变,过去我们主要是在战场上练兵,现在则主要靠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因此,如果我们今后不注意加强部队的正规军事训练,就不可能使部队的战斗准备打好基础。”<sup>①</sup>迅速在全军掀起了群众性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的练兵热潮。1953年他在辽东军事演习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提高部队各种技术水平。现代战争要求军队熟练地掌握各种技术,通晓各种兵器的战术和技术性能。任何正确的战役计划都要通过战术动作去实现,而技术又是战术的基础。……没有熟练的技术,就不可能完满地完成战斗任务和战役计划。”<sup>②</sup>在彭德怀的主持下,全军部队从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页。

1953年6月开始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

### (二)必须突出军官训练这个重点

军官训练和士兵训练是整个军队训练过程中的两个方面。由于军官不仅是作战的指挥者,而且也是部队训练的组织和领导者。“干部不会或学得不好,当然就不能训练好士兵”<sup>①</sup>。军官在整个军事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比士兵更加重要,战争对军官赋予的客观要求也更高,通常讲强将手下无弱兵。因此,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重视突出军官的训练,我国古代有练兵先练将之说。拿破仑的名言则是“狮子统率的绵羊军队比绵羊统率的狮子军队要强些,而一支由鹿统率的狮军决不可能再是狮军”。恩格斯指出:“军官是不能以训练士兵的同样期限和同样方法来造就的。”<sup>②</sup>彭德怀将历史的经验和现代战争特点的客观要求相结合,从我军建设的实际出发,深刻地指出:“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成绩的优劣,将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因为现代化战争比之过去的战争,无论是兵员、兵种、装备、技术都已起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非常复杂的现代战争组织与高度的技术动作,平日没有修养锻炼和全套熟练,战时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有些干部满足于过去的战争指挥经验,对于现代战争的学习不很热心,不参加战役集训,不参加战役军事演习,这是不了解,我军的战争经验虽然是很宝贵的,在将来战争中虽然仍有很大用处,但是我们的经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获得的,连朝鲜战争的经验在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一切场合都是适用的。光靠过去的一些经验,不认真学习现代战争的规律知识,不认真学习现代军队的技术知识,并把它们熟练地掌握起来,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55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是不能指挥现代的军队打胜仗的。”<sup>①</sup>因此明确提出了干部训练是中心工作的中心思想。他说：“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任务是繁重的，工作是复杂多端的，军队的编组、制度的建立、条令的制订、国防工程的建设都是重要的工作，但最主要的、长期的、经常的工作则是训练干部。因为，虽然有现代化的装备，现代化的组织编制、制度，现代化的工程建筑，如果没有坚强的、现代化的指挥干部和专家来掌握使用，则上述一切均成废物。而要把我们现有的干部变成坚强的、能够掌握现代装备技术的干部，比之解决装备、组织编制、工程建设、建立制度等，其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因此，应明确规定，训练干部的工作，是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军队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的中心。”<sup>②</sup>在干部训练中，又特别强调加强司令部机关参谋人员的训练。他要求：“为加强各级司令机关，使其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必须注意下列工作：一是有计划地组织各级司令机关的干部进行业务学习，使之十分熟悉和熟练地掌握本身业务，并能不断地提高业务水平；二是经常地注意挑选有才干的、能够把业务推向前进的、优秀的干部，来充实司令机关，不断地提高司令机关干部的质量；三是逐步做到使我军指挥人员与参谋人员的轮换合一，以提高我军参谋工作的质量与指挥的质量。”<sup>③</sup>

对于如何搞好干部训练，在彭德怀的具体领导下，军委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和办法。1954年的训练计划大纲规定，指挥员训练和司令部训练通常由教学法集训、首长作业、首长——司令部演习和诸兵种合同实兵战术演习几个环节组成。指挥员训练为司令部训练打下基础，首长和司令部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1～512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9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0页。

训练又为部队训练和实兵演习作好准备,指挥员和司令部的训练又是在部队训练和实兵演习中完成的。三部分训练构成完整的训练体系。

彭德怀认为,训练干部,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坚持在职训练和院校训练并举。当时院校处于初创阶段,在职训练则显得尤为重要。鉴于干部训练和部队训练同时进行,为不影响部队训练,干部的在职训练一般采取短期集中或轮训的形式,师每月或每个训练阶段组织一两次,每次两三天训练一个科目,军以上根据需要举办各种类型的轮训班。1954年五六月间,中央军委在北京军区组织全军高级干部集团军战役防御集训,参加集训的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及其他人员200余人,通过集训,提高了学习现代战争的兴趣,增强了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的信心。依照此集训,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也普遍进行了战役法集训。这期间干部训练强调“首长教育部属”的原则,要求按级地学,按级地教,防止一揽子包办代替和放任自流两种倾向。首长亲自备课任教,在提高部属的同时提高了自己,既有利于平时搞好训练,又有利于战时胜任指挥。通过训练,使干部掌握了军事技术,提高了组织训练的能力。促进了部队训练水平的提高。

在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将院校训练干部摆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指出,院校培训,是系统全面训练干部的主要方法。为了尽快使更多的干部到院校深造,他用了很大的精力指导全军创办各类院校的总体规划和组建工作。到1959年,全军院校总数已达129所,总人数为25.3万人。另外还有预备学校54所和文化学校73所。在抓创办院校的同时,还注意加强对院校工作的具体指导和督促检查,要求配齐院校领导骨干,改进院校训练方法,提高训练质量,培养教学骨干,改善教员的待遇,妥善解决知识分子的入党、参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军、评衔等问题,按编制定额选拔收录学员,扩大收生范围;调整学制,使院校教育与部队训练相一致。军队院校系统的建立,培养出来不少合成军队的军官和专业军官。目前在部队中,已有相当数量久经战斗锻炼的军官经过学校深造,尚有一批经过战斗锻炼考验的骨干在校学习。”<sup>①</sup>

## (三)“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军队训练的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因此,彭德怀一向主张按照战争对训练提出的实际要求进行训练,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即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他曾教育部队说:“我们练的是真工夫,真本领!不是摆样子,给人家看的!平时大家多流点汗,练就一身硬工夫,战时就能过得硬,冲得上!我彭德怀的主张历来如此,反对那些怕苦怕累、怕流汗的熊蛋兵、豆腐兵!”<sup>②</sup>

必须根据作战任务来安排训练。彭德怀指出:“要把平时的军事训练和战时的战斗任务结合起来。……战术演习、战役训练着重现地作业,特别要根据各军的战时任务进行演习和教练。例如,守岛部队则应演习战时守岛的各种动作,上海附近部队则演习和教练上海附近作战预定方案的动作……以便战争来到即能很熟练地进行作战。”同时还“要把军事训练与部队平日担负的任务结合起来。……应根据不同的任务,规定不同的教育内容与实施计划,不能千篇一律。凡有特殊任务的其他兵种,都应照顾其特点”<sup>③</sup>。学用必须相互结合。

训练一定要从基础抓起,打牢技术、战术基本功。在战争年代,彭德怀就十分重视部队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单兵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94页。

② 张平凯:《忆彭大将军》,第122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514页。



战术等基础训练。在战斗间隙整训部队时,他经常深入练兵场,检查训练情况,亲自给大家讲解各种技术的动作要领,有时为了使部队熟练掌握一个动作要领,要求反复练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彭德怀更是强调基础训练的重要性。他在辽东军事演习干部会上讲话指出:现代战争要求军队熟练地掌握各种技术,通晓各种兵器的战术和技术性能。任何正确的战役计划都要通过战术动作去实现,而技术又是战术的基础。在现代战争中,各兵种在战术上的协同动作,多半是依靠对技术的掌握来实施的。步炮协同是通过炮兵的准确射击来实现的;陆军空军的协同动作是要通过空军的准确轰炸来实现的;防空军和空军的协同动作是要通过雷达的精确侦察、探照灯的准确照射、地面高炮的准确射击和空军迅速而准确的歼击来实现的。没有熟练的技术,就不可能完满地完成战斗任务和战役计划。从难从严,首先要严在打基础上。“以便迅速把我军的射击技术和其他各种技术水平提高一步”。他在论述军事训练中课堂教学和野外训练的关系时还指出:“军事训练包括‘训’与‘练’两个范畴,‘训’就是课堂作业,‘练’就是操场动作与野外演习,我们要把二者密切结合起来。一般是‘练’多于‘训’,特别是在我军干部和兵的文化技术知识低下的条件下,‘练’就显得更为重要。”<sup>①</sup>

彭德怀特别重视组织部队进行近似实战的不同规模的实兵实弹演习,通过演习,检验部队训练成果,提高部队整体素质和战备水平。人民解放军进入正规化训练之后,曾举行过多次不同规模、不同方式不同战役战术背景的军事演习。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军事训练特点的是1955年11月举行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有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陆军4个军、1个机械化师,空军2个军,海军旅顺基地等18个师以上指挥机关,32个建制团。参演飞机262架,舰艇65艘,坦克和自行火炮1000余门。全军中高级干部800余名随演习部队参观见学并一起作业。彭德怀在这次演习的干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军队训练的指导思想总的要求。通过演习,训练了参演部队、机关和见学的高中级干部,提高了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机关组织抗登陆战役的能力,检查了部队的训练情况及其他战备工作。

要建立奖优罚劣的训练奖惩制度。彭德怀要求:“对于勤学苦练而获得优良成绩的人员应该予以奖励”<sup>①</sup>。“因此,今后考核哪个军队有无战斗力,应以那个军队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为基本标准;考核哪个干部有无指挥能力,应以那个干部对军事学习与指挥实兵演习成绩的优劣为基本标准。……”<sup>②</sup>“要在军事训练中建立一定的教学奖惩制度。对领导部队军事训练或领导学校教育有优良成绩的军官和教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升级、发物质奖励或奖章、勋章。在学校学习成绩优异的军官或学生,毕业时应提升级别。对训练部队与领导学校教育成绩低下的军官应给予惩罚,考试不及格的学员则不予毕业或降级使用”<sup>③</sup>。

### 三、纪律严明,赏罚分明

#### (一)明令建制,军威所依

严纪律,明号令,是千军万马进行有序的训练和战斗的基本前提,是一个军队有军威、有战斗的重要保证。因此它

-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页。
-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2页。
-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页。

是古今中外治军所遵循的普遍原则。彭德怀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执行战斗任务的武装组织，因此，高度的集中和铁的纪律是绝对不可少的。”<sup>①</sup>因为，只有建立铁的纪律，才能保证作战决心、计划的坚决贯彻执行。战争是血与火、生与死的搏斗，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由于军队成员在思想觉悟、心理意志、思想方法、认识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没有统一的法纪规范去约束军队的行动，就不能有效地贯彻指挥员的决心和部署。就可能各行其是，形不成整体作战的威力。彭德怀在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兵种指挥员服从合成指挥员统一指挥的重要性时指出：“在统一指挥下的各兵团首长、各兵种首长、前方或后方的首长，不论军衔高低，也不论资格新老，都必须执行和服从统一指挥的命令……必须认识，指挥与被指挥，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是有关作战胜败的重大问题。”<sup>②</sup>同时也只有执行统一的号令和纪律，才能激励军队士气。因为军队的号令法纪，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在军队中严明法纪，实质上是以军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为杠杆，通过对军人的物质的、精神的赏与罚，来规范军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所以以法治军赏罚激气，是历代兵家作战的主要手段。

彭德怀认为，要严纪律、明号令，首先要制定科学、严谨、系统的军事法规，使之一切行动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因而他特别强调从人民军队特点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军情出发，建立起完善的军事法规。当他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时，注意根据本部的实际情况，制定一系列贯彻军委总部所颁布的各种军事法规具体规定，无论是战斗纪律还是群众纪律，都有十分明确具体的规定。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16 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31 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50年代,当他执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帅印后,即把军事法规建设作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建设的根本依据,摆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彭德怀指出,军队要实现正规化,就必须有成龙配套的军事法规,“必须正确地认识,正规化就是要把全军的各方面用正式的规格,即条令的规定彻头彻尾地统一起来,主要的就是统一装备、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制度、统一纪律,把这些制成条令,作为每个军人遵守的法典,以适应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需要。”<sup>①</sup>1953年5月,中央军委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和《纪律条令(草案)》(统称共同条令,此前于1951年起试行,此次是在彭德怀的主持下经过修改后正式颁发)。全军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以后,进一步加快了军事法规的立法步伐,国家和军队先后颁布的主要军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与物质保障条例》和《合成军及各军兵种战斗条例》等。彭德怀十分重视用这些军事法规规范全军的行动,他指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各种军事条令。共同条令是建立我军正规生活、巩固军队纪律、保证部队训练的根本法典。贯彻执行共同条令,是我军走向正规化的重要关键。各兵种战斗条令是平时训练军队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战时组织与实施战斗的基本依据。学习与执行各兵种战斗条令,对我军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和先进的军事科学,具有重大的意义。”<sup>②</sup>这些军事法规的制定和贯彻,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00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533页。

调整军队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保证全军上下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巩固和提高军队战斗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二)有功必奖,有过必罚

彭德怀认为,要保证我军纪律的严格执行,真正做到令行禁止,在奖惩问题上必须坚持原则,公正严明,实事求是,不循私情,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他在治军中正是坚决地贯彻这一原则。不论哪个部队,哪级干部,只要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就当面批评,而且“火力”很猛,毫不客气,该处分的也决不留情。特别是对高级指挥员,谁要是不考虑全局,不执行命令,玩忽职守,打滑头仗,更是绝对不能容忍。而对于功劳突出的部队和个人,则会受他大力的表彰。对与每一次战役总结讲评,彭德怀都是功过分明,即使是打了胜仗,也不放过作战不力者的批评,受了挫折,对作战有功者同样予以表彰。如解放战争中对西北野战军四纵、抗美援朝战争中对三十八军的批评与表彰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1948年4月上旬至5月中旬的西府战役中,当西北野战军攻占了宝鸡之后,胡宗南、马步芳共11个旅的兵力分两路向西北野战军扑来,彭德怀决心在机动防御中再歼敌几个旅。但由于四纵未能坚决地执行作战命令,造成战役上的被动和不应有损失。5月26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会议,总结西府战役,会议对失职的干部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让四纵指挥员在会上作了检讨,决定对因不执行命令而造成整个战役失利的个别旅、团干部给予了处分。彭德怀对四纵领导人也毫不留情,当众严责。他说,四纵负责同志采取严重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已影响其内部团结,以致邪气抬头,正气受到压制,发展不执行命令,几次丧失有利战机。他在历数了一件件失职行动后声色俱厉地说:“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从给革命造成的损失说,是应该砍老壳的。”为了帮助犯错误者提高认识,他剖析了在部队存在的个人主义思想、无政府主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义思想。指出其本质是“缺乏阶级责任心,考虑问题不从全局出发,从个人得失出发,个人安危出发”,“以致违犯纪律,损害革命利益于不顾”。他特别强调指出:“战争是流血的斗争,要求各级指挥员、政治委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丝毫疏忽。”指挥员的失职,必然带来意外的和不应有的流血牺牲!土基镇会议对西北野战军严肃军纪、提高战斗力起到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会上受到严厉批评的四纵,会后从上至下查找部队中思想作风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吸取教训,全军决心以英勇作战的实际行动挽回损失。以后历次作战都打得很出色。尤其是在1年以后的扶眉战役中,二兵团四军(即原四纵)担任战役迂回任务,一昼夜前进140多里,插入敌后,在罗局镇顽强抗击胡军2个军轮番冲击10余次,四军指挥员号召全军官兵,“寸土不失”、“坚决堵住敌人”。完成了堵敌重任,使胡宗南的4个主力军被西北野战军全歼。对此彭德怀给予了热情的表扬,四军这次打得很出色,立了功,为夺取战役的全胜起到了关键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与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初次交锋,即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歼敌1.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打回到清川江以南,稳定了朝鲜战局。在一般人看来,这次战役在仓促入朝、情况不明的条件下,能取得如此战果,实在难能可贵。但当各军指挥员到志愿军司令部参加一次战役总结和二次战役部署会议时,发现气氛并非预料的那样轻松。因彭德怀对与“联合国军”初次交锋的结果并不满意。他在总结中表扬了担任正面攻击的三十九军、四十军及时捕捉战机,打得勇猛顽强。四十二军2个师在东线顶住了敌军多次猛烈进攻,完成了牵制任务。而对三十八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三十八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战功卓著的主力部队。在抗美援朝一次战役中担任向军隅里、新安州方向穿插任务,就其在作战中歼敌人数来说,

仍是较多的,但由于他们对敌情判断有误,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被围之敌由此逃脱。会上彭德怀严厉批评三十八军领导人对敌估计过高,不敢大胆截断敌人退路,使这次可能歼敌两三个整师的作战计划未能完成。说到气愤处,将右手重重往桌上一拍:“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谲的本事还是有的!”怒声震动会场。解放军高级将领都知道彭德怀治军甚严,但入朝部队多是原第四野战军的,多数军的领导人对彭德怀要求之严格没有亲身体验。这次看到他对三十八军这样的“王牌军”都如此不留情面,才真正知道彭德怀的“厉害”。特别是三十八军领导人更是受到极大的震动,决心以在今后的作战中“洗清一次战役作战不力的耻辱”。在二次战役中,彭德怀仍把事关战役全局的穿插任务交给了三十八军。三十八军不负厚望,打得积极主动、英勇顽强,胜利完成了阻击和歼敌任务。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12月1日,彭德怀以志愿军领导人彭、邓、洪、韩、解、杜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给三十八军的嘉奖电并通报全军。电报写完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在电报稿最后写上了:“三十八军万岁”几个字。有人说:“在我军历史上还没有喊那个部队万岁的,这样写不好吧?”彭德怀说:“这次战役的胜利,三十八军起了关键作用,打得好,就可以喊万岁嘛!”当嘉奖令一传到该军军部,军的领导立即分头到各师去传达,一级传一级,很快传到了全体指战员,大家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纷纷表示:“一定要用生命和鲜血来保持这个光荣称号,不打败美国侵略者,决不回国!”有力地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在后来的历次战役中,这支部队均创造了突出的战绩。记者李庄写的《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作家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均是描写他们的英雄业绩。从此,三十八军被称为“万岁军”名扬天下。这充分显示出了彭德怀严格治军的巨大魄力和威力。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 (三)重教善导,启发自觉

是否将军队纪律的执行建立在官兵高度自觉的基础上,这是新型的人民军队同一切剥削阶级军队治军思想的根本区别之一。军事法规是统治这支军队的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反映。在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由于广大士兵是被剥削阶级的成员,因此,其军事法规的实行只能依靠强制手段。彭德怀指出:“旧的军阀部队是地主阶级的工具,……他们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权利和地位,必然驱使士兵进行战争。而这些战争又是非正义的,与广大士兵利益相违背,所以一般军官对士兵只有采取多种强制和镇压的办法。”<sup>①</sup>而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军队的法规体现包括广大官兵在内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因此,“我军严格的组织制度,不是单纯依靠行政强制的办法,主要是在官兵政治自觉的基础上,依靠集中和民主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建立起来的。只有这样,我军严格的组织制度和各项任务的完成,才有牢固可靠的保证。也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残酷的战争考验”<sup>②</sup>。由此可见,重视教育引导提高官兵的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是人民军队以法治军从严治军的一个显著特征。

启发官兵严守纪律的自觉性首先是靠教育。因为我军的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全体成员政治自觉的基础上。“为了提高全体成员的政治觉悟,解决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施行管理教育的办法,主要是依靠有领导的耐心的思想工作,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sup>③</sup>。一方面,组织部队认真学习军队的各种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使它的基本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7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4页。



内容做到人人皆知,明确军人的行动规范。另一方面,要经常结合实际,组织部队进行严格组织纪律与履行军队职能军人职责关系的教育和讨论;“通过教育,使全体成员认识到军队的命令和纪律体现着革命事业的共同利益,代表着党和全体人民的意志,从而愿意自觉地坚决地服从和遵守,而绝不是盲目的服从”<sup>①</sup>。

启发官兵严守纪律的自觉性,还必须在执行纪律的过程中处理好赏与罚的关系,坚持以奖为主。奖励和惩戒都是维护纪律的手段,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历代兵家都主张赏罚相依,恩威并施。在两者中,是以奖励为主,还是以惩戒为主?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都实行以惩罚为主。通过重罚来强制军令军纪的执行。而人民军队的特性和特点决定了在处理这两者关系时,必须坚持以奖励为主的原则。彭德怀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革命军队,我们的事业是进步的事业,因此,我军绝大多数同志是愿意积极上进的,是想把工作做好的。我们工作中虽然有消极的和落后的一面,但是,积极的进步的一面,总还是主要的。领导干部就要善于发挥和诱导群众的这种积极性,依靠群众的努力和创造来推动工作。”<sup>②</sup>“对于违抗命令和纪律行为,我们绝不能迁就放任,应该给予必要的惩戒。但是,对于犯了一般性错误性的同志,主要是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我们坚决反对惩办主义……过重过多的惩戒,会伤害犯错误者的自尊心和改正错误的信心;对于一个单位来说,会使群众情绪消沉,疲疲沓沓。这样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sup>③</sup>。在治军实践中,彭德怀特别善于运用作战和部队建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7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42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8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设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来教育官兵。每次作战总结,都要大力表彰有功单位和有功人员,即使是对因执行命令不力的部队,也注意分清责任者,充分肯定其中的有功人员。如1948年西府战役后,他在对四纵队执行作战任务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严肃尖锐批评时同时指出:“四纵有很多好的同志,有不少英勇事迹。”在对违犯纪律人员的处理中,批评十分严厉,但处分却十分慎重。

要处理好严下与严己的关系,坚持从领导干部严起。彭德怀认为领导干部的自身的表率作用,是教育士兵、启发士兵执行纪律自觉性的重要因素。一个部队的军纪、军风是否严整,号令能否得到全体官兵坚决迅速的贯彻执行,最关键的要看上级是否给下级作出了好样子。因此,他对自己的要求之严,在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是有口皆碑的。在对部属的统御中,则是从高级干部严起。50年代在抓军队条令条例贯彻时他说:“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和警备条令,这是军队的共同条令,在所有部队中都应贯彻此种条令的教育,按照条令的规定办事。尤其是各级首长应成为执行条令的模范。”<sup>①</sup>“为了贯彻执行条令,各级首长必须从本身做起,以身作则,带动部属”<sup>②</sup>。并且要注意经常检查各级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的情况,认真总结经验,以实际的事例教育部队,使大家自觉自愿地执行条令。

### 四、选贤任能,造就强将

纵观古今中外军事历史,其军队的强弱无不是与将帅的高下联系在一起。选将用将历来为中外兵家视为军队建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9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3页。

设的头等大事。古人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说。人民军队建设中，亦将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任用摆在战略地位加以重视。毛泽东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彭德怀对这一点同样有着远见卓识。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要以最大的力量艰苦的培养干部。”<sup>①</sup>抗日战争中他一再强调要广泛争取知识分子，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充实到八路军的干部队伍中来。解放战争中，他指出提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作战指挥能力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个问题视为建设现代化军队必备条件，指出：“为了完成国家的建军任务，需要大力培养干部和继续提高干部的质量。‘干部决定一切’这个真理，对于我们今后的建军工作具有严重的意义。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一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具有现代战争知识和能够掌握现代技术的干部，这是不可能的。”<sup>②</sup>

#### （一）坚持德才兼备选拔标准

确立正确的标准，是选拔、培养、造就优秀军队指挥员的前提。德才兼备是我党我军选拔干部的一贯标准。彭德怀指出：“必须正确地挑选干部，大胆地提拔新的干部。选拔干部的原则和标准，应当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这些干部必须是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马列主义思想基础，有现代军事科学的知识，一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能够钻研业务，富有朝气的人”<sup>③</sup>。

“德”主要是指人的政治觉悟、思想道德和意志作风。军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 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86 ~ 487 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87 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队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干部作为这个集团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其实质是一定阶级的代表。因此,军队干部的德是最重要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彭德怀在论述我军干部政治品质时,强调最多的是要有阶级观念,有为无产阶级打江山、保政权的强烈政治责任感;要有党性观念,坚决服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有共产主义信念,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在思想道德上,他强调人民军队的干部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必须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必须有公道清廉的品格,必须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意志作风上,彭德怀认为我军干部应该具有果敢、坚韧、顽强,不被一切艰难困苦和挫折所动摇的心理素质,具有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具有敢于机断专行、敢于承担责任的气魄。

“才”,主要指人的知识和能力。干部作为战争活动的指挥者,必须具有作战和军队建设的学识和能力,这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保证。彭德怀认为,人民军队的干部,要担当起自己的重任,必须有真才实学。通观彭德怀对干部才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他说:“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军官必须具备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战争规律知识”,不懂得这些,就不能指挥现代战争。二是强调有能力。即能够把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到作战与治军的实践中去,善于观察分析问题,善于集中群众意见,善于作出科学的决策,具有指挥作战的能力,管理部队的能力。三是有胆识和魄力。在战时敢于主动灵活地指挥作战,“能够抓住战机,打开战局”。在平时工作有创新精神。善于从被动中脱出,取得作战和工作的主动权。

彭德怀指出,衡量考察干部,必须把德和才统一起来。德,是才的方向和灵魂,是才的发展的内在动力;才,是德得以发挥的凭借,是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因此,两者缺一不

可,必须德才兼备。但两者又不是平列的,德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它是关系到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因此政治上不能和党保持一致,思想道德品质不好的人,一个也不能用。然而,有德而无才的人也难当大任,平时不可能带领部队开创新局面,战时不可能带领部队克敌制胜。甚至可能贻误战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所以在选拔使用干部时,一定要兼顾德才两个方面,只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

### (二)坚持从有实践经验者中选拔干部的正确途径

军队干部中高级干部,一般都是从初中级干部中晋升上来的,这是现代军队所共同的。基层军官的来源,则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从优秀战士骨干中选拔,一是从地方青年知识分子中招募。西方国家军队基本都是采取第二条途径。彭德怀从我国和我军的实际出发,主张主要应从优秀的战士骨干中选拔基层干部。

在战争年代,一方面,由于地方知识分子的来源极为有限,我军只能走从战士中选拔干部的路子;另一方面,我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一直较低,战争的现代化程度也不高,从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中选拔在专业知识上的矛盾并不突出。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军队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军队的技术装备越来越多,现代化的水平越来越高,技术军官和技术研究人员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因之用来培养这类干部所需要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日益增加。然而我国目前知识青年的数量又很感不足,这就使得军队中知识青年的来源成为一个问题”。“军队干部的来源和选拔问题,有彻底加以解决的必要”<sup>①</sup>。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彭德怀认为我们不应盲目照搬别国的路子,而是要从我们的国情军情出发,找出一条最有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20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利于国家和军队建设的路子来。这就是将军队中的优秀士兵的文化加以提高,以满足现代化军队建设中的干部来源。他在论述其可能性时指出,“我们每年从服役一年至两年的义务兵中,挑选几千或者一万初中程度的士兵,将他们的文化程度加以必要的提高,然后转入军事专业技术学校,培养成为技术军官或技术人员,应当说是可能的,没有多大困难的”<sup>①</sup>。并进一步指出,采取这种途径,对于军队和国家建设都是有利的。

一是可以按照政治条件、身体条件和部队需要的数量进行严格挑选。二是他们经过士兵生活锻炼,在思想上、感情上都和军队有了一定的联系,有利于保持我军的传统作风。“陆、海、空军的基层军事指挥干部,应坚持以工农成分为骨干,从经过士兵生活锻炼的班长或副排长中选拔。连队的政治工作干部,应当从政治上比较优秀的排长中选拔。……事实证明,这样选拔干部,不仅在平时和战时都可以充分保证部队的需要,而且对于保持我们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军优良作风,是三十多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逐渐培养起来的,同时也是从无数的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干部身上继承下来的,它已经成为我军团结内部、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选拔干部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作风这个问题”<sup>②</sup>。三是有利于激发战士的进取心,调动他们献身国防、钻研国防的热情。“只要我们坚持从士兵中选拔和培养干部的办法,广大士兵群众,就会更加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有了奔头,因而就会大大提高他们对于军事、政治和文化的学习热情。士兵学习情绪高涨的结果,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21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22~623页。

反过来就又为军队选拔干部开辟了无限的源泉”<sup>①</sup>。四是可以为国家挤出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用于其它建设。所以这种办法,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成为军队解决知识青年来源问题的主要办法。

在50年代的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中,正是由于坚持了从优秀士兵骨干中选拔培养干部的途径,较好地解决了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干部知识化与革命化的矛盾。使人民军队在通向高级阶段的道路上,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使这一时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之一。

### (三)坚持全程全面培养提高干部方针

现代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军队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战略战术、作战指挥手段的不断变化,这就要求军队干部的专业知识水平、管理部队能力和作战指挥能力应随之不断提高。同时一些干部的职务不断提升,对其能力水平也必然提出新的要求。因此,采取有效的手段培养干部,使之不断得到深造和提高,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彭德怀认为,这种培养提高应该是全程的和全面的。所谓全程,就是对干部培养要贯穿其服役的各个阶段,不能一劳永逸;所谓全面,就是培养干部要重视其全面能力的提高。既要懂作战指挥,又要懂管理部队,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际能力,既要军事上、专业上精,又要政治思想上强。

贯彻这一方针,一是要办好军事院校。彭德怀指出,对干部进行系统的正规的培养,主要依靠办好军事院校。军队中的初、中、高级干部,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在任职前,一般都要经过院校的学习,使其具备相应的知识。“认真地办好学校,应成为全党、全军共同任务。为了办好学校,各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23~624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部队应该选调最优秀的战士和干部(特别是志愿军中的三十万英雄模范)到各院、校去学习,坚决纠正过去那种舍不得把优秀的战士和干部送去学习的偏向;应该抽一批具有战斗经验、又有教育能力或有培养前途的干部来加强各院、校的领导骨干,有步骤地做到使我军指挥人员与军教人员的轮换和合一”<sup>①</sup>。他要求军委和各大军区都经常地注意对各院校进行检查和帮助,及时地解决一切可能解决的困难。二是要组织好干部的在职学习。院校深造,只是阶段性的,并且在较短时期内不可能将所有的干部都送到院校去深造。因此必须大力组织好干部的在职学习。在职学习,主要采取短期集训和经常性学习两种形式。短期集训分级分类组织,每次学习研究一个专题。经常性学习由上级领导机关统一安排学习内容,个人利用工作之余自学,学习时间每周不少于3小时。三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组织和领导部队的工作建设中增长才干。彭德怀强调,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是最重要的学习,一切书本上、课堂上的、理论上的知识,只有经过实际运用这个环节,才能真正变为自己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上级要注意对下级的帮助和指导,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变为部队的共同财富;应“总结自己的战斗经验,以求得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打一仗提高一步”<sup>②</sup>。

### (四)坚持用其所长,人尽其才的使用原则

识别干部和使用干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善于识别干部是正确使用干部的前提,而正确使用干部则是识别干部的目的。因此,善于使用干部,是干部队伍具有活力的关键环节。一方面要用其所长。彭德怀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的优缺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用其所长,则有的是人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9页。



才,而求全责备,则将无人可用。因此用人要善于扬长避短,使其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特别要发挥干部的专业特长,“从各院、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应该分配到与其所学专业相适应的工作岗位,使学用结合,发挥其专长,不许分配其改做非本行以内的工作”<sup>①</sup>。另一方面要注重能力,不论资排辈。彭德怀认为一支部队要出干部、出人才,就要大胆培养、提拔和使用年青干部。对德才兼备、出类拔萃的优秀干部,敢于破格使用。高级领导干部应把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作为自己的职责。当然,资历也是使用干部的依据之一,但照顾资历也是服从德才这两个标准的,“因为一定的革命历史,可以表示一个干部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所受的考验。孤立地提出一个资格问题,那是不正确的”<sup>②</sup>。

## 五、官兵一致,甘苦与共

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官兵关系的协调,是军队建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数的战争经验证明,官兵团结是巨大的战斗力,是军队巩固自己战胜敌人的基本保证。中国古代兵家就认识到了“师克贵和”“三军一心,天下无敌”的道理。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历代兵家和官爱兵的主张都是建立在将尊而士卑、帅智而卒愚的基础上的。他们的爱兵往往是对兵施之以恩使其感恩戴德而效忠,蔽之以目,使其愚昧无知而盲从。只有人民军队才具备了从根本上密切官兵关系的阶级基础,毛泽东从人民军队的特点出发,提出了官兵一致的原则,彭德怀在治军实践中,对官兵一致的原则作了许多具体而深刻的阐发,提出并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实行了一系列密切官兵关系的举措。

### (一)尊重战士,发扬民主

彭德怀认为,干部尊重战士,以政治上平等的地位去处理官兵关系中遇到的各种矛盾,这是密切官兵关系的前提,也是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所要求的。他说:“剥削阶级的军队……在它们内部,出身于剥削阶级的或者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军官,和来自劳动人民的士兵之间,总的来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当时社会上的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克服的。它们为着控制士兵群众,在军队中采用了极端野蛮专制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强调绝对地盲目服从,强调军官的个人权威,……以便驱使士兵去作剥削阶级欺压人民和向外侵略的驯服工具。”<sup>①</sup>而人民军队是劳动人民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制度,保卫人民国家的独立的工具。军队的成员,包括军官和士兵在内,都来自劳动人民,他们的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是相同的。因此,官兵一致,“军官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军官,上级关心下级,下级尊重上级,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友爱合作,团结一致,这就是我军内部关系的特点。”<sup>②</sup>

尊重战士首先要尊重战士的人格,彻底废止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彭德怀在革命军队中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而且一直把它作为处理官兵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反复加以强调。

早在1928年,当已成为共产党员的彭德怀在湘军中升任团长时,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宣布了两项命令:第一条,全团所有军官今后一律不许打骂士兵;第二条,取消连排长的小厨房,和士兵一起吃饭。旧军阀部队,军官打骂士兵是家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3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3页。

常便饭,废除打骂,使士兵有了做人的起码尊严,深得士兵之心。可以说彭德怀改造旧军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但这种几千年军队中形成的军阀作风,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铲除的。在人民军队中,这种军阀残余的清除仍需做艰苦的教育工作。彭德怀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坚韧精神。1929年10月,红五军在江西永新整训时,训练中三纵队的一个战士枪走火差点伤了人。毕业于保定讲武堂的纵队长吴迪芬为罚一儆百,对这个战士作了打30竹板屁股的处罚。彭德怀知道后,集合全纵队的干部对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我们是红军,不是湘军和反动派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队伍,官兵之间是阶级兄弟,出了事故要进行教育,战士有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你打人不仅违反了纪律,同时也不一定使他真正认识错误。另外我们都是贫苦出身,人民把子弟交给我们,为的打土豪劣绅,打反动派军队,解放穷人,可我们竟打自己的兄弟,这让他们父母知道了,能放心吗?”<sup>①</sup>彭德怀的话使三纵队的干部深受教育。

在《彭德怀军事文选》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为什么在我们革命部队里禁止打人》,这是1943年8月13日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干部会上的讲话。背景是警卫连的一个战士偷了老百姓的东西,违反了群众纪律,警卫连长打了这个战士。在这个讲话中,彭德怀说,禁止打骂,早已成为我们部队必须遵守的一种制度。而且十几年来还经常不断地进行反对打骂的教育。但直到现在这种打人的现象,在我们部队还未彻底肃清。为什么这样难以纠正呢?他分析认为其根源是受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受中国其他军阀部队的影响。而对革命军队的内部关系的本质缺乏自觉的认识。指出:“我们八路军是属于劳动阶级的,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

<sup>①</sup> 张平凯《忆彭大将军》,第84页。

产党所领导 ,.....我们部队的每个成员 ,都是为了共同的政治信仰 ,从事共同的革命事业 ,彼此更应该看做是亲密的战友 ,爱如兄弟 ,哪里还能容许有打人这种不平等的封建落后的行为呢 !”<sup>①</sup>他批驳那种认为打人是为了维护纪律提高战斗力的错误观点 ,深刻地阐述了它的危害性 :首先是造成指挥员与战斗员的隔阂 ,涣散部队的团结 ;其次是模糊了战斗员对部队阶级性的正确认识 ,阻碍其觉悟程度的提高 ,使之不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部队是由劳动阶级的先进分子自愿组成的 ,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 ,因此打人会影响到战斗员对部队的爱护和纪律的自觉遵守 ,使其战斗意志受到削弱 ;最后 ,打人的结果和指挥员的最初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 ,部队的战斗力反而削弱了 ,也必然打击了指挥员的情绪和信心。他强调 ,为了吸取这个教训 ,要抓住这件事 ,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教育 ,把这些道理讲清楚 ,务求每个指挥员都能深刻了解。

尊重战士 ,还必须尊重战士的民主权利 ,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彭德怀认为 ,革命军队中官兵一致的原则 ,需要有根本制度来保证 ,这个制度就是人民军队中的民主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军队 ,又是一支有高度民主生活的军队。我军从创建开始 ,就彻底摧毁了军阀军队的专横制度 ,采用了广泛的民主措施 ,在 1929 年古田会议以后的长期斗争中 ,逐渐形成了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军队是要打仗的 ,历来军队都强调高度集中和纪律 ,这一点人民军队也不例外 ,高度的集中和铁的纪律是绝对不可少的。“但是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 ,我军成员是有政治觉悟的 ,能够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事业 ,愿意为人民的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73 ~ 174 页。

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这就为我军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和建立自觉的铁的纪律,提供了政治基础。”<sup>①</sup>彭德怀同时强调,我军不但能够实行民主,而且必须实行民主。因为革命战士是革命军队的主体,只有集中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完成革命任务,因为“我军所执行的任务是用战争方式摧毁反革命武装力量的艰巨任务,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绝非少数人的智慧所能办到的,必须依靠全军成员对革命事业的高度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sup>②</sup>。

人民解放军民主制度的内容,就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彭德怀对这三大民主的内涵和贯彻执行的基本要求进行过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军队中政治民主,就是在政治上官兵平等。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同级之间,允许从团结愿望出发的相互批评,相互监督。”<sup>③</sup>“为了工作,不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士兵也可以批评军官,军官必须虚心倾听下级官兵的意见和接受正确的批评,绝不容许有压制批评、打击批评者的行为,对于不适当的批评和意见只能进行解释”<sup>④</sup>。“军队中的军事民主,就是军事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只要条件许可,领导上应该通过思想动员,发动全体成员对于如何完成作战、训练任务,改善管理工作的方法等进行讨论,使领导的意图变成群众的决心,吸收群众的合理建议,使领导上提出的计划进一步得到完善。军队中的经济民主,就是伙食单位的经济公开,士兵参加伙食管理,在可能条件下改善士兵生活,防止

-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16 页。
-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64 页。
-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16 页。
- ④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65 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发生贪污浪费的现象”<sup>①</sup>。

彭德怀总结人民军队实行民主的经验,提出了发扬民主的基本措施:一是一切较重要的工作计划,只要条件许可,都要进行自上而下的充分思想动员。并通过有领导的自下而上的讨论,提高群众对当前任务的认识和信心。二是在一切工作中,领导要注意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采用群众的合理建议,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依靠群众智慧,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对于犯了错误有缺点的同志,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对于某一带普遍性的严重错误倾向,组织群众性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批判和纠正错误。四是用表扬先进典型和充分的政治动员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集体创造精神,以组织群众向先进人物学习的运动和革命竞赛运动,来推动工作的不断向前发展。

彭德怀特别强调指出:军队中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在军队中实行正确的民主,要注意克服一两种倾向。一是要注意克服以军队特殊为由而不愿意发扬民主的倾向。彭德怀针对一些人将民主与干部的威信、和部队的纪律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经验证明,实行这样的民主并不损害干部的威信,相反地,用民主领导形成起来的心悦诚服的威信,才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威信。我军纪律的维持,也主要采取民主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上级约束和监督下级,而是采取群众的自我教育,提高政治觉悟的办法,自己约束自己,大家约束大家。这种自觉纪律,有上级的监督固然可以维持,没有上级的监督同样可以维持。在平时固然可以维持,在战时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同样也可以维持。另一方面,要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由于我们军队担负着用战斗来保卫祖国的重大任务,我军就需要有高度的集中和高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页。

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所以我军的民主又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sup>①</sup>。

### (二)热爱战士,为兵服务

彭德怀认为,密切官兵关系,关键是干部对待士兵的感情和态度问题。干部只有真正认识到战士是革命军队的主体,认识到他们在革命战争中的决定作用,从内心里热爱战士,才能自觉摆正自己与战士的关系,关心战士,为战士服务。而一支部队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必然形成亲密无间的官兵关系,形成无隙可楔的巨大凝聚力。在这方面彭德怀强调三个必须:

必须充分认识战士在战争和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以建立起爱兵的思想基础。彭德怀经常告诫军队中的各级指挥员,应该首先把作战胜利归功于战斗在最前线的革命战士。他指出:“我们要提倡为战士服务的作风。我们打一个胜仗,是集中全军体力、智力与人民的一切努力才打胜的,绝不是几个首长打胜的。……打胜仗是全体努力致胜的。”<sup>②</sup>他要求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向人民学习、向战士学习。学习他们的“正气和坚决勇敢、自我牺牲精神”。他说:“有些同志为着完成爆炸任务,身绑炸药,爬至敌人碉堡前,自身与敌人碉堡同时粉碎。这类英勇事迹,不止一次,而是无数次;不是强迫命令,而是完全出于自愿自动的行为。这些战斗英雄为了人民的事业,粉身碎骨,英勇的光荣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是万世师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干部在思想上确立了这种认识,爱兵就不只是一种上级的要求和规定,而将成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

必须与战士打成一片,倾听战士的呼声。彭德怀认为,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40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页。

只有到战士中去,与战士在一个锅里吃饭,一条战壕里作战,才能真正了解战士,与建立深厚感情。彭德怀最看不惯干部脱离战士的行为。每当发现这种行为,总是要给予严肃而耐心的批评。张平凯在《忆彭大将军》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次行军,一位军官骑着马,挥动着鞭子,把马打得四蹄腾空,从行军的队伍中一闪而过。骑在马上军官不停地呼叫,“跟上!跟上!快跟上!”此情此景被彭德怀看到了。到了行军宿营地后,特地集合有关干部进行爱兵教育。他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带兵须爱兵。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当兵过来的嘛!不爱兵,我们过去那几年兵就白当啦。”彭德怀绘声绘色地把那位催马扬鞭命令战士跟上军官的做法讲述一遍之后,诙谐地说:“我看这位领导同志应该同战士换个位置,让战士骑马催促他‘跟上!跟上!’看他是否能跟得上,又有何感想。”彭德怀还指出,与战士打成一片,不仅是增进与战士感情的需要,也是向战士学习、发现和集中群众创造性的需要。“我们应该了解,群众的实践活动是知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实际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才能找出克服困难和解决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条令、制度、命令、指示的正确程度,才能找到修改它们的根据。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和亲身体会群众所创造的新事物和它的意义,才能把群众的零散的无系统的新创造集中起来,把实际中取得的经验与书本知识结合起来”<sup>①</sup>。

必须关心战士疾苦,诚心诚意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彭德怀要求干部应时刻想着战士,切切实实为战士服务。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习仲勋在《彭总在西北战场》中写道:行军中,彭老总有时静静地走在战士的行列里,听着他们的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68页。



各种议论,同他们交谈,征求他们对领导的意见。在进军陇东途中,看到战士过河不方便,他就从水里搬石头垒起石头堆,让战士走过。在通过沙漠渴死人的时候,他把分给他的水让给战士喝,行军每到一个地方,他先看战士们住好了没有,有时他和参谋长挤到一个房子里,把房子腾出来给战士们住。看到饲养员没房子住,他把司令部四科科长叫来,说:“白天我们骑马走,他走路,晚上我们睡觉,他喂牲口,这样的同志我们不关心他们,谁关心他们?眼里只看见首长,那是中国人过去给皇帝当奴隶当惯了,养成这样一种恶劣气习!”他对参谋、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和所有在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平等相待,和蔼可亲。彭德怀强调,作为一个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为战士服务,尤其是要精心指挥每一次作战行动,以减少战士的流血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时,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在与彭德怀一次交谈中请他传授战争经验,彭德怀说:“我一辈子打仗,没有什么高招,只懂得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可不是儿戏,必须精心策划,周密部署。指挥员多用一分心血,战士就少流一分鲜血,不能以战士的生命去无谓冒险。要牢记,任何父母,当知道自己的孩子牺牲了,那痛苦和悲伤都是难以忍受的。”<sup>①</sup>

### (三)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是彭德怀从红军时期起始终坚持的八个字。也是他几十年治军有方的经验之谈。在抗日战争中,一些国民党的将领对八路军官兵同心同德深表钦佩,他们向彭德怀请教其中的秘诀。彭德怀说:“官长与士兵风雨同舟,尤其是长官与士兵间的生活距离应尽量缩小,……与士卒同艰苦,是团结部队的重要条件之一。”<sup>②</sup>在长期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

<sup>②</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的革命战争中,无论彭德怀的职务地位多高,在生活上他始终以普通一兵的身分严格要求自己。如在陕北作战中,从延安撤出后,彭德怀就命令取消了司令部的小灶。他说:“大灶吃啥我吃啥。”司令部管理科的干部常因给彭德怀改善一下伙食而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进军三边,极为艰苦,当部队进驻靖边张家畔后,管理科的干部看到彭德怀辛劳过度,日益消瘦,都很焦急。一天,炊事员超过了伙食标准,以每条两千边币(相当于半斤小米)的价格,买了20条新上市的黄瓜,想给他增加点营养。彭德怀把管理科长高克恭找来,问道:“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战争打得这样苦,二纵过沙漠时就渴死了人,我们应当多为战士着想呀!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援我们,他们的负担已经够重了。多浪费一分钱,我们也应当觉得惭愧!”<sup>①</sup>第二天,他在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吩咐把凉拌黄瓜送到参加会议的各小组。事隔五年之后,彭德怀在谈话中提及这件事时,还说:“黄瓜本是极普通的菜,黄瓜虽小,影响事大。在大家艰苦困难时,都吃苦没话说。可大家连饭都没得吃,你买几千元一条的黄瓜,事就大了。”

彭德怀认为,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是无条件的,越是艰苦、越要坚持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使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得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和力量。1947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三边战役。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位于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部,大都坐落在古长城脚下,处于毛乌素沙漠的边沿,干旱多风缺水。出发前,野战兵团要求各部自带饮水。6月下旬,部队由环肥向三边地区进发。时值盛夏酷暑,骄阳似火,把浩瀚的沙漠烤得滚烫,部队迈着沉重的步伐前进,干渴成了前进路上的大敌。由于极度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

干渴,许多人鼻孔流血,嘴唇干裂呼吸困难。有的战士因中暑而牺牲了。彭德怀已是年近50岁的人了,白天和部队一样行军,晚上同睡在沙窝里,劳累缺水,嘴唇血肿。一次警卫人员从沟底提上一壶水,准备给他润喉。彭德怀看到路边有个战士渴得难受,让先给这个战士喝,警卫员不乐意。彭德怀说,“一口水就是一条命啊!这水应给更需要水的战士,自己一口也没有喝,继续往前。经过新四旅四十九团,团里送来了一杯甜水给他,他仍然说,给战士喝吧!我到前边能找到水。一天,彭德怀又要警卫员拿水壶来给一个干渴得难耐的战士喝。警卫员急了,说:“都喝光了你喝什么?看你的嘴唇肿得那么高了。”彭德怀却风趣地说:“你跟我在一起,还不晓得我本来就嘴唇厚吗!”警卫员无可奈何,只好把水壶交了出来。

由于战争的破坏和陕北地区遭灾,在沙家店战役时,部队粮食供应时断时续。有的团1天只能领到7斗黑豆。连队以黑豆、粗糠糊糊为食。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听说有个营没有粮食做饭,立即命令管理员把司令部仅有的4斗小米全部送去,自己和司令部人员却以一些粗糠和黑豆“钱钱”(压扁了的黑豆)充饥。有人实在不忍心让日夜操劳的司令员吃这样的饭。可是彭德怀却乐呵呵地说:“这就很不错了,长征时,要有它就好了!”

## 六、军民相倚,以民为本

军队与民众的关系,这是历来治军必须认识和处理的基本问题。历史上治军有方的统帅,已认识到“民心向背,胜利所系”,都把军队得到民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作为治军的核心问题来抓,提出了“兵民相洽,无敌天下”的治军主张。但由于军队所争取和维护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是在特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定条件下(如抵御外族入侵,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农民起义军为推翻地主统治阶级而进行的战争)才有其一致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根本对立的,这就决定他们关于争取民众的治军主张多是策略和方法上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军民团结、同仇敌忾的问题。只有新型的人民军队才具备从根本上解决军民一致的政治基础。彭德怀作为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在其治军的实践中,从“我军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完全一致”这个人民军队的独有特点出发,领导部队建立全新的军民关系,真正实现了军民相倚,以民为本的治军目标。

### (一)牢记我军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彭德怀认为,人民军队的治军之道,最根本的问题莫过于在军队确立和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军是来自人民,是为了和依靠人民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sup>①</sup>只要我们坚定地贯彻这一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就能与人民结成血肉联系,使我军获得人民的热烈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要深入进行人民军队宗旨的教育。彭德怀在总结人民解放军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经验时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军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完全一致,跟人民的关系就如鱼和水一样密切。广大人民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我军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我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亲切地把我军看作自己的“子弟兵”。

正因为这样,人民就成为军队兵源补充的源泉。在战争时期,经过充分的群众工作后,人民就自动地、踊跃地投入到我军中来。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1页。

正因为这样,人民就自动成为我军军需、粮秣的供给者。每个家庭就成为我军的工厂、仓库和医院,保证了我军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

正因为这样,人民就在我党我军的领导之下,自愿地组成自卫队、民兵,配合我军作战,开展袭击、爆炸运动,清除奸细,侦察敌情,运送伤兵和粮弹,充当向导,使我军获得了作战的各种有利条件。<sup>①</sup>

在解放战争中,胡宗南以20万大军对共产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而边区的部队不足2万人,靠什么力量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彭德怀的答案是:“发挥军民团结互助、军民合作,才能战胜敌人。”<sup>②</sup>历史证明,正是陕北人民的“群众战”,使得胡宗南的20万军队得不到消息、得不到粮食、得不到安宁,处处被动,被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一口一口吃掉。陕北人民为支援解放军作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由于国民党军抢劫,战争破坏,加上这年陕北先旱后涝,边区人民生活艰苦,不少群众以榆皮、野菜充饥,却把保存下来的一点粮食拿出来供应部队。“宁愿饿肚子,也要让部队吃饱打胡儿子。”所以彭德怀常说,边区人民对我们的恩德如同父母。

彭德怀深刻地指出:也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援,我们才能在过去的长期的艰苦战争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获得伟大的胜利。我军长期是和优势之敌作战,装备低劣,弹药困难,衣食不足,医药奇缺,既无薪饷,又得不到适当的休整,长征中过雪山、草地,深入不毛之地的艰难情况,更是罕见罕闻。所有这些困难都未难倒我们,总是我们克服了困难。过去的历史证明了,今后的历史还将证明:任何威力巨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53页。

<sup>②</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大的武器(包括核武器在内),终究还是人们手中的工具,归根到底是人支配机械,而不是机械支配人。“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全军同志要牢牢记住这个真理,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团结”<sup>①</sup>。

## (二)严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历代兵家学者论兵,无不论及民众纪律,历史上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军队,无一不是有严格的民众纪律,对民众秋毫无犯的军队。彭德怀认为人民军队要坚决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样需要有法规纪律的保障。他在抗日战争中论述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时指出:“部队纪律的严明,是保持部队和民众良好关系的基本条件。在战争期间,一切决心在敌后方坚持的部队都应极度改善自己的纪律。部队内都应加紧纪律教育与建立纪律检查制。”<sup>②</sup>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是彭德怀治军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

1938年3月,朱德、彭德怀在山西沁县小东岭主持召开了东路军将领会议,会上,彭德怀在报告中针对不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军民同心表示钦慕而自己找不正确的途径的情况说:“对待民众有几件基本的事,就是实行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物要还,损物赔偿,离开驻扎地时,实行纪律检查。我们只要做到这几项,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好感与帮助,军民也就可以慢慢团结一致了。”<sup>③</sup>

为保证部队贯彻执行我军规定的群众纪律,彭德怀在部队中建立了纪律检查制度。如在转战陕北时,彭德怀明确要求:“每一个伙食单位要有纪律检查组,每班要有纪律值班员。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2~613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③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连首长每日须有简短纪律生活讲评,营首长三至五天,团首长七至十天,旅首长半月须有一次讲评,坚决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严守纪律的连队和个人表扬之,对违犯纪律严重者应处罚之。各部队每到一地都召开军民联欢会,进行社会调查,军政首长特别是政治机关要找地方干部谈话。

彭德怀强调,执行群众纪律,必须是不分时间、地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因此,无论解放区还是敌占区,无论是国内作战还是出国作战,他都始终如一地把严格群众纪律作为经常性的重要工作抓住不放。而且越是环境复杂、敌情严重、战斗频繁的情况下,越是重视对部队执行群众纪律情况的检查。如红军长征进行遵义战役前,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遵义东20里的一个叫懒板凳的村庄宿营,当部队离村出发时,发现部队宿营地还有一块门板,就亲自到老乡家中挨户询问,直到找到了门板的主人把它上好才离去。事后他对有关同志说:这里是新区,老乡还很不了解我们红军,他们还把我们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看待。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要注意群众纪律。老百姓的东西,哪怕是一针一线,是怎么借来的,就要怎么归还。别看这是一块门板,它直接影响着红军的声誉。以后,一定要养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好习惯。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特别强调“出国作战纪律问题更为重要……到朝鲜后,更要切实遵守纪律,不能侵犯群众利益”。如在第三次战役发起不久,志愿军政治部就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对进入汉城的部队颁布了纪律守则。其内容如下:

- (一)迅速肃清残敌,镇压公开反抗的反革命分子。
- (二)维持城市治安,恢复革命秩序,严禁乱捉

## 一代名帅名将兵法

乱杀。

(三)保护工厂、商店、仓库资材及一切公共建筑。

(四)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机关、名胜、古迹建筑及一切公共场所。

(五)对守法的教堂、寺院、宗教团体一律不加干涉。

(六)不干涉守法的外侨,不侵入外国使馆,为了防止意外,对外国使馆可派部队加以看守。

(七)向市民宣传胜利,宣传防空、防特、防火,严格遵守纪律,不许随便进入民房。

(八)凡入城部队必须自带三至五天的粮食、蔬菜,严禁入城后抢购物资,乱买东西。

(九)注意军容、军纪及清洁卫生,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派出必要的巡逻部队外,严禁随便逛街。

(十)凡属有关政策性质的问题特别是对外政策,必须事前请示,事后报告。

从上面这个纪律守则中,可见志愿军群众纪律之严格。

(三)体谅民众艰辛,减轻人民负担

军队是靠人民来负担的。尽一切可能减轻人民的负担,是取得人民对军队的拥护和支持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古代军事家就提出了“惜民力”的思想。作为人民军队,更是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出发,合理确定兵员数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杜绝浪费,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和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指出:“敌后根据地人民负担虽然比敌占区轻得多,但还是相当重的……我们必须及时深刻地去注意,求得适应的解决。抗日



民主政府应力求减轻人民的负担。”<sup>①</sup>

精兵高效。在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就提出,有必要在根据地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和保卫根据地的必要兵力费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1940年9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相应扩大。针对人民负担日益加重的情况,他和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一起算了一笔账: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均需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当时民众的负担能力,每人年负担10元左右,约需50人左右负担一个兵员。当时根据地人口为300余万。根据这个计算,彭德怀在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阐述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提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全人口的3%之数。1941年末,中共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号召中,即是按这个比例要求全党的。这凝聚对人民生活深刻体贴的百分比,对密切军民关系,共度敌后艰难岁月,起了重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在军队中许多同志急切实现军队现代化的情况下,彭德怀却提出了精简军队问题。他指出,国防现代化水平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我们必须从全盘着眼来考虑我们现代化军队的逐步建设,不允许只顾局部而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

自力更生。彭德怀强调,一方面,军队要积极支援人民群众的生产建设。“能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关怀人民的痛苦;一有可能就帮助人民生产劳动,帮助人民克服困难”,“积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极地帮助人民群众生产建设,救灾抢险”<sup>①</sup>。在战争年代,他每到一地,都要了解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动员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参加助民劳动。特别是面对敌人对人民群众生产的破坏和劳动果实的掠夺,常常以相当的兵力投入群众抢种抢收。如1939年2月,彭德怀为解决“磨擦”问题赴河北,由陈庚部队护送,通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进入冀南。就在中央和总部等候着他安全通过封锁线之际,彭德怀却利用行路的时间筹划着一件大事。进入安全地带,他就向中央和总部发电:估计敌4月份将大举进攻长治,须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提前春耕,免受损失。另一方面,军队尽可能地进行军工和农业生产,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来满足部队的部分供给。在抗日战争中,我军开展了著名的生产运动,对于解决军队的供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彭德怀解决敌后八路军供给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在前面提到的电报中彭德怀还建议组织医院、学校、工厂、机关人员利用时间开荒。他计算可能增产瓜菜15万担,马料50万斤。如此在困难时不发马料、菜金亦能坚持战局。

厉行节约。彭德怀历来把勤俭节约,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个重要建军原则,作为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措施来加以强调。他说,军队的任何不爱惜人力、物力、财力的行为都是犯罪。军队只有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特别是在群众生活处于艰难时期,军队更要带头节约以帮助解决群众的疾苦,共渡难关。1943年春,太行、太岳区根据地遇到严重春荒,一些群众断粮。八路军的粮食供应也非常紧张。但为了接济群众,4月1日,彭德怀下令,总部直属部队各单位,从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1两小米救济饥民。4月27日,彭德怀又下令总部直属部队全体指战

<sup>①</sup>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2页。

员,每人每日节约2两小米救灾。这样总部直属部队的干部每日口粮约合7两,战士每天口粮也不足1斤。彭德怀规定,北方局和总部的干部每日采一斤半野菜、树叶交炊事员与粮食掺做。从4月起直到秋收,彭德怀等八路军和北方局的领导人和总部机关一起,每日两餐菜粥、榆叶面条,或玉米、黑豆皮做的饽饽,个个面黄肌瘦。彭德怀痔疮时发,经常便血。由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八路军和北方局的领导机关带头节粮救灾,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和部队也纷纷仿效,军队与人民一起共同渡过了难关。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些人即使在战争中失利也不会被摧垮,八路军吸引着人民。”<sup>①</sup>

<sup>①</sup>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 后 记

我1970年参军,成了被彭老总赞誉的“万岁军”的一员,且我所在的团队又是在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中诞生的“红军团”。也许是这支部队的历史和战功均与彭老总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原因,自上而下对这位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有着一种特殊的崇敬之情。彭老总指挥部队打胜仗的故事一代一代往下讲,即便是彭德怀蒙受不白之冤的年代,也没有间断过,只不过是“课堂”上的正规教育变为了干部战士自发的传颂。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彭老总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清晰。后来我调入军事科学院从事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对彭老总所指挥的一系列重大战役决策过程、谋略手段及作战进程中临机处置的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促使我萌生了对彭老总从“平江”到“汉江”的制胜韬略进行系统探讨的想法。经过一年余的业余研究和撰写,并最终形成了这样一本小册子。但愿它能为成为一块引玉之砖,对读者了解和研究彭德怀兵法有所帮助。

本书参考吸收了近几年来有关彭德怀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的研究成果,在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陈舟、谭一青两位博士与作者一同讨论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思路,并对书稿的框架构思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特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作 者